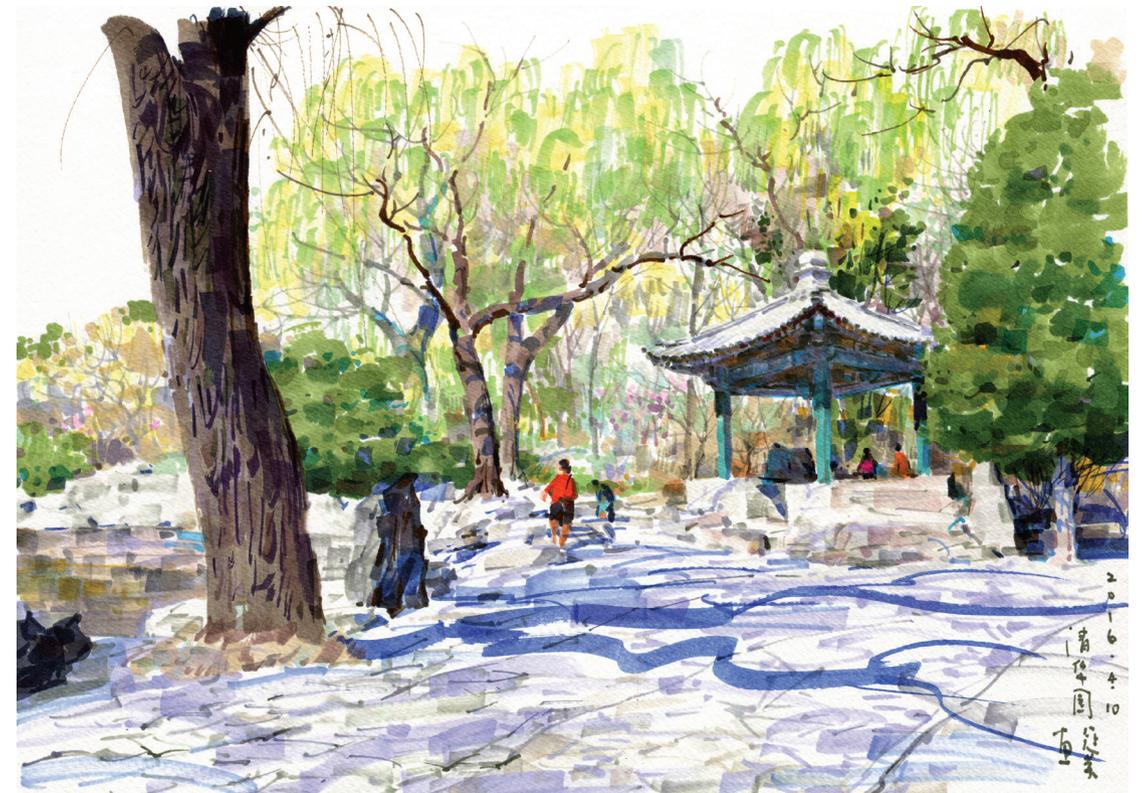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四
春季号
复九十七期

97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97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二〇二四
春季号

清华校友总会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9 771006 766245

刊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7号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 海淀区与清华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李路明当选清华校友总会理事会会长



▲ 国际力学、材料及工程科学领域顶级专家高华健全职加盟清华大学，李路明校长（右）为高华健（左）颁发聘书



▲ 清华大学两院院士和文科资深教授新春座谈会举行



◀ 瑞士校友会元宵节联欢

▶ 德国校友会与兄弟高校校友会共同举办2024春节联欢



▲ 美国大纽约地区清华、武大校友会携手举办“清武飞扬”春节联欢会



▲ 阿联酋校友及家属聚会迎新春



▲ 新加坡校友会举办2024年新春聚会



◀ 中美青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

▼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举行载人月球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 清华大学—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数字核电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举行



► 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哲学一戏剧节



▲ 求真书院“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024级预科班开班

校友联络



◀ 邱勇访问福建
推进省校合作
并看望校友



▶ 邱勇率团访问越南，
与越南籍校友代表合影



▲ 邱勇率团访问泰国，
看望在泰校友代表并合影



▲ 邱勇率团访问新加坡，
与在新工作的校友代表合影



◀ 校长李路明率团
访问瑞士，与瑞
士校友代表座谈
交流

校友联络



▶ 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姜胜耀出访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校友会代表交流



▲ 校党委副书记过勇赴广东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 校友总会副会长王岩看望百岁学长叶铭汉院士

▶ 2023年度清华校友“马约翰杯”运动会总结交流会举行

▼ 第八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总颁奖典礼暨项目展示对接会举行



校友联络

▶ “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校友交流研讨活动举办



▲ 清华校友民乐团和校工会民乐社联袂奉献新年音乐会



▲ 车辆学院“瑞麟奖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 清华校友总会博士后分会第四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举行



▲ 清华校友总会AI大数据专委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湖州市清华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召开



◀ 平顶山校友会举行2024新春座谈会



▲ 安徽校友会举办2024新春联谊会



▲ 江西校友会组织踏青活动



▲ 上海校友会半导体专委会暨电机工程专委会年会举行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2024深圳清华校友新年音乐会成功举办



▲ 南京校友会举行2024迎新春联谊会



▲ 黑龙江校友会新春交流会在哈尔滨举行



◀ 沈阳校友会举办
迎接新校友座谈会



▲ 河南校友会2024新春联谊会举行



◀ 清华校友欢聚
2024厦门马拉松



▲ 天津校友会2023年年会举行



▲ 云南校友会助力2023腾冲科学家论坛



◀ 廊坊校友会
举行2023年
年会



▲ 三亚校友举办2023年年会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 加拿大卡尔加里校友会举办成立二十周年新春联欢会



▶ 美国威斯康星校友会举办甲辰年春节校友联谊活动



▲ 加拿大南安省校友会2024春节联欢会圆满举办



▶ 美国亚利桑那校友聚会纪念“一二·九”

清华校友通讯

二〇二四
春季号
复九十七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回忆在校团委工作的那几年（贺美英）
-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陈世梁）
- ◆一个中子的探奇之旅（李满仓）
- ◆景来红：筑梦江河携手（曾卓崑）
- ◆生命科学：从零到极致——一群 TEEC 人的创新创业故事
- ◆“气候特使”解振华 谈判桌上 16 年
- ◆弦歌不辍伴师归——回忆刘西拉老师（江 枣）
- ◆诗意清华诗意人——《因为清华》创作自述（吴鹤立）

清华校友总会 2024 年 4 月

清华校友通讯

97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复春二
九〇
十季二
七二
期号四



刊 址 清华大学新林院7号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 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叶宏开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 芊
周家恂 孙 哲

编辑委员会 史宗恺 向波涛 唐 杰 宗俊峰 邱显清
刘涛雄 周明胜 范宝龙 胡 钰 杨士强
李 军 郭 谦

刊名题字 刘 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 编 史宗恺
常务副主编 董吉男
执行主编 曾卓崑
副 主 编 杨 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 辑 田 阳 钱飒飒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 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一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大学东南门外紫清大厦 6 层
发行电话 010-62792246

目录

Contents

今日清华

- 7 清华大学 2023 年十大新闻揭晓
- 7 2023 年清华大学最受师生关注的十大亮点成果发布 / 科研院
- 8 清华大学—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医药创新联合研究院正式揭牌 / 田姬熔
- 9 辽宁省—清华大学省校合作座谈会举行 / 徐子越 王晓霞
- 10 校长李路明会见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校长 / 林源
- 11 海淀区与清华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 董鲁皖龙
- 11 求真书院“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2024 级预科班开班 / 求真书院
- 12 国际力学、材料及工程科学领域顶级专家高华健全职加盟清华大学 / 曲田

值年园地

- 13 毕业七十载 无限好夕阳 / 宗家源（1954 届水利）
- 14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 陈世梁（1964 届机械）
- 18 母校的关怀 不竭的动力 / 周长海（1970 级工物）
- 21 不忘来时路 清华情满怀 / 苗长顺（1970 级电力）
- 24 空九是我载梦的小船 / 胡运昆（1979 级热能）
- 26 毕业“而立”之年，忆数学江湖 / 曹阳（1989 级数学）
- 30 在另一个“清华园”里，收获“战士”学位 / 刘婷（2010 级外文）
- 32 书法 / 蒲怀均（1970 级建工）

我与清华

- 33 回忆五六十年代的清华男篮 / 王光纶（1963 届水利）
- 38 教书育人五十年 平凡岗位尽责任 / 施工（1970 届工物）
- 41 从清华到江湖 / 田战耕（1988 级无线电）
- 46 清华之大 / 杨秉勋（1999 级法学）
- 49 一个中子的探奇之旅 / 李满仓（2003 级工物）

清芬挺秀

榜上有名

- 53 多个团队和校友被授予“国家工程师奖” / 田阳
- 54 7 位清华人荣获 2023 何梁何利奖 / 田阳
- 55 5 位校友、1 个集体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称号 / 田阳
- 55 两位清华人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 田阳
- 55 4 位校友获得 2024 斯隆研究奖 / 田阳

- 56 景来红：筑梦江河携手 / 曾卓崑（2003 级硕，新闻）
- 60 王仁坤：勇攀水电“珠峰” / 陈万涛 邱云
- 63 崔琪：从“银锭观山”找回老北京 / 曹晶瑞
- 66 生命科学：从零到极致
——一群 TEEC 人的创新创业故事 / 清华企业家协会

紫荆花开

- 72 “95 后”第一书记，在村里干些啥？ / 王思涵

校友联络

- 75 邱勇访问新加坡、越南、泰国并看望当地校友 / 宗和
- 76 邱勇赴福建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 曲田
- 76 李路明校长与瑞士校友亲切交流 / 陈宇飞 乔志东
- 77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李路明当选清华校友总会理事会会长 / 朱芙蓉
- 77 第八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总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 三创秘书处

院系工作

- 78 新闻与传播学院分会举办《烟火人间》首映交流分享会 / 姚欣可

行业兴趣

- 78 AI 大数据专委会理事会换届大会
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 AI 大数据专委会

各地校友会简讯

- 79 湖州市清华大学校友会成立 / 湖州校友会
- 79 亚利桑那校友聚会纪念“一二·九” / 蔡挺
- 79 江西校友会 2023 年迎新活动举行 / 江西校友会
- 80 廊坊校友会举行 2023 年年会 / 廊坊校友会
- 80 沈阳校友会举行迎新座谈会 / 沈阳校友会
- 80 青岛校友会举行敬老迎春联谊会 / 青岛校友会
- 80 欧洲清华校友交流沙龙举办 / 意大利校友会
- 81 南京校友会迎新春联谊会举行 / 南京校友会
- 81 安徽校友会举办新春联谊活动 / 安徽校友会
- 81 贵州校友会举行慰问老校友新春团拜会 / 贵州校友会
- 81 阿联酋校友包饺子迎春佳节 / 黄静静
- 82 平顶山校友会举行 2024 新春座谈会 / 平顶山校友会
- 82 全英校友会举办首届“全球时事与人工智能”研讨会 / 全英校友会

82 卡尔加里校友会参与主办《草原之夜》文艺晚会 / 卡尔加里校友会

人物剪影

83 童寓：“信步西东”的建筑人生 / 刘梦妮

87 读懂父亲袁复礼的一生 / 袁方

90 “气候特使”解振华 谈判桌上 16 年 / 霍思伊

回忆录

97 回忆在校团委工作的那几年 / 贺美英（1961 届电机）

103 与光共舞——我的科教人生 / 左铁钊（1964 届机械）

史料一页

109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的由来 / 宗和

110 江西清华校友会初创背后的故事 / 徐家鑫（1958 届水利）

112 杭州校友会成立初期的一些回忆 / 赵葆初（1958 届工物）

115 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学生艺术团民乐队 / 刘沫（1997 级水利）

119 上海清华中学的由来 / 陈世梁（1964 届机械）

怀念师友

120 社会学泰斗“强爷”走了，去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 宋春丹

126 弦歌不辍伴师归

——回忆刘西拉老师 / 江枣（2005 级博，土木）

131 怀念我的老师龙驭球先生 / 张楚汉（1957 届水利）

132 无私的奋斗者方澄 / 任重 冯钟潮（1959 届机械） 钟学初

136 和徐瑜青老师一起调研的日子 / 姜朋（教）

139 清华选调生王卿逝世，年仅 35 岁

141 应用光学专家潘君骅院士逝世

141 张天泰老学长仙逝 享年 100 岁

142 海南校友会原会长尹双增逝世 / 海南校友会

142 建筑声学家徐亚英先生逝世 / 建筑学院

143 化学系离休教师何其盛逝世 / 化学系

143 清华大学原副总务长裴全同志逝世

138 七绝·哭李强院长 / 孙明君（教）

138 七律·痛悼李强老院长 / 肖红缨（2012 级博，教研院）

138 七律·悼刘西拉老师 / 安利群（1981 级化工）

荷花池

- 144 高原既立望高峰 / 万俊人 (教)
- 147 诗意清华诗意人——《因为清华》创作自述 / 吴鹤立 (1983 级力学)
- 150 话说校花紫荆花 / 姚坚 (1980 级自动化)
- 152 记忆微光中的大礼堂 / 杨蓉 (1988 级汽车)

桑榆春晖

- 155 “银发导游”徐孝蔚：用热爱传承历史与文化

诗词书画

- 156 七绝·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卅周年感怀 / 万俊人 (教)
- 156 七绝·奉和万兄俊人院长 / 孙明君 (教)
- 156 清平乐一首 / 王延军 (1979 级机械)
- 156 毕业四十年忆清华 / 杨宝林 (1979 级电机)
- 156 浪淘沙·雪后游园 / 谷焕成 (1983 级自动化)
- 157 七律·睹同学视频介绍母校风光 / 张强 (1988 级电机)
- 157 七律·毕业五十年重逢 / 孙世明 (1970 级机械)
- 157 水木结缘——庆祝建校 113 周年 / 王东光 (1970 届工物)
- 157 七绝·清华人文先贤群雕落成典礼 / 孙明君 (教)
- 157 清华园梦境 / 黄强 (1993 级硕, 自动化)
- 157 七绝·清华人文社科三十年 / 刘石 (教)
- 157 篆刻 厚德载物 龙行四海 / 陈森根 (1970 届自控)

回馈母校

- 160 车辆学院“瑞麟奖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 / 车辆学院

158 2023 年校友奖学金、励学金获奖者名单

封面 自清亭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鹏

封二 清华要闻

封三 海角天涯

插页 今日清华

校友联络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摄影 李派 孙波 杨艳宾等

插页设计、电子排版 吴振鹏

清华大学 2023 年十大新闻揭晓

由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2023年十大新闻评选”活动日前结束，经网友投票和专家评议，入选的“清华大学2023年十大新闻”如下（按照新闻发生时间排序）：

1.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制定实施《清华大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行动方案》，首次开展全校党员集中培训和党支部书记集中培训。

2.原创话剧《马兰花开》首演十周年，首次赴港澳演出。

3.成立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秀钟书院、安全科学学院，启动物理人才培养“攀登计划”。

4.清华最大的室内运动场馆北体育馆落成亮相。

5.主办世界和平论坛等高水平国际论

坛，启动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国际合作联合行动，持续开展高水平国际交流。

6.荣获2022年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7.薛其坤获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最高奖巴克利奖，6位教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气复合污染治理教师团队入选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8.举办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何东昌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70周年系列活动。

9.李路明同志任清华大学校长。

10.全球首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商运投产、研制全球首颗新款忆阻器存算一体芯片成果入选2023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2023年清华大学最受师生关注的十大亮点成果发布

为充分发挥高等学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营造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推动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清华大学组织开展2023年清华大学最受师生关注的年度亮点成果评选活动，经组织提名、专家评选、师生投票，产生十项亮点成果，并在2023年清华大学科研创新工作交流会上发布。

十大亮点成果如下：

1. 千亿参数对话大模型ChatGLM（计算机系唐杰团队）

2. $\gamma\delta$ T细胞免疫识别机制（药学院张永辉团队）

3. 揭示宇宙早期星系演化——对星系循环内流的首次成像观测（天文系蔡峥团队）

4. HTR-PM安全性试验（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张作义团队）

5. 揭示植物感受重力的分子机制（生命学院陈浩东团队）

6. 半导体黑磷的超快瞬时能带调控（物理系周树云团队）

7. 人工智能设计锂电池电解液（化工

系陈翔/张强团队)

8. 支持片上学习的存算一体芯片 (集成电路学院吴华强团队)

9. 甲基化指引的染色质去乙酰化动态

与多模态机制解析 (医学院李海涛团队)

10. 贸易争端与产业政策竞争: 解读中美经济冲突 (五道口金融学院鞠建东团队) (科研院)

清华大学—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创新联合研究院正式揭牌

2024年4月1日,清华大学—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医药创新联合研究院(以下简称“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丙所举行。

清华大学校长、联合研究院管委会主任李路明代表学校向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长期以来对清华大学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清华大学有着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和多学科综合优势,国药集团是我国医药行业的领军企业,双方共同成立医药创新联合研究院,是贯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国家战略导向,进一步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未来双方以联合研究院为平台,充分发挥学校科技、学科、人才的综合优势和企业技术、设备、资源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产出更多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原创成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联合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刘敬楨表示,国药集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秉承“护佑生命、关爱健康”的企业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积极服务国家战略,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国药集团首次与国内一流高校建立联合研究院,开创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范式。联合研究院的成立,正是清华与国药集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战略举措,旨在立足“四个面向”,共同打造高水平国家级创新平台,成为全球生物制药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

仪式上,李路明和刘敬楨共同为联合研究院揭牌。

揭牌仪式后,联合研究院管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李路明在讲话中对联合研究院的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要心怀“国之大事”,增强对国家重大需求的洞见力;二是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和系统性布局,凝练关键科学问题、推动原始性创新;三是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做真正有价值的科研;四是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刘敬楨在讲话中表示,未来国药集团将积极地为联合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各项科研成果的临床转化提供大力支持,希望携手清华将联合研究院打造成标志性、典范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样板,以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普惠广大人民群众,切实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会议还宣布了管委会成员和

机构成员，审议了联合研究院章程和年度工作计划。会上，管委会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校企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学科交叉和成果转化、积极探索合作新范式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

双方相关负责人等参加揭牌仪式，管委会成员和部分嘉宾参加了管委会会议。

国药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

的以生命健康为主业的中央企业，拥有科技研发、工业制造、物流分销、零售连锁、医疗健康、工程技术、专业会展、国际经营、金融投资大健康全产业链。2022年12月，清华大学与国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签署协议以来，双方不断推进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人才和技术转化等方面交流合作。（田姬熔）

辽宁省—清华大学省校合作座谈会举行

2月28日下午，辽宁省—清华大学省校合作座谈会在主楼接待厅举行。校党委书记邱勇、校长李路明会见来访的辽宁省委书记郝鹏、省长李乐成一行，双方就推动省校合作进行座谈交流。

邱勇代表学校对辽宁省委省政府给予省校合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一年，清华大学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从严从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制定实施《清华大学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行动方案》，奋力在新征程上开出新局、开好局。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清华大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双方合作走深走实正逢其时。希望双方结合自身优势，积极探索省校合作新模式，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东北全面振兴贡献更多力量。

郝鹏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清华大学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对清华大学过去一年在科技创新、教育教学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绩表示由衷钦

佩和诚挚祝贺。郝鹏说，近年来，清华大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特别是去年邱勇书记带队来辽推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向外界释放了辽宁持续向好的良好预期。今年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攻坚之年，诚挚希望清华大学继续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持续与辽宁提升合作层次、丰富合作内涵，在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谱写省校合作新篇章。

李路明表示，辽宁省与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合作渊源，在产学研转化、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多点开花、硕果累累。他简要介绍了学校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并表示，新的一年，省校双方都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爬坡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找准省校合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努力实现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加强重点领域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以更多高质量的合作成果更好地助力省校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李乐成说，清华大学教育实力、学术

实力、科研实力强大，长期以来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希望双方能深入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务实合作。在教育领域，与辽宁省高校积极开展学科共建；在科技创新领域，与辽宁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共建国家级科研平台，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人才领域，鼓励更多毕业生来辽创业就业；围绕

战略决策咨询，鼓励专家学者为辽宁省科学决策提供资政参考。辽宁省将全力为清华大学来辽人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创造便利条件，做好服务保障。

会前，郝鹏、李乐成一行前往清华大学校史馆、化工系实验室和航院实验室参观调研。

辽宁省和清华大学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徐子越 王晓霞）

校长李路明会见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校长

2月7日上午，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校长巴德兰·阿洛马（Badran Alomar）一行访问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在工字厅会见代表团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交流并续签两校合作备忘录。沙特驻华大使阿卜杜拉赫曼·哈勒比（Abdulrahman Alharbi）、副校长王宏伟参加会见。

李路明简要介绍了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相关情况和推进实施全球战略、推动海外基地建设的相关举措。他表示，近年来，在清华大学发起成立的亚洲大学联盟的支持下，清华师生多次到访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两校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未来希望双方在框架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合作内容、拓展合作领域，开展师生交流、联合科研和国际会议等全方位合作，促进中沙师生在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开展对话。

巴德兰·阿洛马回顾了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的办学历史。他强调，清华大学是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的重要合作伙伴，两校积极打造具有标识性的协同创新合作平台，努力为促进两国关系良好发展贡献

力量。未来两校还将围绕生态学、人工智能、医学等重点学科开设短期课程、促进师生交流和学术科研合作，续写两校合作新篇章。

阿卜杜拉赫曼·哈勒比大使在交流中提到，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出席苏欧德国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中沙两国政府和高校将积极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在中文教育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两国的未来在青年，沙特青年热爱汉语、向往中国文化，未来也欢迎清华师生赴沙特交流体验。

国际处、亚洲大学联盟秘书处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是沙特阿拉伯最古老和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也是亚洲大学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校建于1957年，设有8个学院，在工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学科方面有着卓越的成绩，并为沙特各界输送大量人才。截至2023年底，沙特苏欧德国王大学共有8位教师入选亚洲大学联盟学者项目，该校百余名师生多次参加了各类联盟学术会议及学生短期学习和文化交流项目。（林源）

海淀区与清华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3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与清华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会见来访的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张革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校地合作、校区协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进行座谈交流，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和海淀区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共同探索出“海·清”社区服务行动等系列创新举措。双方协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对学校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服务海淀智能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助力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具

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拓宽合作渠道和形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张革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海淀区要当好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新质生产力示范区。清华大学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海淀区重要驻区单位之一，一直以来大力支持海淀创新发展。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启校地协同发展新篇章。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唐超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代表双方签署《海淀区人民政府清华大学共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战略合作协议》。（董鲁皖龙）

求真书院“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024级预科班开班

2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2024级预科班开班仪式在主楼后厅举行。求真书院副院长王小芳主持开班仪式。

校长李路明首先代表学校向各位预科班新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向关心培养他们的老师和亲友致以敬意和感谢。李路明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发展历史和求真书院的成立背景，鼓励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坚定学术追求，在数学领域做第一流的学问。

求真书院副院长陈志杰、林勇先后介绍了求真书院的发展情况和预科阶段的培养、考核以及管理要求。2023级数学领军计划学生黄劲涵作为学生代表分享了在书

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求真益友学者代表朱知非介绍了过去两年作为益友学者的心得体会。2023级数学领军计划学生白洺宇的父亲白青力作为亲友代表发言。

仪式最后，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对同学们提出四点期望：一是希望同学们培养对学问的兴趣，洞悉宇宙的结构和美感，致力于“求真”与“求美”的学术追求。二是树立崇高目标，达到做学问最高的境界。三是打好学术基础，培养追求学问的能力。四是积极与老师、益友学者和同窗交流，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学术底蕴。

求真书院相关负责人以及教师和学生代表等参加活动。（求真书院）

国际力学、材料及工程科学领域顶级专家 高华健全职加盟清华大学

1月13日上午，清华大学在丙所会议室举行高华健先生讲席教授聘任仪式，国际力学、材料及工程科学领域顶级专家高华健全职加盟清华。校党委书记邱勇、校长李路明出席聘任仪式。副校长曾嵘主持仪式。

邱勇代表学校向高华健教授全职加盟清华、成为清华大家庭的一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清华大学坚持把人才强校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战略，把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高华健教授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家”，在众多选择中毅然回到祖国、来到清华工作，令人感动。2024年是学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高华健教授的加盟对于清华力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高华健教授充分发挥在人才培养、工程创新、学科交叉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带动清华工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与清华同仁一道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李路明介绍了高华健教授的简历和主要贡献，并为他颁发了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聘书。

高华健表示，自己与清华的合作由来已久，事业发展也得益于清华师生的一路支持。自己一直有一种期盼，那就是有一

天回到祖国，来到清华工作，与大家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力学是工科的基础、理科的应用，是学科间的桥梁。自己愿积极发挥桥梁的作用，促进清华力学学科的快速发展，促进其与不同学科、与国内外优秀团队的深入交流合作，同时也希望成为助力更多年轻学者成长的基石，尽己所能帮助他们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

清华大学土水学院、精仪系、车辆学院、电机系、航院、化工系、医学院、人事处等相关负责人参加聘任仪式。

高华健，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曾获国际固体力学最高荣誉希尔奖（Hill Prize）、国际应用力学最高奖铁木辛柯奖（Timoshenko Medal）、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奖章（ASME Medal）等国际顶级荣誉奖项，是迄今为止国际力学领域唯一同时获得以上三大荣誉的科学家。研究横跨力学、材料、机械、仿生学等多个领域，主要研究材料、结构和生物系统的宏微观形变和破坏行为，代表性工作包括：创立了基于微观机制的应变梯度理论，揭示了多种新型微纳米结构金属材料的塑性变形机制和断裂机理，建立了纳米生物结构的力学理论体系等。培养了博士生35人，指导了博士后37人。其中，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20余人回国后成为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曲田）

毕业七十载 无限好夕阳

○宗家源（1954届水利）

今年是我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70周年。70年来，历经悲欢离合，到现在正是“夕阳无限好，诗书画歌舞”。

我是日军侵华1931年“九一八”之前五天，9月13日生。童年时，经历14年日军侵略之痛苦，颠沛流离，母亲病逝，在农村只靠年迈的祖母照顾。在此期间，看过日本人吊打我们的村民壮丁，听过表姐被强奸至疯，贫苦的村民活活饿死，这些苦难虽已久远，却还历历在目。

幸好我祖母的娘家比较富裕，我们常请人到她娘家担米回来，这样才不至挨饿。我还得到乡下举人后代办的私塾读书。

1945年，日军投降。我到香港找我父亲，开始入读中华中学。由于我继母子女多，父亲无力供我读书，幸得中华中学黄祖芬校长减免我学费，我才能完成中学学业。至1952年到清华大学读书时，国家正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培养人才，学费及食宿费都全免。我申请读水利系专修科，1954年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以及工作过的地方包括陕西西安、宁夏银川、甘肃兰州、南疆喀什、北疆可可托海、甘肃碧口。1976年，我被调回广东省，进行青溪水电站初设、三水北江大堤加高加固及芦苞水闸改建、飞来峡大坝选址以及

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初设和技施设计。

退休后，我返港，在香港佛山工商联会又做秘书工作30年零3个月。

现在，我正是夕阳之时，有退休金，生活无忧无虑。为了充实自己，过得有意义，我练习书画，每日写诗，有时约朋友唱歌跳舞。由于有这些活动，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强壮。我在四十多年前，由于长期垂下头绘工程图，致使颈部骨质增生，压住血管和神经，脑缺氧，曾一度在工地晕倒，入院治疗，不能上班近半年多。幸好当时在广州交易会，有师傅收徒练健身功法，由此我天天练功，身体不断好转，开始可以半日上班，最后至全日上班。晚年可以作诗、书画、歌舞。

由于长期坚持锻炼，我写出的字，也有气有力，得到李锦记老板李文达的欣



2023年4月，宗家源学长（左3）与顾秉林老校长（左4）等一行在香港参观“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的人和事”专题展览时合影

□ 值年园地

赏，请我写了很多幅字，上送到高层领导，下送其儿孙，还送其中国和外国朋友。在香港和上海的李锦记大厦，还有一米八高、八米长的“思利及人”四个大字，在墙上最显著的位置。正是，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现在，国家正在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想到当年受日本的侵略和凌辱，今天国富民强，我特别高兴。相信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会愈来愈伟大，繁荣富强。

我至今仍喜欢写诗，作了一首《毕业七十周年感怀》，追忆往昔、叙说现在，相信明天会更好！

七十年来家国情，
江河笔迹已留成。
新疆冰雪雄心烈，
甘肃风云壮志宏。
踏缺贺兰黄水到，
攀登从化电能生。
退休回港诗书画，
返老还童是我征。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陈世梁（1964届机械）

我是1964届机械设备制造及工艺专业六年制本科毕业生，至今已经毕业60年了。退休以后常常回首大学的日日夜夜，翻看整理大学六年写下的40多万字的日记。很多老师、同学的音容笑貌都仿佛还在眼前——谆谆教诲、激烈辩论、关怀互助、远道实习等。

2000年3月，我60周岁时从《解放日报》退休。2014年，我毕业50周年，实现了在大学时许下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诺言。我想把自己的一生回顾总结一下，于是从整理历年文稿开始，经过8年努力，2023年春节前终于完成了35万字的回忆录《我怎样当记者》。

我觉得在上海市委的党报党刊《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工作的19年，是我大学毕业60年来最出彩的19年。人们一定很奇怪，一个学工科的大学生，怎么改行当了记者？

1964年9月25日，我到上海机床厂报到，被分配在厂工艺科，这是和我专业对口的科室。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劳动一年。我们被安排在油漆车间劳动。10月16日，厂部为新进厂的80多位大中专毕业生举办欢迎会，厂部安排我代表新进厂的毕业生发言。会后调我到二车间劳动，还没有摸到车床，厂部就调我到厂“五反办公室”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经历了一些运动之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在两个厂陆续走访了近百个工人家庭，了解了上海人的生活状况，交了一些青年工人朋友，不但听懂了上海话，还能“洋泾浜”地说几句。

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很长的编者按，说毛主席指示教育革命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为落实毛主席指示，厂里创办了上海机床厂七二一

工人大学。此前，我到军宣队办公室帮忙，这次我又被军宣队调到厂政宣组，从事“七二一”指示的学习宣传工作。

1978年10月，我被调到机电一局教育处，参加机电一局系统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整顿工作，组建上海机电一局职工大学总校，任命我担任总校教务长。在机电一局职工大学总校，从招生、考试、毕业、教学管理到课程设置，我们按大学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后来又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十多年里，尽管我一直听从党的安排在努力工作，但我根本没有接触过技术工作，已经不可能回到技术岗位了。彼时我已经快40岁了。

1979年10月，上海市广播局在全市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条件之一是40周岁以下，我还没过线。我觉得这个职业专业性很强，而且我在学校时也当过校广播台记者，听过中央电台记者的培训课，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经过初试、面试、商调、领导谈话等过程，1981年4月，我当了记者。

《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传承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创刊于上海解放的1949年5月，是一份面向全社会的大报。《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初级党刊，创刊于1954年7月，由时任市长陈毅同志题写刊名，编辑部设在市委办公厅。“文革”中停刊，1980年10月重新出版。刊物性质仍然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初级党刊，但编辑部作为《解放日报》的一个部门，设在《解放日报》社内。我是“定向”招聘到《支部生活》编辑部的，因此，我拿《解放日报》的记者证，干《支部生活》的活。

编辑部领导告诉我，作为党刊，必须



1986年3月，陈世梁作为上海《支部生活》记者，采访中共上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留影

重点抓好党的政策教育、形势教育、理论学习等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指示我主要从事理论学习方面的栏目设计、组稿、撰稿、发稿任务。

《支部生活》既然是党刊，就必须发出党的权威声音，忠实传达党中央、市委精神，为基层党建注入正能量。但这方面的稿子，一般的基层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必须得到权威部门的支持，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也是“无巧不成书”，我调到《解放日报》后，就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母亲和哥哥，被和哥哥一起工作的同事知道了。这位同事高兴地说：“国栋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平时很熟，他调到上海任第一书记我还没有祝贺他，正好让你弟弟去找他。”她让我哥哥转交给我陈国栋同志和他的秘书在上海的电话，让我和他们联系，转达对他们的问候。

有了这个“令箭”，我顺利地与市委主要领导陈国栋、胡立教以及他们的秘书联系上了，当面请他们支持搞好《支部生活》的有关宣传。他们听说我是党刊记者，高兴地说：“你们是市委的党刊，贯彻中央、市委的有关精神是媒体的责任，

□ 值年园地

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支持。”

有了市委领导部门的支持，《支部生活》在迎接党的十二大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发表了署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的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大大提高了《支部生活》在上海媒体中的地位。

编辑部领导责成我抓好党的十二大的宣传。在中央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和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我们从出版文件专辑开始，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分期刊出“党的十二大报告内容提要”“学习问答”“问题解答”“小词典”“小测验”等不同栏目，化繁为简，取其精要，突出宣传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字数不多但分量很重，具有权威性和可读性，作为基层党组织生活的学习内容，受到读者欢迎，市委也非常满意。

此后，我在报社和编辑部领导的支持下，主持编辑的《支部生活》栏目和文章，有许多次创造了上海期刊的“第一”或“唯一”。其中包括：

——1983年，中央决定对全国青年工人进行政治轮训，市委宣传部要求《支部生活》配合。《支部生活》版面有限，不可能全部登出讲课内容，我建议除了在《支部生活》上开辟专门栏目外，每月一次的讲课内容单独出版一本《支部生活（学习版）》公开发行。领导同意了，《学习版》发行量达21万份。《支部生活》“名利双收”。

——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为响应中央关于收集整理革命老前辈光辉事迹和丰富经验的指示。在中顾委办公厅、总

政宣传部、全国妇联、团中央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和《支部生活》合作，我们在北京采访了21位革命老前辈，以《革命前辈的心声》为总名称，出版了《将军的话》《致青年朋友》《母亲的心愿》共3集录音磁带，于1987年6月12日正式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发行座谈会。首都各大新闻媒体都刊登了《革命前辈的心声》的出版消息。《人民日报》称：“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第一次”。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要求上海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同志指示宣传部要和《支部生活》配合，每年在《支部生活》出版一本反映上海建设成就的特刊。编辑部领导责成我负责主编。1992年是《上海·浦东·未来》，1993年是《跨世纪的历史丰碑》，1994年是《龙头昂首铸辉煌》，陈至立同志为每一期特刊都写了《序言》。我为能连续三年主编这一套专辑，展现上海发展的光辉业绩，感到无限荣光，终生难忘。

——根据报社党委的授意，1995年经过我的运作，创办了《党课教材》月刊；1998年8月，《党课教材》与中央党校求索音像出版社合作，创刊了音像杂志《干部视界》双月刊。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专程来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并对上海市委、市政府支持办好音像杂志《干部视界》表示感谢，认为这是“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党员干部教育的有益尝试”，给予高度肯定。

——在刊物经常性报道上，为体现党刊和期刊的特点，我也出了不少好点子，受到读者好评。比如在宣传四项基



1994年7月6日，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陈国栋（右2）、第二书记胡立教（右1）应邀参加《支部生活》创刊40周年座谈会，左1为作者陈世梁

本原则、拨乱反正的各项任务时，针对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读者，我设计了甲、乙对话等形式，化繁为简，化深为浅，便于理解和接受。我也写一些短小精悍的理论文章，回答热点问题。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经济转型时期，大量原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待业。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我设计了“政策解读”“问题解答”“咨询台”等栏目，刊登市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细则，方便读者对照执行。同时发表通讯、述评等宣传“送温暖工程”“再就业工程”，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

在朋友的邀请下，我也曾四次出国（境）采访。每次出访都有收获，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到阿联酋的访问，此行完全改变了我对中东的印象。回到上海以后，我立即动手写了《我驻阿联酋外贸人士建议：抓住时机开拓阿联酋市场》，被《人民日报》大内参转载，受到中央高度重视。随后几年，中央和上海与阿联酋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热络。

从《解放日报》退休以后，我继续为

社会做贡献。一是2001年协助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建党员服务中心，并在其中工作6年。二是2005年9月到2010年3月，协助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上海市社会服务局做一些文稿编写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三是尽己所能为社区做好事。从2007年6月起，我应聘担任了5年的静安区政风行风监督员。四是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我担任《解放日报》退休党总支第四党支部书记，为本报退休党员服务。我在社区的活动是不拿报酬的，是一名志愿者。我的原则是要么不答应，答应了就要认认真真当份责任。这十多年的居民生活，我得到的奖状比我在退休前得到的多得多。

在发挥余热之余，我花很多时间回顾我在报社的工作情况。发现自1981年6月开始至2000年1月退休，我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近千篇自己写的稿子，约94万字。主编来稿200余万字，约占《支部生活》1981—2000年总用稿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主编专刊、专辑8种，18万字。此外，我还为《解放日报》承办的上海新闻业务培训班学员讲课。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没有违背大学毕业时许下的诺言，也做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我在《退休感怀》中写道：当然，我的工作都是在领导的指示、支持和同志们的配合下完成的，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账下。我是“螺丝钉”，所以在“邀赏”时没有我。我从不主动申请任何荣誉称号，也放弃评定全国或上海好稿的机会。功过自在人心。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母校的关怀 不竭的动力

○ 周长海（1970级工物）

岁月如梭，从清华母校毕业一转眼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在我人生的职业生涯之中，最值得怀念和感恩的是始终得到了清华母校的大力支持。2003年3月我奉调武汉海军工程大学（简称“海工大”），担任训练部长（教育长），负责大学日常教学组织、实施和管理的工作。我在此岗位工作了7年，也是与母校联系最多的一段时光，重温当年清华大学帮助海工大提高办学水平的情景，总是让我难以忘怀。

其实，海工大与清华渊源颇深。建国初期的1950年，清华大学就选派了4名教师和10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到海工大前身大连海校工作和学习；1974、1975年前后，又有16名清华毕业生到海工大任教。据统计，至今已有60多位清华学子来海工大工作，他们理论扎实、业务精湛，大多都成长为海工大基础课以及重要学科专业的带头人，为海工大的创建发展、为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中有曾任学院副院长的陈绍焯（1950届电机），罗云少将（1950届机械），电工系原主任张盖凡（1951届电机），核科学技术学院的张大发教授（1972级工物），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陈少昌（1979级自动化），图书馆馆长赵建新（1978级力学）等；中国工程院院士、舰艇综合电力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八一勋章获得者马伟明少将（1993级博，电机），何梁何利

科学进步奖获得者、船舶与动力学院院长张晓锋少将（1993级博，电机），都是张盖凡学长在海工大培养成长起来的杰出人才。

2004年下半年，海工大接受了迎接海军总部组织的“全军院校教学评价”的重大任务，“迎评”的相关准备工作需要于2007年之前做好，时间紧、要求高，我倍感压力。我仔细研读《全军院校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总计52个评价点中有43个都与本科教学质量直接关联。我还查阅了地方高等院校教学评估的情况，发现清华参加了当年的教学评估工作，综合成绩位于全国高校前茅，我马上产生了去清华学习的念头。之后不久，我校领导率队去清华取经，母校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召开座谈会，我校有关人员还与清华教务处等部门进行了对口学习。我所接触的母校有关负责同志，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传经送宝，令我终



2004年，陈希书记（左4）访问海军工程大学，左2为周长海学长

生难忘。

清华大学本科教学水平之高蜚声海内外。我们提出了选派大学二年级优秀本科生去清华学习的请求，目的是通过他们在清华后两年学习的效果，一方面来检验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状况，倒逼我们查找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措施，为今后的教学评价做好扎实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军校学子们有机会受到清华大学良好育人环境的熏陶，在未来建功部队基层的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清华为此做了大量的组织保障工作，最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以上都有力地帮助和推动了海工大教学评价“迎评”工作的扎实准备和顺利实施，我们也将此作为“办学特色”写入了我校教学评价主报告中，受到总部相关领导和专家组的高度评价。

新形势下两校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交流逐步走向深入。根据两校委托培养协议，2004年以来，海工大先后从全校大二学员中遴选了5名优秀生，到清华完成后两年的本科课程；从新入学硕士研究生中遴选出7名优秀学员，赴清华深造。这12名学员分别攻读完成本科、硕士学位，其中学员张永发还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担任海军工程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某教研室主任，是本单位教学科研的重要骨干。

2005年以来，清华大学先后有6名国防定向生毕业后来海工大工作。这些优秀学子来到我校后，不但经受住了学校组织的队列、体能，以及具有海军特色的野营拉练、水上科目等高强度入伍训练，又分别在海工大、清华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很



2007年2月26日，在北京海军京海大厦举行“清华大学与海军工程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快融入了军校大家庭，成为我校教学科研队伍里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随着合作办学深入进行，学术交流互动也很活跃，且层次高。清华的李衍达、王大中、杨卫等院士，陈希书记、顾秉林校长等知名专家学者，都专程来我校做过学术报告，在我校师生中引发强烈的反响。我校船舶与动力学院院长张晓锋，2008年曾受邀给清华在读的全体国防定向生作了题为“清华学子投身海军建设事业的呼唤”的报告。他详细介绍了国家海洋的安全形势，高新科技进步对海军装备建设的推动，以及部分清华学子投身海军建设的感人事迹，他的演讲受到同学们的高度赞扬。

2007年12月，《清华校友通讯》主编孙哲、老主编钱锡康等，来海军工程大学采访。在武汉期间，召开了三次校友座谈会：与海工大初建时期来工作的陈绍炘、郭日修（1947教，1950年调海工大任教）等十几位老校友座谈；与部分年轻校友及国防定向生座谈；与联合培养的本科生座谈。他们还重点采访了当年在海工大不同

□ 值年园地

岗位上任职且成绩突出的部分中青年校友。

2003年9月，我陪同我校郭立峰校长、马伟明院士访问了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陈希书记亲切会见了我们，双方进行了深入细致、富有成效的交流。这次会谈使两校的合作育人有了良好的开端。2004年上半年，陈希书记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后，专程访问海工大，参观了校园和教学科研设施，并与我校领导、专家教授进行了座谈交流。母校领导贺美英、庄丽君等也曾访问海工大，对学校工作给予热情指导。还有清华两任党办主任白永毅、王岩，他们是帮助海工大提高办学水平、组织两校交流最主要的牵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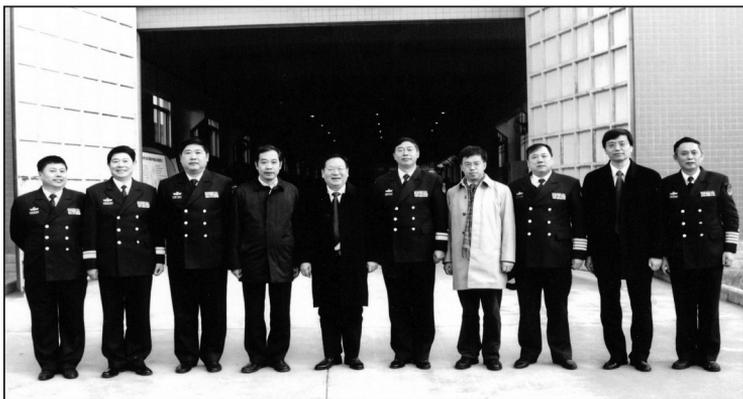
2007年2月26日，在北京海军京海大厦举行了“清华大学与海军工程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出席仪式的时任领导包括校长顾秉林院士、原校长王大中院士，副校长康克军、陈旭，党委副书记史宗恺等。海军方面的领导有海军副司令丁一平中将，海军副参谋长尹长志少将，海军工程大学校长郭立峰少将、

政委余献义少将等。在返回武汉的路上，我思绪万千，经过几年的协调，顺利完成了两校合作协议的签订，作为一名清华学子，同时又以海工大一名领导的身份在中间穿针引线，内心感到特别激动和自豪。

2009年11月22日是海工大建校60周年，顾秉林校长、史宗恺副书记等受邀出席了我校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清华的贺信，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与顾校长一行进行了亲切的会谈。顾校长还为全体军校学员作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告。

寒来暑往，岁月不居，2010年我从岗位上退休了。回望履职海工大的这几年，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参加完成了《海军综合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课题研究，获得了总部颁发的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该成果同时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另外还获得过海军级“教育理论创新”一等奖一项；特别是2007年11月海军工程大学参加总部组织的教学评价，荣获了“全军优秀院校”的称号。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组织上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与清华母校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如今我们1970级的同学都迈入了古稀之年。往事虽然慢慢淡去，但美丽的清华园却深深定格在我们脑海中。我们将永远铭记母校的教育之恩，永远怀念同窗的校友之情。祝愿1970级老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圆满，友谊长存！



2009年11月，顾秉林校长（左5）一行出席海工大建校60周年活动

不忘来时路 清华情满怀

○苗长顺（1970级电力）



苗长顺学长向电0班班主任黄立培老师（右）献花

不忘来时路，奋斗新征程

我是1974年从清华大学电力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分配到辽宁省沈阳电机厂（后改制为沈阳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沈阳电机厂是国营大型一类企业，电动机产量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电机总产量的20%，我为能到这样的企业工作而自豪。在沈阳电机厂工作的33年里，我先后担任过产品设计员、设计处副处长、总工程师。工作期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去，时刻用“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来鞭策自己，不能愧对“清华大学”这个光荣的名字。

在刚踏入沈阳电机厂的大门时，我就认识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对于一个电机制造企业来说，我是个新兵。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向老师傅学习在书本里学不到的本领。一入厂，我被分配到设计处工作，担任产品设计员。

入厂半年左右，我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走遍工厂的主要生产车间，主动给现场工作的师傅们打下手，虚心向师傅们学习。就这样，我学到了实际操作的本领，也和工人师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更好地从事产品设计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担任产品设计员期间，我开发了十几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有五项产品获市以上科技进步成果奖。比较突出的项目有大庆油田生产的侧水冷高速2200千瓦给水泵电机，为河北唐山陡河电厂设计的3200千瓦高速上水冷大型给水泵电机，为辽宁清河电厂设计的2000千瓦60极大球磨机同步电机以及为广东茂名化工厂配套的1000千瓦20极增安型无刷励磁大型同步电动机。我还完成了大型高速电机和Y系列中大型异步电动机的系列设计。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我编制了《大型电机的使用与维护》资料并亲自到大庆油田讲课。每一项工作背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在工作中我没有出现过差错，我由一个普通设计员被提升为主管设计员、设计处副处长，后来又担任总工程师。

在担任总工程师的20年里，我领导完成了企业主导产品的更新换代，淘汰了六十年代的J系列落后产品。任职期间，我还兼任全国大电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和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系列开发电机产品，使企业的产品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完成了企业的多项管理升级，由

□ 值年园地

国家二级企业成为国家大型一类企业；完成了多项技术改造项目，使企业的生产能力始终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工作干完劲没完， 继续做好“传、帮、带”

2007年，我退休了，被聘为沈阳工业大学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至今。

沈阳工业大学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一所从事永磁电机研究的科研机构。中心主任唐任远院士是我国永磁电机研究的领军者。退休后能到这样的科研机构工作是一件幸运的事，也是把我在企业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予以运用的最好机会。

到中心工作后，我的第一项工作是编制了《永磁电机生产工艺守则》，总结了电机生产企业多年的生产经验，使永磁电机的生产工艺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规范，弥补了科研机构在永磁电机生产产品上的不足。

赣州是老革命根据地，也是我国稀土永磁材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赣州市政府委托中心编制《赣州市永磁电机发展规划》，由我担任主笔。我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为赣州市永磁电机工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2017年，我还为赣州诚正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年产100万千瓦高效新能源稀土永磁电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促进了该企业的转型升级。为了提高我国电机制造企业的制造水平，我编制了《电机制造企业职工培训教材》，教材在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



二〇一三年，苗长顺（左）
与唐任远院士在赣州调研

本国策。电机是能源的产生者，也是能源的消耗者。工业领域的60%以上的能源消耗在电机上，所以，近年来，我把提高电机本身的效率和提高电机应用的系统节能做为电机节能的两个重要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在提高电机应用的适应性、电机产品性能的先进性、电机产品质量的可靠性、电机产品生产效益的合理性和产品不断更新的继承性这五个方面，我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学校的安排下，我担任了“学业与发展”这门课程的主讲老师。课程主要针对大四毕业生，指导他们在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以便毕业后更好地工作。在国家需要的领域找准方向，面向社会找准位置，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要把我多年的经验传授给同学们，做好“传、帮、带”，贡献余热。

清华情满怀

我的成长和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母校的培养和教育。在校期间的点点滴滴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入学后不久，学校组织拉练，我们走了一千多里。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重走长征路，不当老爷兵”。当时我在炊事班，每天背着二十多斤的大铁锅，此外还要背行李和粮食。炊事班由老师、食堂师傅以及学生组成。行军时，炊事班的成员要快走，挤出时间，在同学行军到达目的地时，把饭做好，在同学们吃完饭时，我们还要提前出发，为下一顿饭做准备。当时学生每月供应的粮食是定量的，炊事班也不能多吃。想起红军走过的长征路，苦点、累点都觉得值了。那期间，我们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从不睡懒觉，也从不晚睡觉，上早操、体育课从不缺席；同学们早晨的第一件事经常是拿起拖把抢着拖宿舍走廊的地面；星期天和同学们经常去食堂帮厨包饺子，开饭时到饭厅里排队买饺子；星期天我们经常去郊区的菜地劳动；经常去食堂的猪舍里挑猪粪……我觉得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本色！

“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入校拉练时，由老师们提出来的说法，同学们感

到非常亲切。老师和同学一起拉练，一路行军一路歌，一路教同学英语，非常快活。学习期间，老师们到宿舍里给同学们辅导，从不讲条件；“一帮一，一对红”是同学之间互相学习的口号。我的帮扶对象是王德甫，中学文化，全国劳动模范，天津直流电机厂厂长。我们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大学的几年学习使我们成了知心的好朋友。王德甫毕业后，回到原单位工作，取得了多项成绩，为我国直流电机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在校期间，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多个新项目的研发，其中有为汽车配套的无刷发电机、为北京饭店研发的低噪音电动机、火车上的交流白炽灯等，填补了国家空白。清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使我们在毕业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工作。“三点（宿舍—教室—图书馆）一线”是我们每天的学习轨迹。在清华的几年，我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本领，为走向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清华园学习的日日夜夜，更不会忘记我的同窗学友。什么是清华情？清华情就是，老师与学生相互尊重，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结下的师生情；清华情就是，手拉手、肩并肩，不让一个同学掉队，真正做到“一帮一，一对红”；清华情就是，一代代清华学子在奔赴共同理想的路上结下的深厚情谊。

不忘来时路，清华情满怀。



电0班全体同学毕业合影

空九是我载梦的小船

○胡运昆（1979级热能）

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旅途是从清华园开始的，清华大学既是我的母校，也是我心中的圣地。

空九班集体是一条小船，载着全班同学的青春和理想，穿过清华这条通往光明的河流，把我们送进祖国改革开放的海洋，去实现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的梦想。

离开学校已四十载，入学时自己还是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踏入社会后，心中不时会想起母校的校训，常回忆起母校的容颜，大礼堂的圆顶、图书馆的红墙、高高的主楼台阶和清华学堂不灭的灯光。照澜院的小路上曾经留下了我青春的脚步，阶梯教室的黑板上也记载着我朦胧的理想。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蓦然回首，才发现人生既波澜壮阔又如此简单。回眸历程，我们全班同学都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见证了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的过程。匆忙的脚步使我们忽略了太多美好的情怀，现在应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记忆深处那五年的清华岁月，回忆难忘的集体生活，品味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青葱岁月。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富有理想、值得追忆的年代。经过铭心刻骨的高考，我终于带着亲人的嘱托和老师的期望，从昆明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程，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从火车站乘校车到清华大学新生接待点用了两个多

小时，路途虽然不易，但是我内心的热情却丝毫不减。我清晰地记得，迎接我的是赵庆珠老师和空八的学长。赵老师是我五年大学生活中唯一的班主任，是五年如一日像母亲一般用全身心关爱着我们的人。

我们班有35个同学，25个男同学和10个女同学，分别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最多的是北京同学，有三男三女；其次是上海同学，有两男一女；其他同学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一到两个人。年龄最大的是28岁的北京同学常安中，年龄最小的是山东同学王玉华，那时才15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纪是在18到20岁。班主任赵老师是清华毕业的老学长，不只教学与科研工作十分优秀，而且还有“清华郭兰英”的称号，后来不仅参加了清华同方的创建过程，还在首都音乐厅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记忆中



2014年，返校参加校庆时与老师合影，前排左5为赵庆珠老师，最后一排右1为胡运昆

清华最响亮的口号，崇尚体育、强身健体是学校的传统。紧张学习的同时，每个同学都不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学校的大喇叭就响起激昂的背景音乐——《运动员进行曲》，广播里发出热情昂扬的号召：“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图书馆和宿舍，涌向田径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或者跑在通往圆明园的小路上。

大学五年，我们班的两任班长为班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班级的主心骨，也是我们的楷模和榜样，对我们全班同学影响深远。第一任班长常安中，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比我大12岁。安中同学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回城返京当过工人，阅历特别丰富，学习勤奋努力，为人和蔼可亲，特别关心同学。在我学习上或者思想上出现困惑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给我答疑解惑。毕业后安中同学留校任教，最后还和我们班的大姐林梅喜结连理，双双赴美深造。

我们班的第二任班长是姜胜耀同学，他和我住一个宿舍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彼此的感情也比较深厚。他为人宽厚，学习特别刻苦，做事有毅力，确实做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后他考入清华核研院读研究生，后来到德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后回校任教，并且与我们班才女吴莘馨喜结良缘，双双成为了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后来老姜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与学校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校师生为母校一流大学的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班有十位女同学，女生人数当

时是不是全校最多的我不能肯定，但肯定是全系最多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各种款的都有”。我们班的女生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温婉贤淑、秀外慧中。当时学校不提倡学生谈恋爱，虽然很多青年才俊跃跃欲试，但大多都没有得手，倒是我们班前后两任班长技高一筹，充分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娶得美人归。

现在留在国内发展的女同学，不是知名教授就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是所在单位的领军人物。我们班的才女朱颖心、吴莘馨、张欢同学，一直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已经成为国内各自学科的学术领头人。后来听赵庆珠老师说，当年我们班李玢和张欢两个女生还在北京和天津的选美比赛中获奖，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份光荣吧！

民以食为天，清华的食堂是每一个清华学子难忘的记忆，学校的伙食享受国家的补贴，降低了学生的负担。我们热能系在学生六食堂定点吃饭，建工系定点的五食堂离我们也不远，所以大家偶尔也去换个环境感受一下。记得最清楚的是早餐的大油饼，金黄的油饼是长方形的，中间有两条缝，吃起来油而不腻，香味宜人，再配上咸菜就着稀饭吃，感觉十分的畅快和满足。另一个让我难忘的就是“佛手”，芝麻酱放进发面里做成馒头再切几条口子，面皮翻开让芝麻酱露了点出来，像一只白白胖胖的手，非常受欢迎，去晚了还经常买不到。总之，当年清华的学生食堂对我来讲已经是美食天堂，让我至今难忘。

清华面积大，上课是骑着自行车跑点，一会跑阶梯教室，一会跑化学馆，一会跑三院，一会跑清华学堂，可以说就是毛主席说的“运动战”和“麻雀战”。自习时间学生自行安排，我自习常去的是三

□ 值年园地

院、三教和图书馆，图书馆的座位靠抢，错过了时机就不容易占到位。

学校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先后安排我们到食堂帮厨，到金工车间、南京和大连实习，创造不同的机会让我们了解社会和理解专业的工程实践。通过金工实习，我初步了解车、钳、铣、刨、磨、铸造等机械加工的基础工艺和操作技能，通过南京实习，我初步了解所学专业的基本工程概念，参与了工程实践，大连实习则是对所学专业工程理论的深化和细化。

到食堂帮厨使我深深感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为通过几次帮厨，我的表现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逐

步升级成关照，到后来，我的面票也可以打到米饭了，这对一个南方人来说，就是天大的关爱。

我五年大学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让我倍感自豪的一点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光荣的班集体里，我们的班集体中有慈爱的老师和品学兼优的同学，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了不同的温暖，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我们空九班连续五年都获得校级先进班集体称号，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应该也为数不多，对此我深感自豪，至今难忘。

亲爱的母校，永远是我心中的圣地！
1979级空九班，永远是我载梦的小船！

毕业“而立”之年，忆数学江湖

○ 曹 阳（1989级数学）

毕业三十年之际，回忆清华五年岁月，重点写写几位恩师。交代个背景，清华数学系虽然在数学界排名不高，但是虎瘦雄风在，看在清华这个牌子的面子上，前辈高人对我们系也提了不少建议。本文后面要提及的许以超先生曾经对我们说过，数学界从华罗庚老先生以下，没有不爱看武侠小说的，所以数学界就像个武林。许先生的话是不错的，而当时的清华数学系在这个武林里面，地位大概算是五岳剑派的华山派吧。

那时候国际上有两大高人时不时光临指导一下：林家翘先生叮嘱系主任萧树铁先生要提高应用数学的培养，算是剑宗一派的祖师爷，而陈省身先生指示要加强纯数学的培养，算是气宗一派的祖师爷。萧先生本人是剑宗的，但是不管是国际大

气候还是国内小气候都是气宗占了上风。那时候的副系主任是我的老恩师李庆扬先生，可惜和风清扬的名字差了点儿，没法儿提升剑宗实力。但萧先生那会儿觉得清华数学系发展气宗肯定比不过咱们的老邻居北大，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这帮弟子们最后能够在剑宗上面开花结果。当然了，风



曹阳毕业时与萧树铁先生（左）合影，萧先生是数学系当年的系主任



毕业时与同宿舍同学合影，右2为曹阳

水轮流转，如今的清华数学系终究是气宗领了头儿，这又是后话了。

1989年入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届看似来了些好苗子，萧先生就有了些振兴华山派的想法。要振兴，就得有好先生，而且是剑宗气宗都精通的内外兼修的先生，所以我们大一时候请来了两位成了名的侠客。一位是教分析的陈天权先生，一位是教高等代数的许以超先生。我们以下就称为陈先生或老陈和许先生或老许。

陈先生出身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派，也就是北大了。据说陈先生进北大的时候，萧先生刚从清华调整过去当助教，所以对陈先生很熟悉。按照我另外一位老恩师龚光鲁先生的说法，陈先生一进大学就显得卓然不群。他来自上海，进大学的时候已经熟练掌握四门外语，经常在宿舍里翻阅外文原版的数学资料了。二年级时就发表论文，题目是《典型拓扑域上的黎曼可积性》。于是被评为少林十才子首席，排位还在另外一个来自上海的、如今中华武林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张恭庆院士之上。据说当时陈先生和张先生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钻研的正是气宗的绝学：布尔巴基

学派的公理化体系。

当时内蒙古大学的校长听说了，亲自过来把陈先生要过去了。陈先生一身的武艺，到了内蒙古倒也没完全撂下，但好歹是耽搁了。然后他选择的方向又是数学物理中比较难啃的湍流。非得内外兼修到达化境不可。有一种说法是，数学物理这一门，一个世纪出一个大的发现，所以要是你运气不好活在这俩世纪当中了，那就算是耽误了。陈先生在内蒙古一待就是几十年。

1989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关系好像才刚刚转回清华，印象中是住在筒子楼里，后来才算在东门外头分了套房。要说在内蒙古也有好处，陈先生身板儿硬实，上海人看起来也成为了北方大汉的形象。

陈先生治学严谨，板书非常漂亮，从左上角写起，有图有字，一直到右下角，一黑板满满当当的。讲课的时候，中气很足，尤其是要强调什么内容的时候，会用眼睛盯着台下，用极缓慢沉重的语气来说。我们在宿舍里会学几个陈先生的段子，比如“希尔伯特的三大弟子”“庞加莱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数函数跑得非常快”，还有一个“四维空间的女人”。这些写在文中，不详尽讲述，恐难领会，不过昔日同学，记得当年岁月的，应默契在心。

陈先生从掌门萧先生那儿领了旨意，想好好栽培下我们数九。现在在我看来，这个想法是有些问题的，大抵天才的老师只能教天才，因为天才们真的不大容易理解咱们凡夫俗子的痛苦。陈先生一旦领了旨，就把给我们教书当做学问那么办了。首先是选教材，陈先生选了莫斯科大学的数学力学大师卓里齐教授的教材。我们学

□ 值年园地

的时候，第一册刚出版，第二册是我们全班同学手刻油印的，手抄本儿。这套教材承袭了陈先生大学时候就很崇拜的布尔巴基学派的风格，用公理化体系来讲解微积分。上来是集合论，然后是实数公理、区间套法则之类，这些在传统上是实分析的内容，要大三才教的。而我们上来就学这个，就好比进了少林寺上来就教你十龙十象功却不学太祖长拳一样。苏联这样是一来有喜欢玩抽象的传统，二来他们高中学过微积分！当然陈先生进大学以前也学过微积分，可叹我们这帮半吊子一进校门就练上了这样的上层武学，那叫一个天旋地转啊。陈先生教书也不单独布置作业，因为书上的每道习题就是作业啊。什么？书上的题目做完了？那不是还有一本儿菲赫金格尔兹的书么？另外还有一整本儿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呢！生活充实吧！

就我个人的感觉，第一年还勉强能跟得上，两年过后班上除了某两位极为顶尖的学生以外，卓里齐的教材就基本上变成《天书奇谭》了。尤其到后来习题交上去，助教也不会了。当时还有一道习题，陈先生也做不出来了。我们班那两位“最强大脑”辛苦了一礼拜，做出来了。陈先生很高兴，有一天上课就说，今天我们就来讲这道题吧，那证明，抄了一黑板又一黑板，一节课就这么一个证明。不知道笔记收藏家赵雷是否还有当时的笔记呢？

除了教课，偶尔的，陈先生也会谈谈人生。我记得有一回座谈，陈先生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看的电影《居里夫人》（1943年出品），着重讲了居里夫人在寒冷的巴黎没有暖气的屋里坚持学习的故事。讲的时候，陈先生还顺带背诵了电影里面大段



2019年返校参加活动，和陈天权老师在一起。
左起：黄忠亿、陈天权老师、曹阳、黄伟青

的外文对话，天才的记忆力啊！我也去过陈先生的家里，客厅的墙上一整书架的书，最底下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

陈先生为了我们，真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我们那会儿只是觉得太苦了，后来我自己在美国教书，才明白陈先生那会儿的辛苦。我们毕业以后，就听同学说，陈先生头发白了。我2006年回国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了退休后在北大返聘的陈先生。那会儿再看，确实是见老了，不过依然活跃在讲台上。再后来听说陈先生在北大教书一直到2012年。

许以超先生的派头，就完全不一样了。许先生也是少林出身，读研的时候去了中科院师从华罗庚先生。许先生来清华讲课就带了我们一届。严格地说，许先生不是清华的老师，他来自中科院，当时因为我们这一届生源不错，系里专门请他来给我们讲课。许先生很好玩儿，不上课的时候无精打采，就是个小老头儿的样子，一上课，就跟打了啡啡一样，精神头儿可好了。许先生讲课用的是他自己的书《代数学讲义》，那会儿书还没有出版呢，所以也是手抄本儿。也许因为是自己的书吧，许先

生的代数课讲得深入浅出。许先生那会儿讲的东西，到现在我都记得。他比较注重从几何的观点看代数问题，很注意讲解每一个定理后面的思想。另外老许对出题做题都有一套，曾经当过多年国家数学奥赛集训队的教练，属于初等数学高等数学通吃。到我们毕业的时候，虞桥他们几个去看许先生，那会儿他的书才正式出版，虞桥他们居然就蒙许先生当场签名赠书，让我看得好生眼馋啊。

比较下两位先生，我觉得因为老许有玩奥赛教学的经验，接地气，所以衔接性比较好，比较容易让大一的学生接受。老陈玩得高雅，比较适合给高年级讲。总的来说，头两年能够得到两位老侠客的教导，我们还是挺幸福的。也许是一上来满汉全席吃厉害了，再以后的课总觉得不给力。不是说其他的先生不好，但确实太不配套了。卓里齐的书把架子搭那么大，观点提那么高，到后来大二大三又回到太祖长拳的套路上去，让我感觉有点儿被桃谷六仙各注真气一道的意思。当然这也是我自己学艺不精，未能融会贯通，怪不得各位先生。

再记两句关于萧先生。他当系主任时，去我们班听课，正好是陈先生讲量纲。陈先生让我去解一题，我按步骤解了，然后告诉陈先生，我觉得这方法有问题，和先生争辩，下课才知道萧先生在后面听课。过了半年，雷子告诉我，萧先生认为我是个很好的学生。那时我们班牛人多多，我实在没觉得自己算啥，但先生既如此说，则必有道理。于是我信心大增，最后提前毕业，留校读研。觉得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提了家乡的腊肠去看他。他说拿走，怎么学会这一套了。我说真是自己家里做

的，特别好吃。先生终于收了，那次我们聊了很多，从法国大革命聊到古希腊……他指点的书我后来读了，还读了别的好多书。先生的教诲，我受益颇多，此生莫敢忘记。

其他的老师，我就不一一道来了，只随便提几个人。

首先是白峰杉，老白是我们进校的第一个辅导员，也算是我的大师兄。老白当时告诫我们要专心学数学，不要老想着谈恋爱或者学英语考托福，影响极其深远，咱们班的男生多实诚啊，就把老白的话放心里去了。结果到了第二年考英语四级的时候，真就有好几个没过的！更悲催的是，到毕业那会儿，明面儿上有过女朋友的就一位啊。

黄文兆老师是从北大请过来教常微分方程的，口音很好玩儿，第一堂课上来说某年国内发现了一个“钢丝”，这个钢丝，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怎么办？用碳14检测法。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的，很久才明白过来，说的是马王堆的干尸啊。

吴秀明老师是老白去英国以后的第二任辅导员，中科院刚毕业过来的。小伙子很帅，还会武术，有道是数学家会武术，谁都挡不住啊。他是个实在人儿，跟我们玩得跟哥们儿似的。

杜兆伟是老许以外我最喜欢的老师，也是教代数的，学问很扎实，记性也特好。有一回吹牛说他当年背过圆周率的一百位，于是我们当场就要他背，他就在黑板上写，一连写了四十多位，说不行了，老了记不住了。

懵懵懂懂，悠悠三十载已过。记忆的碎片一旦形诸文字，有些往事就复活了。清华园中的岁月锦绣美好，值得珍藏。

在另一个“清华园”里，收获“战士”学位

○刘 婷（2010级外文）

我2010年入读清华大学外文系。2012年12月，正在读大三的我应征入伍，成为导弹方阵里的光荣一员。两年后退出现役，返回学校继续读书。严格意义上讲，今年并不是我本科毕业10周年，而是退伍10周年。

从大学到军营，从学生到士兵，在军营这座“清华园”里，我汲取着课堂上不曾学到的知识，更加理解了责任与使命，读懂了忠诚与奉献，学会了守护与担当，培养了坚毅与果敢。2014年，我没有如期拿到“学士”学位，却收获了一个“战士”学位。

报名参军

——“去哪儿都行，干啥都行！”

参军的过程，一波三折、充满艰辛，最终的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日语专业赵蓉老师在一门课上偶然提到，人文学院曾有两名师兄于2010年入伍。那时我刚刚从日本交换归来，第一次得知原来在校大学生也可以参军！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参军的念头一经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我火速从校园里张贴的征兵海报上找到了武装部吕冀蜀老师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填表报名。然而，2012年是实行网络报名的第一年，对年龄有严格的限制，超龄几个月的我怎么也报不上名。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跑一趟武装部，请吕老师帮忙想办法。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对吕老师立下的保证——“让我



2014年9月，刘婷（左1）带领女兵进行训练

去哪儿都行，干啥都行！只要能让我当兵”。

可能正是这种坚定与执着感动了老师们。在学院、武装部的积极协调下，我总算取得了体检资格。后来又经过漫长而令人煎熬的等待，终于在新兵起运前几天收到来自武装部的好消息。

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我都十分激动。我去当兵的决定让日0班的同学很震惊，当时他们大部分都还在日本交换学习。临行前，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的辅导员王斌范师兄，亲手将我大一刚入学时手写的入党申请书的复印件交给了我。带着老师同学的祝福和期待，我踏上了从军之路。

初入军营

——“凡事只能往前冲，决不能往后退！”

正因为报名的过程充满波折，入伍后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初入军营，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并没有觉得落差很大，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每天都在整内务、搞卫生，不停地走队列、背规程，时间被规划到分秒，甚至言行都受到限制……然而这些旁人觉得异常枯燥的事情，我都乐在其中。既然选择，就要脚踏实地，不能轻易放弃。

还记得刚入伍半年，旅宣传科科长找我约稿，想让我谈谈到部队后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然后又是怎样通过努力克服的，达到先抑后扬的宣传效果。没想到我的回答是“没有不适应，非常喜欢”，就这样约稿失败了。

和所有名校士兵一样，最初，大学生的身份、“清华”的光环总让我们在军营里显得另类。记得入伍前，社科学院的万一师兄曾叮嘱我：“清华的学生凡事只能往前冲，决不能往后退”，当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每年有十来个清华学生入伍，分散到几百万人的部队里，我们就是基层官兵认识清华的窗口，常常会觉得“压力山大”。我们同一年入伍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都不喜欢别人拿“大学生”身份说事儿，反倒是抓住一切机会申请参加各项训练、演习任务。

新兵第一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在外人看来，这些本不该是这个年龄学生所会经历与承受的，我们却乐在其中，并在其中有所收获，“部队的一切自己都能接受，只因为热爱。”

收获成长 ——“不怕苦、不怕累，只怕闲”

在部队里，我所在的连队是男女混编连，但男兵女兵的待遇却大不相同。曾经，百公里徒步拉练，女兵要留守；野外驻训，女兵也无缘。对我们这些中断两年学业来到部队的大学生士兵来说，“养尊

处优”“轻松过关”绝不是我们的期待。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在征求了战友们的意见之后，我们主动向连长、营长、参谋长请示。三番五次的请求下，部队首长终于答应了我们全程参与，而这一走就是四个“百公里”。因为那次任务的出色完成，再加上全年保障工作成绩突出，女兵排收获了历史上第一个集体三等功。这样的“请缨出战”后来还发生了许多次，写过“请战书”，“围追堵截”过各级领导……

对火箭军来说，实兵实装训练机会难得。为了能进场训练，我和战友们将各类设备操作的规程教范烂熟于心，我们重新编写、完善了六套装备的操作规程。旅队女兵第一次走进野外训练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战车和战位，我也成为旅队历史上首位参与实装训练的女兵指挥员。

由于驻训地环境差、任务险，开始的时候，紧急出动、转进训练等科目不要求女兵参加。然而，我们的决心与勇气再一次打动了部队首长，后续的任务中，女兵全员全科目全训，与男兵无任何差别。

无论野外生存条件多么恶劣、训练多么艰苦，我的战友和我带的兵，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没有一人因生理原因或伤病缺席过一次训练、打过一次报告。半夜里在几座孤坟旁，守着电台和装备执勤，帐篷里常有蛇虫出没，没有人说过怕；十几个女兵20分钟搭起一座容纳整个营的餐厅帐篷，没有人喊过累；穿着笨重闷热的防护服训练几个小时，衣服拧得出汗水来，训练间隙倒在黄土坡上就睡着，没有人叫过苦……

我在部队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政工网的特约撰稿人。白天带新兵，晚上加班写

□ 值年园地

稿子，经常因为思考某篇稿件而彻夜难眠，也曾因为一次次加班错过和战友们的聚会、休息。

过勇老师到部队看望我的时候说，清华学生“不怕苦、不怕累，只怕闲”。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告别军旅 ——把这身军装穿出了“兵味儿”

军营里有常常出现的新挑战，也有现实与想象的落差。但当兵两年，这份“喜欢”越积越厚，越积越重。

八一军徽，丛林迷彩，导弹兵臂章、领花、肩章加一双作战靴，这在我眼中是“军人最美的装扮”。记得初入军营，营长对着还是新兵的我说：“这衣服穿在你们身上怎么这么奇怪呢？”我们用两年时间把这身军装穿出了“兵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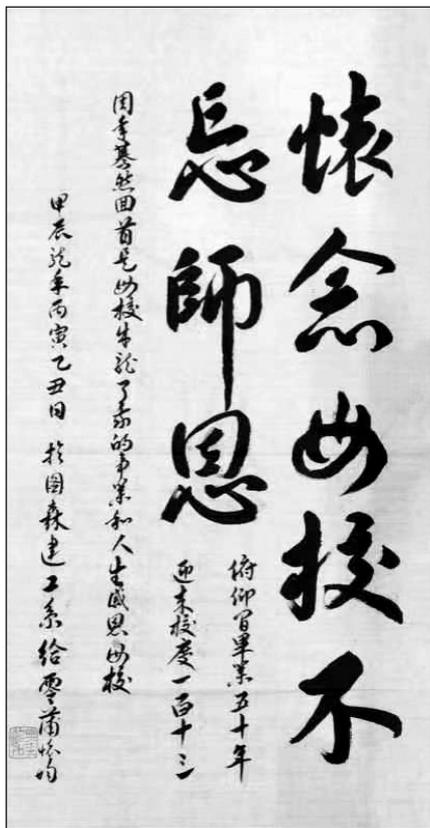
那两年，我扎根在军队的土壤里。基层部队条件极其艰苦，但我内心却无比充盈，非常有获得感、荣誉感。从我下决心去到现在没有一刻后悔，因为这完全是听从自己内心做出的选择。自己选的路，哪怕荆棘丛生，一路走来都会异常坚定。

那两年，我成长在军营里。列兵军衔的时候就开始当班长带兵，当教练员、指挥员，两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这些都比不过老班长们的一个评价——“这个清华的女兵不错，这个班长不错。”相比于那些有形的收获，忠诚、勇敢、担当、战友情……部队赋予我的这些精神上的力量，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让我永远珍视。

临近退伍，连队的一次聚餐上，一个军龄十几年的老班长突然和我说他非常后

悔：原来新兵刚下连的时候，营里要把我分到他所在的专业，让他当师傅来带我，但是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hold不住一个清华的学生，不想收，但是后来他后悔了。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当时就热泪盈眶。

退伍返校后，我到国防教育与人才培养办公室担任辅导员，带着清华园里的国防生们组织活动、开展训练。先后两次带领清华国防生远赴大洋彼岸的西点军校交流，继续和清华国防人并肩战斗。在部队从军两年，我收获着人生最宝贵的磨砺和成长，享受着奋斗的快乐和吃苦的幸福。致敬我人生中的两个“清华园”！



书法

○蒲怀均（一九七〇级建工）



回忆五六十年代的清华男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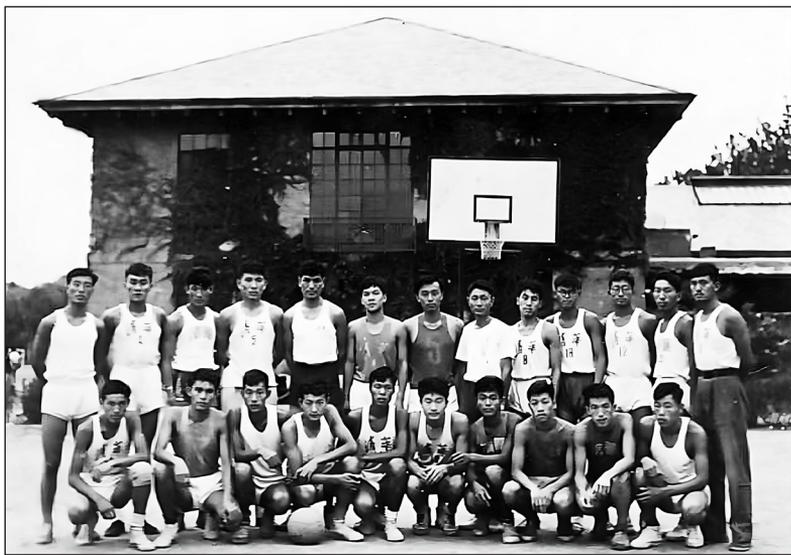
○王光纶（1963届水利）

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在我入学报到后的第三天，校篮球队的胡燕庚同学就来找我，让我跟他去见校男篮教练曹宝源老师。见到曹先生后，他让我两天后随校男篮去张家口市进行访问比赛。也就是说我一进清华大学还没开始课堂学习，就首先进入了校篮球队。当时男篮队里年级最高的队员是八字班的樊本德、牟灵泉、翁立臣、尹翼开，接下来是零字班、一字班的李蒙、金涤尘、俞颐秦等，我进队是班级最低、年纪最小的，老大哥们都亲切地叫我“小老弟”，令我感到非常温暖。

在张家口进行篮球比赛还有个“身份

三变”的趣事。1957年暑期高考后，我代表北京中学联队到张家口比赛，当时的身份是中学生；不久，张家口市组队到北京访问比赛，北京青年队（专业队）因刚刚组建，缺少组织进攻的人，于是又把我叫去帮助北青队和张家口队比赛，这时我的身份又变成了专业运动员；这次清华男篮到访，也就是第三次相遇，我代表清华大学参加比赛，身份又变成了大学生。张家口队中和我打过三次比赛的队员就比较熟悉了，对我打趣地说：“你是孙悟空呀，变得真快，一个月里变了三个身份！”

1958年暑假，共青团北京市委组织“北京市青年赴长山列岛海防前线慰问



1958年，清华男篮在球场欢送老队员。后排左2为王光纶学长



1959年，清华男篮部分队员在体育馆内篮球场合影

团”，作为慰问团的组成部分，清华和矿院的部分校篮球队员组成了一支篮球队，队中来自清华的有我、李志敏、宋尽贤、梁长青等。慰问团中还包括了国家体操队、北京舞蹈学校的演出队，以及英模代表。劳模、北京建筑青年突击队队长张百发特别爱看篮球，所以和我们篮球队很熟。后来他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有一次在工体看我们比赛，他还特意在主席台上和我打招呼。

我们篮球队这次和驻防不同岛屿的战士球队打了五场比赛，丰富了战士们的业余生活，通过比赛和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慰问比赛过程中还有过一次“小惊险”，有一次到一个小岛去慰问比赛，只能乘平底的小登陆艇去，恰巧那天遇到了风浪，船颠簸得特别厉害。战士们都是久经考验的“铁人”，一个个仍稳如泰山坚守工作岗位，可是我们这些陆地来的“旱鸭子”就不行了，几乎所有人都被扶到舱内躺下，甚至有的已经呕吐、眩晕。李志敏、梁长青和我三个人感觉还比较

好，就站到船头甲板上想体会一下颠簸冲浪的刺激。过了一会儿，志敏突然也不行了，大口吐出胃液，足足喷出两三米远。几位战士马上跑过来把他搀扶到舱内躺下。我和梁长青就成为坚持到最后的“英雄”，战士开玩笑说，清华篮球队员还真挺厉害的。

1960年4月，我校男女篮被批准到济南参加全国篮球丙级联赛，决定晋级乙级联赛的名额（男、女队各两名）。当时男篮参赛的队员有蔡运枢、于瑞堂、李蒙、金涤尘、俞颐秦、曾宪成、李志敏、刘俭、刘维麒、张祥和我。联赛中我校女篮晋级成功，但男篮由于输给了山东队和北京体院队，没有晋级。但纵观整个晋级比赛过程，男篮的表现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和北京三队的那场比赛就是一例，该队是北京男篮专业队的青年后备队，教练是刘二柱（前国家男篮队员）。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紧张、刺激，竟然出现了三次加时赛。在加时赛中，我们在场上打球的队员还好些，反正脑子里想的就剩下一个拼字；可坐在场边等待替补的队员就特别紧张，他们紧握的双拳都攥出了汗，对场上进行的比赛是既想看又不敢看，眼睛是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更有甚者干脆转过身背对比赛场，那场面真是令人窒息。最后，还是我们赢得了这场比赛。回校后，“五四”青年节晚上全校在西大操场开会，校团委让我代表篮球队在大会上作汇报发言，宋尽贤赶紧写了一个稿子，由我到会上去宣读。当我读完紧张比赛的那一段描述后，同学们都激动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篮球队能给节日夜晚的同学们带来欢乐，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1960年8月，北京市体委向清华借调我到北京队，随陈毅副总理带领的政府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祝贺该国的国庆。代表团带了两支为他们国庆助兴的文体队伍，一个是重庆杂技团，一个是北京大学生篮球队。这个所谓的大学生队，实际除了体院的张泰荣和我以外，其他都是北京男篮的专业运动员。我来自清华大学，且为首发上场的队员，就成了球队的一个亮点。当时出国的人很少，中国还没有国际民航，我们是乘前苏联民航飞机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塔什干才飞到喀布尔，而且最后一段还要改乘不到50名乘客的小飞机。喀布尔机场很简陋，连航站楼都没有，只有几座帐篷作为乘客上下飞机的临时停留站。

在喀布尔，我们住在国王花园的客房里，室内没有正式的床铺，我们就睡在临时支起来的帆布行军床上。当时君主制的阿富汗还是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庆节当天警察在街上维持秩序，竟然骑在马上手持铁头的皮带驱赶群众，当场就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这里是高原，高原训练的滋味令我们吃够了苦头，跑动起

来喘大气、身上的汗却出不来，不一会儿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根本不想动。不过，训练几天以后身体感觉就逐渐适应了。在有国王和陈毅副总理观战的那场比赛中，我们的技术发挥基本达到了正常水平。而对手阿富汗国家队的水平相对较低，上半场结束前比分拉开比较大。这时主席台上就下来人传话：“注意点，咱们是庆祝人家的国庆节，而且国王还坐在主席台上。”教练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慢慢把主力队员换下来，并要求场上队员把比分差距控制在稳定的水平。最终，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1961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不少人都因吃不饱浮肿了。当时校党委为了让校体育代表队不要太伤“元气”，从东北农场调进一批粮食，给部分代表队队员增加定量，这一举措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困难时期过后，清华体育的竞技水平和其他高校相比发展明显地要快。当然，我个人也受益匪浅。

1963年以后，清华校男篮在北京高校中已成绝对的“老大”，二队也可以直接参加北京高校联赛。1964年8月，在北



1963年，清华男篮荣获北京市甲级联赛冠军、女篮晋升全国乙级队，受到学校领导接见。中排左起第三人：张益、曹宝源、杨道崇、张维、刘冰、马约翰、高沂、夏翔、王英杰、何介人、张慕萍，后排左4为作者王光纶

京举行全国高校篮球联赛，以清华为主组成的北京高校队获得冠军。1963年我毕业留校，已不能参加学生队的比赛，但仍可和学生一起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市级比赛和表演赛。1963、1964年的北京市篮球甲级联赛，清华大学都获得了冠军。当时的福建二队、全国空军队、装甲兵队、河南省队都曾被我们打败过，一般的专业篮球队已不是我们的对手。甚至有一次和北京队（当时全国甲级队）在体院篮球馆打教学比赛，北京队为了锻炼队伍把队员分为两组，一组是主力队员和体院队打，北京队胜；另一组是替补队员和清华队打。比赛中我和小符、小叶打了一个漂亮的反掩护，小符上篮得分，气得北京队教练张光烈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很不满意，觉得太丢面子了。最后是以平局告终，北京队二组总算没输给清华。

当时，外界对清华男篮也有了一定的认知，1965年下半年，西哈努克亲王想在柬埔寨举行一次青年联欢节性质的新兴国家运动会。8月，国家体委通知北京市，让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准备代表中国到柬埔寨参加这次运动会，并且批了专门的伙食补助费，发了新的天蓝色运动服，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运动会未能如期举行。可是伙食补助费一直发到“文革”前，为此男篮在校膳食科还专门列了一个户头，用于中午、晚上给男篮加餐，“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中，就曾有人抓住这点，批判这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特权。

男篮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固然和队员、教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特别让我无法忘记的是教练曹宝源老师对男篮无私的付出。为了男篮的发

展、提高，他真是呕心沥血。1958年我刚入队时，男篮打翻身仗，从市乙级队争返甲级队，曹先生当时胃不好，指挥比赛太专注、太紧张，如果我们输了，他会急得吐血。当看到这样敬业的老师，我们作为队员怎能不玩命训练？当练得特别累时，有时会半开玩笑地打趣：“为了不让曹先生吐血，咱们也一定要坚持练下去。”此外，动脑筋、善钻研也是清华男篮被外界公认的一个特点。体院的张泰荣（后赴香港任教练）就曾和我说过：“你们清华队打球规矩，善于琢磨对手，有股学生气。”我体会他所说的“学生气”，其内涵就是善动脑子、没有“小动作”，从来不和裁判计较，队伍的涵养比较高。除此之外还有两条也是很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保证。一个是领导关心、爱护，另一个是群众热爱、支持。清华大学师生都非常爱看男篮的比赛和训练，当时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周末如能在善斋前灯光球场看一场男篮比赛，那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了。比赛的球场往往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不少人还爬到树上看，更有甚者钻到后体育馆浴室的房顶上去看。男篮有时到城里体育场馆去比赛，“铁杆球迷”就结伙骑自行车赶到球场去看球，有时大冬天的从清华骑车到工人体育馆，一个个冻得满脸通红，我们看到这样的球迷真是深受感动。

校领导的关心和爱护更是我们男篮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当时的蒋南翔校长对男篮就特别关爱，20世纪60年代初，有几次夏天周末晚上，男篮在北海体育场打比赛，蒋校长就从他在教育部的住所赶到现场，体育场的工作人员专门为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主席台的角上，他就一

个人穿着蓝布中山服坐在空旷的主席台上，看我们比赛，直到比赛结束他才默默地离开。当时看台上就有观众好奇地问我们，主席台上那个带眼镜、穿蓝布中山装的人是谁呀？怎么那么关心你们队？于是“蓝布中山装”就成了我们对蒋校长一个会意的尊称。

不仅如此，60年代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农历大年初一上午，蒋校长总要在10公寓他的住所召开一次优秀运动员座谈会，我也有幸参加过一次，是张益老师带我们去的。在会上，蒋校长逐个询问我们学习和体育锻炼的情况，随后他鼓励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体育代表队要努力地锻炼，提高运动水平，并说苏联、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以大学生为主，我们现在还不成，嘱咐我们要努力，将来我们清华的大学生也要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听了校长这段话大受鼓舞。

除了蒋校长，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对男篮的关心和爱护就更具体了。男篮参加全国性的正式比赛他都亲自担任领队，还经常到训练现场鼓励大家。“文革”后的一天晚上，艾知生同志在校园里散步遇到我，曾和我聊起一段“文革”初期的荒唐往事。1966年6月，清华校内陆续开始揪黑帮、斗走资派，当时就有造反派质问他：“6月1号以后每天下午在党委办公室都见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搞阴谋诡计了？”艾知生告诉我：“其实，那几天下午我都是处理完交办的事情后，赶紧到体育场督战男篮，备战全国高校联赛，所以他们看不到我。”艾知生同志对我个人的关怀和爱护，我也是终身难忘。1961年末，水利系组织“水利化”小分队到顺义县张喜庄公社推广装配式渠道建筑物，

小分队由一位教师带领我们班八位同学组成。当时正值经济最艰难的时期，在张喜庄我们每天只能在公社食堂吃一顿真正粮食做的老玉米稀粥，另外两顿只能吃剥掉玉米粒剩下的棒子芯磨的粉，没有蔬菜，每人每天发一根葱。住的是老乡多余的空客房，这个所谓的屋子里只有一溜土炕，窗户纸都是破的。我们晚上睡前从院里压水井打半盆凉水，坐在炕头洗洗脸、擦擦脚，然后就赶紧钻进被窝。脸盆就放在炕沿边上，第二天醒来盆里的水都会冻成冰块。在这样的条件下，没几天不少人先后因浮肿返回了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留下坚持。应当说我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和在学校时有运动员粮食补助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

有一次周末，我回校向带队老师汇报工作，在顺义公共汽车站碰巧遇到了艾知生同志。他当时是市委派下去搞调查的工作组成员，他关切地问我饿不饿？我就把在张喜庄的吃住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马上到小商店给我买了一斤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大概就和现在的大白兔奶糖差不多，一斤要10块钱！当时，10块钱在他的工资收入中要占一个不小的比例，但他毫不犹疑。他把糖递给我让我吃，我虽然看见糖很想吃，但还是假惺惺地推辞了一下，他乐乐呵呵地说，看你都饿成什么样子了，赶快吃吧。于是我就很快把这一斤糖全部都嚼着咽下了肚子，艾知生同志一直坐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我把糖吃完。这个场面我终身难忘，至今仍好像就在眼前。

正当男篮积极准备再次参加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文化大革命”爆发，男篮五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也就戛然而止了。

教书育人五十年 平凡岗位尽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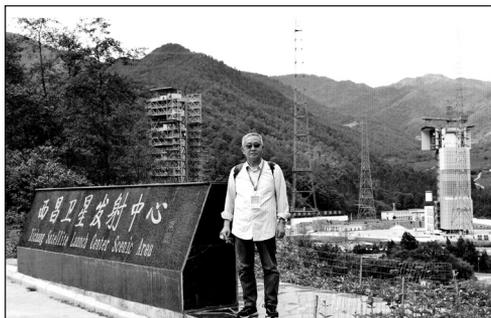
○ 施 工（1970届工物）

光阴似箭，毕业已超半个世纪。这几十年虽然平凡无奇，却还是有些值得回忆和说道的东西。有的是因为有趣，有的是对一些认识，有的则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评价，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初入职场，有幸进入 200 号

1970年3月上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结束了四年半的大学生活，搭坐一辆装了帆布篷的解放牌卡车，驶向位于北京昌平的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研究所，出于保密的需要，起了这个名字来掩人耳目。而在清华大学，大家习惯把它称为200号工地，简称200号。一路上心情特别复杂，既兴奋又夹杂着担忧。兴奋是因为当时200号刚刚上马了820工程，我有幸参加这项伟大的工程；担忧的是自己只学了不到九个月的大学课程，基础课还没学完，专业课更是一片还没碰呢，能胜任今后的工作吗？

虞寿鹏老师告诉我，我被分配到三连三班的控制组。组里同事们热情地介绍说，820工程是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会亲自批准上马的两项核能工程之一，目标是研究开发建造一座新型的热中子增殖反应堆核电厂。技术非常先进，研制难度非常大。三连是研究、设计核电厂的心脏——核反应堆的，三班是研究、设计反应堆的大脑——反应堆控制系统的。我和



2019年，施工教授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老教师解正国负责液动马达及其射流控制系统的研制，经常要进城到有关工厂、研究所调研和联系加工，早上坐班车进城，晚上赶班车回200号。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夜行乘火车到南口站，步行回来时迷了路，心里真的很害怕。我灵机一动，爬上一个小山包，四处一瞭望，马上看见了200号101大厅明亮的灯火，于是直奔灯火辉煌处，顺利回到200号。

科研工作辛苦而充实的。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实践，我的专业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得到很大提升。1966年时我改名施工，许多人认为我是想当工程师，没想到工作后真的搞起了820工程。

一不小心，当了老师

正当我在科研路上昂首前行时，命运发生了改变。1970年秋，清华大学招收了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称为工农兵学员。我们三连招了反应堆工程专业70多人，分成堆物理、堆热工、堆控制三

个班。为了教学，三连抽调了约十人成立了三连教改组（实际上就是教学组），我是被选中的人之一。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原意参加一些教学工作，我随口答应了。没想到以后我就“以教学为主”了，从工程技术人员变成了一名教师，一教就是50年。

教书也是我喜欢的工作，但新的担心又出现了。搞科研时我碰到不懂的事尽可请教老同志，极少会有人来问我，如今当老师了，每天都可能有学生来问问题。我们大学只学了九个月的课程，参加工作才刚半年，经得住学生问吗？幸好实际上困难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普遍较差且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时为照顾大多数，教师讲课时起点较低，且特别讲究表达方式，使学生容易听懂。这就使得我这个小助教可以“现买现卖”。为了当好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开始奋力恶补基础专业知识。从图书馆借来新出的英文版《核反应堆工程原理》死啃，每天晚上都坚持读两三个小时。

在教工农兵大学生的七八年中，虽时常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但与学生们朝夕相处、教学相长，我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当教师也使我获得了很多实践机会，我们200号有很多海军学员，所以我有机会带海军学员去我国核潜艇研究的909基地实习；又因为工人学员来自我国军用核材料生产厂，我有了机会带他们去404厂实习。我还曾带学生去火电厂和化工设备厂开门办学，一去就是几个月。在指导海军学员做毕业设计时，我们还用上了计算机，这在当年可是很稀罕的东西。我们用的是清华大学研制的112机，编程用的是机器语言，人机交互靠电传打字机。

立德树人，探索课程思政

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工作重返正轨。经过十年工作磨炼和在职攻读研究生，我和许多同辈“新工人”一样，终于能独当一面，从事讲大课等工作了。我主讲的是本专业的主干专业课“反应堆物理”，在课程负责人李植华老师的领导下，我们把这门课建成了清华大学“一类课”。当时在全校数千门课程中，第一批“一类课”只有四门，第二批也只有十余门，我们是其中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日益感到德育的重要性，要提高课程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德育是当务之急。但这不单是政工干部和政治课教师的工作，所有教师都责无旁贷。如何将德育与业务教学有机结合，而不是生硬地“贴标签”，我和李植华等老师合作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课程思政”问题。经过发掘梳理，我们认识到：反应堆物理这门课，与核能、核武器、环境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密切，可以很自然地结合历史和现实的事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制度自信和历史责任感。核能工程项目需要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协作，这一事实可以对群众观点的教育；从反应堆物理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可对学生进行《实践论》观点的教育；反应堆物理中使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可以对科学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教育；教学上的严格要求，可以培养学生严谨学风；启发式的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总而言之，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还研究了课程思政成效的评价方法。这些研究探索成果写成了

两篇论文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和《北京高教研究》上，并荣获了清华大学1992—1993年度教学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

参与系领导工作，管理、教学双肩挑

1994年，我被任命为工程物理系教学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金兆熊做系里的教学管理工作。这一届系领导班子上任之初，面对的是十分严峻的局面。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大学毕业生由统一分配改为自主择业，IT产业的大发展和核科技行业的暂时不景气，以及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工物系在招生、专业分流等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有些专业方向的课程几乎没有学生选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出现了下降。由于多年没有优秀毕业生去核工业部门工作，社会上对清华的批评日益尖锐。另一方面，科研方面项目和经费短缺，教师待遇低，留不住青年教师。

为了扭转局面，系领导班子决心进行大力度的改革。第一是招收培养核工业定向生，以确保向核工业和核科技部门输送高质量毕业生。第二是进行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把各个教研组各管各自一摊，改为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第三是利用教育部进行本科专业大调整的机遇，真正实现全系办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三项任务都是硬骨头。

系领导班子发动骨干教师进行深入研究，开展大讨论，统一了思想。在定向生培养上，设计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定向生能受到与普通学生同样好的教育，同样有免试推荐读研的资格；择业虽受一定约束但仍可在很大范围内双向选择，兼顾了学生和定向单位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

取得了很大成功。定向生的培养至今已实行了28年，为我国核科技部门输送了成千的优秀人才。全系办一个专业的培养方案注重基础，重视并强化实践环节，设计了全系学生必修的专业平台课程，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工物系长期存在的招生、分流困难问题，并使得我系在其后二十多年中一波又一波的教学改革中始终处于较主动地位。系管教学所管科研的体制，为我系抓住机遇、集中力量攻克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关键技术提供了人力和体制保障，从此工物系摆脱了多年的落后状态，一跃为全校的先进单位，重新焕发出当年建系时的勃勃生机。何东昌同志兴奋地说，工物系放了“两颗卫星”：成功培养定向生是“大卫星”，研制成功集装箱检查系统是“小卫星”。

在担任系教学副主任的同时，我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讲授的理论课有“核工程原理”“反应堆物理数值计算”和“高等反应堆物理”，还带“反应堆物理实验”课，教学工作量位居全系教师第一名，这种情况在工程物理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核工程原理”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反应堆物理实验”课也有了很大改进，教学要求提高了，实验方法更安全了。我系拥有的全国唯一的次临界实验反应堆装置，在全系学生的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学生在本科学习期间都有机会亲自操控核链式反应和预测反应堆的临界质量，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为此我付出多少辛劳也是值得的。

集中精力，深耕教学

在担任系教学副主任七年后，2001年

我提前一年辞去了这一职务，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并主动要求担任核21班的班主任兼核2年级主任。“不当系主任去当班主任”一时传为美谈。有了更多精力投入教学，我所教课程的教学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核工程原理”课一直在课评中获得高分。研究生课程“高等反应堆物理”的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基本成熟、完整了，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较好作用。研究生们在送我的教师节贺卡上写道：“施老师，您教会了我们学习！”作为一名教师，学生对自己工作的认可，是我最大的欣慰。

我从1970年开始工作到2008年退休，退休后返聘3年，到期后又干了4年。其间和其后还担任校、系两级的教学顾问，参加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担任核工程类专业认证委员会的认证专家和顾问，同时担任教育部核工程类专业教指委的顾问，为提高我国核工程人才的培养水平、让中国核工业走向世界继续发挥余热，至今还在不懈工作。这样算来，我已经达到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

2024年1月修订

从清华到江湖

○田战耕（1988级无线电）

回忆清华，就从毕业那年说起。1988年入学清华，1993年从清华毕业，弹指一挥间，三十余年矣。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渐渐远去了。

艰难的抉择

毕业的时候，我面临三个选择，分别是：本科毕业去工作；保送去邮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读硕士；读完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位。因为我很喜欢诗歌和文学，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在本科毕业后再读一年拿到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位。后来犹豫再三，觉得电子工程的专业很好，很容易就业，又正值信息化和通信大发展的前夜，还是忍痛割爱了。其实，留下读完中文系的同学也都找到了很好的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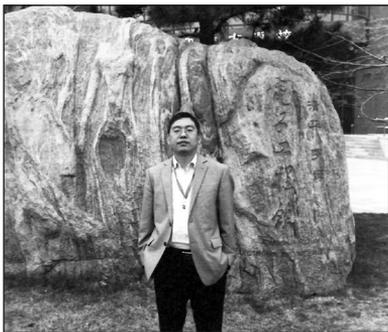
另外一个选择是本科毕业直接参加工作。一般的选择是去各地电信局，电子部各研究所，邮电部各研究所，中关村四

通、联想等公司。我们班的郭亚军同学就是在学校的双向选择招聘会上被其家乡的甘肃省电信局一眼相中，招聘人员紧紧握住郭亚军的手，生怕他跑掉。

经过一番比较，我终于决定去邮科院读研究生。我本来选择的是邮电部传输所，这个所主要是研究传输和制定各种国



2023年校庆返校，田战耕与同学合影。
左起：张翼、李海鹏、任建民、田战耕



田战耕校友

家标准规范。那个时候传输正从PDH（准同步数字系列）向SDH（同步数字体系）过渡，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可惜这些我在学校里并不了解。读研需要面试，导师杜森问了我一个ISO七层模型的问题，刚好我们学过杨为理老师教的网络课，里面讲过这个七层模型，面试自然是顺利通过了。这事本来就算定下来了，但我又心血来潮，去了邮电部数据所面试。导师蒋林涛在做可视图文终端，他也是清华无线电系毕业的，也很愿意要我。这时我就面临着又一次选择，当时一直举棋不定。后来觉得应该多搞点实际的东西，就选择了数据所。为此我只好厚着脸皮去向杜老师和副导师赵慧玲辞行。

这是我至今最为后悔的一个选择。传输所致力于协议、标准、规范，这是邮电部改制后所大力发展的方向；而做产品的数据所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工物系的熊四皓同学就是本科毕业分到了传输所，后来做到了省邮电管理局长，现在去哈工大当书记去了。和我差不多前后脚到传输所的曹淑敏，因为搞TDSCDMA标准，契合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后来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曹的继任者刘多（1984级无线电）现在已是上海市副市长，她也是我们清华校友。而数据所做

的一些技术很快被新的技术所取代，现在只剩保密通信和身份证加密芯片，因有国家保护，得以较好地生存下来。同时和我一起到数据所读研的毕建国同学（1988级自动化）就是搞保密通信的，他留在了数据所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国家保密通信作着重要贡献。

通信的发展历程就是从低速到高速，从铜线到光纤，从复杂到简单，从面向连接到包交换的过程。总之一句话就是IP取代了一切。这里面既有技术的进步，也有市场的选择。不过根本原因还是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也许是因为后来去了思科公司的缘故，我一直深信IP会战胜ATM（异步传输模式），路由器会战胜ATM交换机。数据所却执意要搞ATM交换机，最终被市场残酷地淘汰了。

很早就指出ATM干不过IP的还有一位名人就是韦乐平（1970届无线电），也是出自传输所，是研究SDH的专家，他是我清华无线电系和邮科院的双料学长。韦后来做了中国电信的总工，是国内公认的传输和网络方面的权威。没有和这些人成为亲近的同事，诚为终身之遗憾。

读研岁月

邮科院研究生每届只招二十多人，毕业后会去邮电部所属的十来个研究所。有搞通信的，有搞加密的，有搞仪表的，有搞SDH的，几乎涵盖了通信的方方面面。我们研究生班体量太小，很少单独开课，主要是和北邮的同学们一起上课。我们每天早上要骑自行车去北邮上学，晚上再返回学院路40号的邮科院。中午没地儿去，就去同在北邮读研究生的无81班的王波同学宿舍玩。

在北邮读研究生也多是上大课，对于大多数老师没印象了，只记得教信道编码的李道本老师，讲Viterbi卷积码算法，比较高傲的感觉，讲起课来也是非常自信。他很推崇维特比，据说和维特比相识，维特比是如今享有盛名的高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在北邮上课时，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有一天见到一群学生戴着红黄色的太阳帽招摇过市，帽子上写着“华为”两个醒目大字。当时我心想，这是什么无名之辈，也敢跑到北邮校园里招徕学生？现在常想，如果我那时去了华为公司，现在肯定算是元老了吧！

可惜研究生课只上了一年，就开始转入研究和论文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硕士论文获评我们那一届的优秀硕士论文，还发了AT&T公司赞助的2000元钱。论文答辩时，评委之一的传输所所长杨泽民老师说了一句：我看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博士生的水平。

外企诱惑

硕士毕业后，我就留在了数据所工作，至今还记得当时用C/C++编程，一行一行地做DEBUG调试的情形。因为做得太辛苦，有很长一段时间眼睛怕光，视力下降得很快。

我很快也收获了爱情，但那时候我和一位同事合住在筒子楼的单间，爱情似无容身之所。当时的工资每个月有几百块。那时候外企刚进中国，正在高薪挖人，我们的学长去外企每月能拿到两三万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所的同事纷纷跳槽去了外企，数据所被戏称为外企的黄埔军校。

我当时也动了去外企的念头，但还是有些犹豫。一是前途未卜；二是数据所有规定，离开的话要交纳三万元的培养费；三是外企工资虽高，但照样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一去外企就面临着连单位宿舍都要失去的尴尬局面。

研究生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返回了各自的单位，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还留在了院内，其中就有北大本科毕业和我一起读研的陶宏兵。他正专心致志备考托福和GRE，一门心思要去美国。我们两个难兄难弟经常混在一块儿，评论时政话题，探讨未来去向，就这样相互鼓励着共同向外企投了简历。

很快我俩就收到了朗讯公司的面试邀请。我们俩去之前就约定，要么一起去，要么一起不去，共进退。我很快就接到了被朗讯录用的通知，但陶宏兵却没有被录用。我打算放弃，但在陶宏兵的一再劝说下，我接受了朗讯的offer。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所以单位这边暂时请了假。

朗讯也是刚进中国不久，办公地点在赛特大厦，环境很好，工资好像是每月五千多，大约是我在数据所工资的十倍以上。记得当时在入职的迎新会上，主持人激情澎湃地讲了朗讯的一些福利待遇：住五星级酒店，日出差补贴100美元，一日三餐实报实销。而且将来每个人还可以发100股朗讯公司的股票。话音未落，引来一片欢呼声。

我在朗讯上了没几天班就不想去了。一是确实还没下好离开国企的决心，二是陶宏兵没有一起去，我最终动摇了。于是就去向我的领导辞行，领导见挽留不住，就说你去领完工资就走人吧。我当时颇感

意外，办离职时更加惊喜，居然有几千元之多。原来是给我发offer后，我虽是拖了两周后才去的，而人家给我发的工资连这些天都算进去了。我心想，朗讯真是厚道啊，早知这样就不走了。

网络为王

回归数据所不久，我就接到了摩托罗拉的面试邀请。面试我的是一个叫曹明的中年人。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在白板上边写边回答。面试完了，他说没问题，你很合格。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数据所出来的。摩托罗拉给我的offer是每月6000多元，外加20%的住房公积金。

为了吸引人才，摩托罗拉不仅有优厚的住房公积金，而且还有类似国企的分房政策。摩托罗拉在人民大学西门外的小南庄自建了一批住房，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论资排辈卖给最早一批去摩托罗拉的中国人。招我的领导曹明就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摩托罗拉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外企，我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加入时，他们已经进入中国多年了，而且靠卖寻呼机发了一笔大财。那时候一部摩托罗拉的汉显寻呼机可以卖到2000多元。我去了不久就发了一部非常小巧的、流行一时的翻盖摩托罗拉手机。我去的是摩托罗拉的数据部门，主要搞帧中继和voice over frame relay。

这时候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向数据所递交了辞呈，交了三万块钱的培养费。我之所以能交出这么多钱，主要是因为我读研究生时，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外面接过几个编程的活儿，挣了几万块钱。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再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在

同学中算是有钱人了。

我对在摩托罗拉的工作很满意，他们很人性化，对员工非常好，一点儿也不压榨员工，也不怎么加班。在公司食堂吃饭皆免费，在外面吃饭亦可以报销。我花了六百块钱和太太在六里桥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四白落地的新房。我接了父母来北京玩，记得有一次和母亲在公司附近的宏状元粥店吃饭，母亲说：你们公司真不错，挣的这么多，吃饭还给报销。我在摩托罗拉第一次办了护照，第一次去了香港，第一次去了美国。那时候出国还有几百美元的制装费，随身携带美国运通的支票，感觉真的是好极了。

我只在摩托罗拉工作了一年多，但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然后我就在王刚同学的介绍下去了3Com公司，一家美国网络设备公司。3Com公司给的年薪是三万美元，那时候的汇率是1:8，刚好相当于每月两万元人民币。我在3Com当系统工程师，干了一年多，随着思科的迅猛崛起，3Com江河日下，我就又跳槽去了思科。我们当时真是有竞争力，几乎可以去想去的任何一家外企！

疯狂年代

我是在2000年初去的思科公司，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的巅峰期。思科引领了互联网革命，所以估值也达到了创纪录的5000多亿美元的市值，一度力压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当时有所谓的Wintelco三巨头，就是Windows、Intel、Cisco。而思科公司也非常慷慨地给全球所有员工发了数量可观的股票期权。随着思科股票的快速上涨，许多早先去思科的中国员工都发了大财，不少员工都在北京

买了多套昂贵的房子。

正是在这种火热的气氛下，我怀揣发大财的梦想和憧憬加盟了思科。思科给了我6000多股股票期权，当时每股值50多美元，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涨下去的话，买房子根本就不是问题，而且每年还有机会被授予新的股票期权。当时俨然觉得自己很快就是大款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思科的股票会不停地涨下去，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互联网泡沫破裂，思科的股票最低跌到了十几美元。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不少曾经牛气冲天的公司不是破产就是被收购，还有不少更惨的直接退市。真是疯狂如坐过山车一般！

虽然发大财的美梦破灭了，但是思科的收入还是让我在第二年实现了买房的梦想。研究生毕业五年之后，我终于不用再租房子住了。安居乐业，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即使像我这样自诩为社会精英的清华人，在北京买房子也是非常艰辛的：我在思科干了八年，帮助规划建设了中国最大的骨干网：CHINANET163骨干网，后来还帮助规划建设了CN2、CMNET、移动承载网等大型骨干网络。去了思科不久，我还考取了当时非常难考的、业界享有盛誉的CCIE（思科认证互联网专家）证书。

加盟华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企的缺陷也很快显现：一是舍不得战略投入，二是坚持走精品路线，三是不相信中国人。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无远略。我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也逐渐暴露。我在思科做的是系统

工程师，主要从事网络的规划、设计、建设，虽然有较多的技术含量，然而终究不是研发，所学的知识 and 聪明才智无法充分展现。再加上外企的待遇和气氛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

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离开思科加盟了华为，年届不惑的我对前途也颇感迷茫。当时离开思科时写的诗，颇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

无缘还似有缘人，八年纷扰一朝闻。
好梦须寻三界外，退思方知江湖深。
精卫空有填海志，夸父枉费逐日心。
聚散离合世间事，来如清风去如云。

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努力奋斗过，就是无怨无悔的，因为命运从来就不是自己所能把握的，人的一生中未可知因素实在太多了，这大概就是命运之不可琢磨吧。

去华为本来是网络产品线的人找的我。为此在深圳总部工作的网络产品管理部长蔡觉婷还特意来我家附近和我长谈，其真诚令我感动。我们谈得很好，华为的网络产品一直是以思科为标杆的。然后又请我到位于土地的北研所和那边的网络大咖谈，他重点问了我中国这几张骨干网的情况。然后就是请我专程去深圳总部和网络产品线营销部长高戟面谈。他最后表示，对我很满意，但鉴于我原来的工资太高，他们给不出这么高的级别，将我推荐给了公司战略规划部。后来我才知道，高戟算华为的元老之一，资历和海思总裁何庭波不相上下，负责华为海思的整个研发部门。

因为这个波折，我又先后在北京见了战规解决方案部三部的领导詹俊峰和战规解决方案部的老大韩柏。他们都是从深

圳来北京与我面谈的，最后韩柏一锤定音，给了我很好的待遇和专家级别。至此我已进行了五轮面对面的谈话了，可见华为招高级别的人才还是非常慎重的。去华为，我的职业生涯揭开了新的篇章。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遗憾的有两点：一是当初清华毕业时，没去邮电部传输所读研究生；二是从认识华为到去华为，时间竟拖

了15年之久！

一晃从清华毕业三十多年了，这其中经历了很多，有高潮、有低谷、有挫折、有感悟。现在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唯一不变的还是清华校训所赋予我们的初心和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清华之大

○杨秉勋（1999级法学）

清华之大，宜静心，宜健身，更宜进学

清华园以大闻名，有好事者测量称，与隔壁某著名大学相比约3:2。大一时，曾与舍友雪夜步行绕校一周，耗时数小时，累到脚酸腿疼。学生身份证上印的“清华园1号”，赫然表明这“清华”乃是茫茫宇宙中一处重要坐标。

校园大，自然是静心养性的好去处；校园大，到处都是律动的气息。因为备战3000米而爱上去东操跑步，“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追求至今。“一起去看流星雨”的西操，不知道大家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多少，我只记得差点冻掉耳朵。大礼堂和蒙民伟楼始终萦绕在梦中，我曾在蒙楼参加曲艺队集训，练快板、溜活、对词，每次都为能亲近艺术而自豪。在大礼堂参加曲艺队复建演出《一二三四，我们说相声》，几乎每年法学院学生节都有幸在大礼堂表演，我和王钢、欧新星、吕云成等同学都合作过。大礼堂的舞台和灯光很棒，置身其中，仿佛登上电影《梅兰芳》里“婉华、十三燕”的戏台。大礼堂

有“人文日新”牌匾，和东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堂前“行胜于言”、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等重要，给清华学子平添无限力量。

校园大，最宜读书。主楼北面的“计算机开放实验室”是个好地方，印象中的Win95、Win98和BBS界面与这个地方纠缠难分。我最爱图书馆老馆二层自习室，屋顶高、窗户大、桌面长、椅子宽、食堂近、闭馆晚，还能无线上网，当然最重要的是——女同学多。老馆得天独厚，每天开门后1分钟便再无空位。我曾多次排队抢座，有时还能为同学和朋友抢到座位，一起交流、笔谈，满满的内啡肽。

清华之大，在于名师荟萃，高山仰止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后知后觉，毕业后才发现大师就在几尺外的讲台上：张明楷老师的追问，崔建远老师的从容，车丕照老师的淡定，王振民老师的温雅，何美欢老师的严谨……还有很多老师盘桓脑海。

王保树老师也是河北人，乡音亲切，

笑声爽朗。他主讲“商法”和“经济法”，习惯苏格拉底式问答教学，坚定了我对竞争法的信念。老师关心爱护，大事小情提携我甚多，毕业后多时，他“书山凌乱难觅径”的办公室总是我回校的第一向往。斯人已逝，言犹在耳。我常想，若老师还在，再见面会跟我聊什么？是专业热点？是事业建议？还是家庭智慧、人生指南？以他的性格，定会从容地、微笑着说：“你应该……，你行的……”

高鸿钧、江山等老师共同讲授的“比较法导论”，绝对是在清华听过最精彩最难忘的课程之一，如同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内容思接千载、纵横东西，主角学养深厚、风格迥异，思想深邃宽广、澎湃活跃，论证逻辑缜密、恣意汪洋。部门法固然重要，法理学才最思辨、最诗意，理顺法理与人心，汇通宗教与法律，理解天人合一、互助自足。闻一多先生说：“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世易时移，教授们切磋琢磨之风气令我悠然神往。

外系老师中，印象深刻的有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孙明君老师。他温和儒雅，用略带西北口音抑扬顿挫

地吟诵古诗十九首，当时我们觉得每个字都焕发出了异样的色彩，古人的细腻情感被小心翼翼、淋漓尽致地还原出来。经管学院李伯重老师讲授“经济史”，他长相清瘦，说话不紧不慢，教材用英文原著，让我们分章节分析分享，“走出去、请进来、移步换景”“念念外来和尚的经”，学习体验妙不可言。中文系蓝棣之老师在课上讲授“症候式分析”，辅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从经典文艺作品的“症候”出发，探究超出作者原意背后的矛盾、动机和社会关系，结论出人意料，又让人暗暗叹服。

清华之大，在于“牛人”辈出、自强厚德

我以为，考入清华者大体分两类：一类是聪明者，一类是刻苦者。我很羡慕第一类同学，他们时常让我有“虽然不理解，但觉得很厉害”（不明觉厉）之感。大四时的班长是张燕君，在协助她组织班级活动时，我感到在她眼里，世界会变得更加有秩序，风景会变得更加有意义。王宇力和我是法9“唯二”的河北人，有一次在他宿舍聊英文问题，他娓娓道来让我震惊，可谓“望洋兴叹”。在公交车上我和单连枫聊天，谈及宗教与科学，他说：“很多现象，你仔细去想，用心想，直到最后你就会明白，他是在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好多年，仍没有头绪，但觉得很厉害。

法9是法学院复建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文理兼收。我高中学的理科，很羡慕文科同学文史渊博、出口



1999级法学院部分校友入学20周年返校合影（2019年）

成章。大一军训时的一天晚上，曹雪和张陈果在朦胧灯光下分别上场演讲，当时我的感觉是听“傻”了。叹服张陈果逻辑强劲、文辞精妙，却觉得曹雪“不明觉厉，莫名其妙”。多年以后回想，应该是曹雪的演讲内容和表达方式远超我的认知，造成“蓬勃的思想和凌乱的语言”之错觉。有一次，大家集体出游去香山，游览曹雪芹故居时，王渊给我介绍《红楼梦》的各种解读，我还无知无畏地努力跟她探讨，可我当时根本还没通读过红楼，更遑论俞平伯、张爱玲、胡适、蔡元培这些红学家的观点了，回头想想汗颜不已。

清华人的瘦是自内而外的。印象里，除了王庚、王宇力等少数天赋异禀者，清华同学们都很瘦。大二体检，我和同寝室好友陈杭平测体重，我108斤，他106斤，这是我俩体重最接近的一次，后来我便一路狂飙。尽管他并不一定以此为荣，他曾说“身轻如燕”在踢球时更灵活，但拼抢时却有被撞飞的风险。当时校园里有个著名诗人叫“瘦马”，是位物理系才子，敢用这笔名估计也胖不了。当时的一份刊物《清华学生》的主编叫刘大治，工物系的大牛，温文尔雅，博学高义，也很瘦。还有大家爱戴的王大中校长，不也很瘦吗？

清华人的文艺素养总在不经意间让我惊叹。我虽加入了曲艺队，除了快板呱噪在宿舍内外招致声讨外，面对藏龙卧虎的同学，从不敢有任何造次。在宿舍，王赢经常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十诫》《宾虚》《红白蓝》三部曲等文艺电影，多年来我暗将它们列入任务清单，可惜迄今还未完成这项“阳春白雪”的任务。一次集体活动，大家发现房间里有架钢琴，祁鹏、王渊等几个人凑过去随手便弹了几

段，琴声悠扬，婉转缠绵，足见深厚的艺术素养。大一时我在校广播台做播音员，节目叫作“清广盟之声”，一组有三名播音员，同班张传荣和我一组。有一次，我费力完成曲艺队的创作作业，请她斧正，她轻轻松松改了几处，拿回一看，对于包袱和幽默的把握，实在甩我几条大街，不禁击节赞叹。大三那年，参加暑期实践支队去新疆吐鲁番，路遇一个十来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跳舞，她爷爷打着手鼓伴奏，何姗姗同学踩着节奏、毫无违和感地加入进去，只见衣袂飘飞，鲜花绽放，柳枝婀娜，蝶影翩翩，那一刻，让我们见证了世间美好。

清华人不止分数高，更在于责任、担当、善良、奉献。大一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不少清华学子走到美驻华使馆外强烈谴责北约暴行，“居安思危，强国有我”铭刻于每个同学的心间。数年前，王振民老师在危急时刻赴港任职，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影响力，还原真相、明辨是非，与同仁一道开启了香港法治的全新篇章。前两年，黑龙江的李同学惨遭车祸昏迷多日，楼厦、何姗姗等同学组织大家伸出援手，数日之间筹资百万，解了燃眉之急。仁者爱人，君子爱智慧、爱世人、爱家国。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求学四载，清华把他的风物人文烙印在每个人身上。时光如水，二十年倏忽而过，那些烙印有的深了，有的浅了，但一定都在。我们的大学时代那么精彩，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能不断重温美好，不断汲取向上的力量。

杨秉勋，就职于国家商务部，从事商务法律工作。曾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任外交官。

一个中子的探奇之旅

○李满仓（2003级工物）

一碗冰粉的幸福

成都初夏的傍晚，余晖微薄，暑气渐散，晚风习习。在小区楼下路边摊摊坐起，吃上一碗晶莹剔透、滑嫩爽口、冰凉香甜的冰粉，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一碗冰粉可以带给我这样的幸福感，是因为我的身边正处在一片安宁祥和，更是因为我愿意守护这份安宁祥和，而且我也确实在为这份安宁祥和默默贡献着一份微薄力量。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简称核动力院）工作的一名工程师，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四个面向”的每个方面都有直接的关联。因为这样的关联，我愿意守护“一碗冰粉”的幸福，愿意为创造更多的幸福而奋斗。而这份幸福，除了感谢我们祖国的强大，也要感谢生命中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与事，特别是在清华大学与核动力院的人与事。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也会变得优秀

2003年我入学精仪系制35班，后转入工物系中核定向核31班。2006年，我获得清华与核动力院联培直博资格，在清华王侃老师和核动力院姚栋老师的联合指导下攻读核科学与技术专业。2012年我博士毕业，在核动力院入职参加工作。

从2003年入学离开可爱的家乡，告别

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到今天已经超过20年了。不管是在清华，还是在核动力院，因为总能遇到优秀的人，所以耳濡目染总以这些优秀的人为榜样，不断成长，感受人生发现与成长的乐趣。

到清华后，第一次听说体育课要考3000米，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长的距离，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做到的。宿舍的一位同学与我打赌一个鸡腿，说这个非常轻松。下午下课后，他就到东操做了轻松的展示。他赢得了鸡腿，我受到鼓励、赢得了信心。这样，我作为体育A班的学生，大学期间两次参加了全程北京马拉松。和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我发现了做人要敢于突破。

读博期间，我与王侃老师一起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同住一个房间。深夜，王老师依旧在回复邮件，指导学生，与同行交流。看着他孜孜不倦的背影，我意识到许多举重若轻、云淡风轻背后都有那么多



李满仓校友在旅行中

□ 我与清华

殚精竭力、聚沙成塔。和优秀的老师在一起，我发现了为学当厚积薄发。

我很幸运，大学期间成为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的一员。每个深冬的升旗都是很难翻越的一座高山。因为要上课，在主楼前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而队员们早在1个小时前就要离开温暖的被窝开始准备。我曾因为冬天睡过头迟到两次，但我没有放弃，虽迟但到。在主楼大厅门外站标兵，看大家走分列式，暗暗决心不能再辜负队友，一定要迎难而上。大家给我鼓励打气，后来还投票选我作了队长，这样就更没有理由迟到了。和优秀的仪仗队兄弟们在一起，我发现了处事要坚韧不拔。

我在清华完成了学业，在清华也收获了友情和爱情，在清华找到了人生方向。清华塑造了我的灵魂和品格，身上流着“自强不息”的血，心里刻着“人文日

新”的铭，脚下走着“行胜于言”的路。我觉得在清华最大的收益就是学校提供的那种氛围。

人生的意义在于朝什么方向走

我们核动力院的官方介绍是这样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隶属于中核集团，是我国集核动力技术研究、设计、试验、运行、退役全周期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是国家战略高科技研究设计院。就像一座百万千瓦功率的华龙一号机组，看介绍就像看总体参数，并不知道其中的滋味；而作为参与堆芯核反应的一个中子，我是深知其中的滋味的。这滋味就像蓝色的大海一样，既广阔又深邃，既热烈又笃定。

2006年暑期，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到核动力院实习，其中有两周就在我目前工作的部门。两周的接触中，看到身边的老师们

技术过硬却低调谦和、理论精通仍不断钻研、各有所长又通力合作，原本计划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我，心里起了波澜，想改变志向。结合工物系施工老师在“核工程原理”课上的影响，我萌生了在反应堆物理方向继续深造的想法，以便能有机会成为实习所在部门团队的一



李满仓（第1排左4）作为国旗仪仗队队员参加其最后一次升旗仪式后和队友们合影

员。幸运的是，我获得联培直博的资格，2008年起在核动力院开展课题研究。从那时算起，我在核动力院已经超过15年了。15年来，我的角色发生了几次变化，不断地承担新的项目或课题，就像不断打开新的门。每打开一扇门，都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这些年核能核技术在不断地发展，核动力院也在不断地开拓，使我有机会不断地有新的体验。我始终怀着对人生和世界的好奇，工作充满挑战的同时，也充满了乐趣。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处于什么位置，而在于朝什么方向走，所以不断提升自我，将人生志趣与核动力发展结合，以“不创造，毋宁死”的信念，将人生之旅视为一场探索之行，体验发现的乐趣。

在核动力院，就像在核反应堆中，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里高手云集，有成百上千优秀的同事，但大家团结协作才能有所创造。这是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必须秉持的思维方式。

中子平衡与工程师思维

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大量中子和原子核的作用，即反应堆物理。有多大量呢？在百万千瓦核电站反应堆中，中子密度大约是 $10^{10} \sim 10^{11}$ 中子/cm³。当然，原子核的数目更多。因为涉及数量巨大的中子和原子核，所以需要采用统计物理学的手段，通常用玻尔兹曼输运方程来描述堆物理中的中子行为。这个方程的基本思想非常简单，就是在一个系统中，中子的产生和消失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就可以维持链式裂变反应使堆芯处于临界状态；如果产生大于消失，就会出现超临界有不可控的风险；如果产生小于消失，那么链式反



李满仓（左1）与在成都的清华同学聚会

应不能维持会造成停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平衡的概念，因此中子输运方程也被称为中子平衡方程。整个反应堆物理的理论基础是很完备的，但是将完备的理论基础用在工程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面对空间、时间、角度、能量共七维的中子行为，在反应堆物理分析中，需要兼顾精度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在核工程中，我们首先要确保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提高经济性。就是说，安全裕量和经济性之间也是一个平衡。

工程也是如此。科学就像打枣杆，最长的杆子才能打到枣子。工程就像木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板子。工程是一个多目标优化的问题，在总目标的需求下，要平衡各个专业技术方向。其实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也大抵如此。从发展的眼光看，在延续和变革之间也要寻求动态平衡。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要照顾到各个方面，都不能太缺失。在核动力院，为了实现一个核能系统，需要开展理论设计、试验研究、运行研究以及特殊的核燃料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具体到核动力设计方面，我们有堆物理、核燃料、热工水力、堆结构、系统与设备、仪控与电气、屏蔽与源项、力学分析、专用软件开发等技术方向，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一个核能系统的研

发，一个都不能少。

求己探奇：从生活理念到工作方针

当我们说“知无涯”时，我们说的并不是一个圈，而是一个环。环外，我们要不断探索，因为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环内，我们也要不断探索，因为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时，既要考虑环境的条件，也要考虑自身的条件，这两者都是现实。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现实，就像毛主席对抗战、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胜利的预见一样，惊人的洞察源自对敌我两方的深刻认识和剖析。同时，我们又要对世界充满好奇，将人生视为一场探奇之旅，概括来说，我的生活原则就是“求己探奇”。

从生活原则拓展到工作中，我会坚持“独立自主、敢为人先”的工作方针，这是“两弹一星精神”中的“自力更生、勇于登攀”在我自己的工作 and 生活的映射。过去几年，在反应堆物理启动和实验设计、同位素生产物理设计与应用研究方面，我和团队一起做了些探索性的工作。探索性工作，始终面临许多困难和挫折。每到这时，我就给自己打气，心中默念“Nothing to lose”。确实，我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赤条条地来，体验下这个世界，然后赤条条地去。所以遇到困难，看准方向，有所洞察，然后就勇往直前。

从中子价值到个人价值

反应堆物理领域有个概念叫中子价值，中子价值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中子对核能释放贡献的大小。一方面，中子引发裂变，释放能量，贡献价值；另一方

面，产生次级中子，使中子在链式反应上不断增加，也是贡献价值。这就是核反应堆中的中子的使命：自己直接贡献，培养人以使链式裂变反应持续产生贡献。在核动力院，每个人都要完成这两样使命。

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但是同样是中子，不同位置、不同能量、不同裂变链下来的中子，它的价值是不同的。从反应堆物理的角度讲，堆芯可以在任意功率水平实现临界。一个堆芯的输出功率，并不取决于堆物理，而主要取决于堆芯的热量导出能力、燃料和材料的耐辐照能力、多层防御对放射性的包容能力，甚至电网所需要的实际负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条件。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认清自己的现实条件，如果有更高的功率台阶，那就发更多的电。假如目前的系统条件下，只能输出100MW的功率，那就输出100MW；哪天条件变了，需要输出1000MW的功率，那就输出1000MW。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把个人能力投入到一个伟大事业中，就体现出了不平凡。就像中子，氢原子核以外，哪个原子核还没几个中子，但在堆芯里的一个中子，当它诱发裂变并产生了新的中子时，也就为核能的释放贡献了一份非凡的力量，这就与广大原子核中普通的中子有所不同了，这个中子实现了它的价值。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一场发现的旅行，一场探奇的旅行。何其有幸，我生在和平的中国、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子参与一场裂变，释放一份能量，创造一份价值。在成都，每年夏天都能吃到甜蜜幸福的冰粉。在核动力院，每天都能为这份幸福有所创造。这份幸福我愿为之终生奋斗。



● 榜上有名

多个团队和校友被授予 “国家工程师奖”

2024年1月19日，“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清华大学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团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尤政院士领导的智能微系统团队，以及11位清华人分别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和“国家卓越工程师”表彰。

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团队负责人是环境学院李俊华教授，团队核心成员包括郝吉明、贺克斌、姚群、叶恒棣、黄炜、陈贵福、张志刚、魏进超、路光杰、马永亮、许嘉钰、赵晓光、吴其荣、陈建军、彭悦。团队长期致力于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研究，在工业烟气/废气多污染物深度治理与资源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发明了大气污染物深度净化系列环境催化材料和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形成了烟气多污染物“控制理论-核心材料-关键装备-工程示范”完整的技术创新链，率先在国电、宝武、中建材与中石化建立深度治理示范工程并推广应用。

王军（2008级硕，经管），现任中国中车集团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是我国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建设者与领军人物之一。

王仁坤（2002级博，水利），现任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内外20多座大中型水电工程设计，被誉为我国特高拱坝设计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叶浩文（2000级硕，土木），现任中

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在工程建设领域深耕40年，专研超高层施工和建筑工业化技术，发明智能顶模工艺，提出一体化建造理论与方法。

李久林（2018级博，创新领军工程），现任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长期从事土木建筑工程建造技术工作，主持和参与了几十项大型工程建设，先后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工程总工程师、2022年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工程总工程师等重要职务。

宋神友（2020级博，创新领军工程），现任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总工程师，曾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2010年，他成为深中通道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的第一位员工，并为之奋战至今。

张金涛（1997级博，热能），现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作为温度计量基础研究创新团队负责人，领导团队开展声学气体原级测温法测定玻尔兹曼常数的研究，结果两次被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录取用于该常数推荐值确定、该常数的最终定值和温度单位的重新定义。

房子河（2002级硕，电子），现任公安部大数据中心研究员。专业领域为安防系统设计、通信与信息系统。

曹堪宇（1989级物理），现任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研发执行副总裁，全面负责DRAM存储器芯片器件研发、产品设计与产品测试工程研发工作。

景来红（1982级本、1987级硕，水利），现任水利部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组织完成了小浪底水利枢纽、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等大型水利水

□ 清芬挺秀

电工程的设计工作，同时作为公司总工程师，负责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黄河治理开发重大项目技术把关。

廉玉波（2020级博，创新领军工程），现任比亚迪集团首席科学家、汽车总工程师、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整车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工作，主持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和整车平台。

薛峰（1998级硕、2012级博，建筑），现任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设计，工程建造全过程绿色协同设计领域，为我国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年首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表彰，是为了鼓励先进、树立典型，打造新时代卓越工程师队伍，强化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激励动员广大工程师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田 阳）

7位清华人荣获2023何梁何利奖

2023年12月19日，何梁何利基金2023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共56位杰出的科技工作者获奖，其中包括五位清华教师、两位校友：戚发轫获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范维澄、李德才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娄智勇、韩林海、梅生伟、刘洋荣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戚发轫（1952—1953，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在载人航天器、卫星、宇航元器件和空间事业战略发展等领域作出了系统性的、创造性的重大贡献。

范维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长期致力于火灾动力学与防治技术、公共安全动力学演化、风险评估、预测预警与应急管理等领域研究，是我国火灾科学的奠基人，也是安全科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李德才，清华大学机械系长聘教授。致力于我国核能、航空、航天等领域重大装备关键基础零部件的研究开发，特别是在极端工况磁性液体零泄漏长寿命动密封的研发方面，取得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娄智勇，清华大学医学院长聘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高致病性病毒感染和复制的分子机制和抗病毒药物作用机制研究。在冠状病毒、流感病毒等重要病毒的转录复制机制领域开展了系列原创工作，为抗病毒药物研发提供关键科学基础。

韩林海，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广西大学校长。长期致力于钢管混凝土结构领域研究，构建了其全寿期安全性分析理论与设计技术体系，创新性发展了高性能钢管混凝土混合结构形式，实现了大型复杂土木工程主体结构体系安全适用范围的拓展。

梅生伟，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青海大学副校长，IEEE会士。长期从事电力系统控制以及大规模新能源安全输送、高效消纳和清洁存储研究，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

刘洋（2014级博，社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特级航天员，先后执行了神舟九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

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鍊琚、何添、利国伟于1994年创立，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服务国家

现代化建设。29年来，共遴选奖励1582位杰出的科技工作者。（田 阳）

5 位校友、1 个集体荣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称号

2024年3月3日，全国妇联举行大会，表彰了2023年度10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300名“全国三八红旗手”、200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低温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主任、研究员高波（2009—2011博士后，建筑），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张琳（2009级硕，公管），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机关党委（人事司）人事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崔菁文（2013级硕，公管），东莞市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罗爱文（2018级硕，五道口金融学院），唐山兴邦管道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监邱晓霞（2020级硕，经管）等五位清华校友荣获2023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清华附小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田 阳）

两位清华人当选 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2月7日，美国国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公布了2024年新增院士名单，共有114名新院士和21名外籍院士，其中包括两位清华人：

黄翊东，1988年、1994年在清华大学电子系先后获得学士、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电子系教授，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因对光子光源和成像器件研究及产业化的贡献而当选。

林庆煌，1985年、1988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4年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现任美国泛林集团（Lam Research）高级技术开发总监。因在集成电路产品的制造中对电子材料的应用贡献而当选。（田 阳）

4 位校友获得 2024 斯隆研究奖

2月21日，美国艾尔弗·斯隆基金会公布了2024年度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s）获奖名单，126位杰出青年科学家获奖，4位清华校友名列其中：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助理教授姜楠（2007级自动化）获得计算机科学奖，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致力于建立强化学习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在函数近似设置方面。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于向遥（2008级微纳电子）获得计算机科学奖，研究领域为数据库系统，主要包括云原生数据库、数据库的新硬件、事务处理和混合事务/分析处理（HTAP）。

宾夕法尼亚大学助理教授黄骄阳（2010级交叉信息院）获得数学奖，研究方向为随机矩阵理论、随机图、交互粒子系统、深度神经网络优化、后验采样和大规模逆问题的不确定性量化。

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简超明（2007级物理）获得物理学奖，研究兴趣为强相关量子多体系统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量子磁体中的奇异相、强相互作用的量子临界点和无间隙量子物质、纠缠动力学。

斯隆研究奖设立于1955年，每年颁发一次，以表彰那些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和研究成就的美国和加拿大的杰出年轻研究人员，目前向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经济学、数学、神经科学和物理学七个科学技术领域的学者开放。（田 阳）

景来红：筑梦江河携手

○曾卓崑（2003级硕，新闻）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世界坝工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他一头扎在里面20多年；南水北调，新中国特大型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其西线工程，他又为之坚守努力20多年。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黄河下游防洪工程、黄河西霞院水库、沁河河口村水库、泾河东庄水库等众多重量级的水利水电工程，都凝结了他的智慧心血，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

他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国家卓越工程师。他是清华大学1982级水利系校友景来红。

卫辉，属河南新乡，位于黄河北部、太行东麓、卫水之滨。1982年，景来红从河南卫辉考到清华。

大学时，浸润和影响少年景来红的，除了清华人熟悉的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等文字，还有水利系豪迈的《水利建设者之歌》：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灯火辉煌，壮丽的事业我们骄傲，豪迈地奔向远方。

少年立志 守护母亲河

历史上的黄河，善淤、善决、善徙，黄河“长治”，却难“久安”。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建设的热潮随之而来，三门峡水库应运而生。当时规划的小浪底，只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的径流式电站。1960



景来红校友

年9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但泥沙淤塞了水库，抬高了河床，回水倒灌渭河，威胁关中平原防洪安全，严重制约了工程效益的发挥。

1975年8月，淮河流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也为黄河安危提出了教训。1982年8月，一场暴雨倾泻在豫西山地，三条黄河支流同时暴涨，花园口出现洪峰，沿河150万群众日夜守防大堤，黄河再次向人们敲响警钟。

同年9月，景来红入学水利工程系。彼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大半辈子的事业会与黄河连在一起，当然也不知自己若干年后会作为接力守护母亲河的一分子登上“国家卓越工程师”的领奖台。

1987年，景来红从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本科毕业，获得“优秀毕业生”的荣誉。三年后，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即，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消息：黄河治理

开发的关键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批准立项，即将开工建设。他立即下定了到黄委会设计院工作的决心。设计院是小浪底工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回到家乡，治理母亲河，设计院成为景来红学有所用、大展宏图的舞台。

初出茅庐，迎接他的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任务：小浪底内外干线道路及桥梁工程设计。“在学校里学的都是水利，工作一上来却做路桥。”景来红二话没说，扛下任务，他知道自己肩负的是领导对清华毕业生沉甸甸的信任。“国家和学校培养我们，就是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学校所学的就是一个基础，实际工作要求只能再学、多学，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治理黄河需要很宽的专业面，水利的方方面面都是应该掌握的。”

凭借清华人的钻研精神与河南人的韧劲，景来红与工程勘察、施工人员吃住在一起，摸爬滚打了三年。白天计算公路各种要素，夜里加班学习充电。景来红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带领小组钻研技术，查勘现场，圆满完成了工程内外干线道路及桥梁工程的设计工作。1993年7月，他加入到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大坝的施工设计中。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一座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除害兴利、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控制了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2.3%、黄河天然径流量的87%和近100%的输沙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水沙问题特殊，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水库综合运用要求严苛，给工程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小浪底水利枢纽也被称为世界坝工史

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面对挑战，景来红等黄河人愈发奋进努力。围绕核心技术问题，小浪底工程在工程规划、枢纽总体布置、多沙河流工程泥沙处理、大规模密集地下洞室群设计等领域都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景来红也一路成长：从黄委会设计院的土坝室副室主任、院总工助理，再到项目设计副总工程师。他参与了大坝设计、孔板消能试验研究、进出口高边坡设计研究以及工程总布置方案研究等工作。他作为设计代表常驻工地，研究解决现场突发技术问题，确保工程设计和现场实际良好对接，为保障工程顺利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小浪底工程在当时创造了多项国内、国际之最，如中国最高、填筑量最大的壤土心墙堆石坝，中国最深、最厚的防渗墙，世界最大、最复杂的进水塔，规模最大的孔板消能泄洪洞，规模最大的综合消能水垫塘，砂页岩不良地质条件下最大的地下厂房……

2000年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式投入使用，大幅提高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标准，对确保黄淮海大平原的防洪安全，保障滩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河水资源、水能资源得到更充分和高效的开发利用，保证了黄河连续24年不断流。

小浪底工程及其勘察设计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经典暨精品工程奖”等多项令人仰视的荣誉。

从1990年9月入职开始，他就扎进小浪底项目，从大坝基础设计、关键技术

研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干就是20多年，参与并见证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初步设计、关键技术研究、技术施工设计、建设、运行、管理。时至今日，他仍承担着进一步完善小浪底技术总结和技术服务的相关工作。景来红深深为自己为小浪底水利工程奋斗过而感到自豪。

中年薄发 奋战南水北调

水脉即国脉，水兴则国兴。1952年，毛泽东主席出京视察，来到了黄河。他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多年来，解决北方的缺水问题，一直是中央高层思考的重大问题。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一幅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跨流域调水蓝图横空出世。

在这张总体布局图上，南水北调工程分西、中、东三条线路。2002年，东线、中线工程开工。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一年后，中线工程通水。但这两条线都不能解决西北地区紧迫的缺水问题，人们急切的目光投向西线工程。

200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启动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工作，一支又一支黄委会查勘队的足迹踏遍祖国西部的山山水水。

2003年，景来红是在西线工程前期工作最为紧张的时候，被任命为项目设总的。他带领50多人的技术团队集中办公、夜以继日，20多次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进行查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他主持开展的“西线超长隧洞TBM施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在围岩质量评价、地



景来红（前排左2）向水利部领导汇报南水北调西线工作

质超前预报、通风技术、衬砌综合设计方法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突破。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以景来红为代表的一批批黄河设计人用一甲子还多的时光在加快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使西线工程具备了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

从2003年到2024年，有景来红身影的这21年，从四十不惑走向六十耳顺，他感慨到：“一个重大水利项目涉及的空间动辄是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影响数十万人，许多人需要迁徙，不少村镇需重新规划建设；涉及的时间动辄以十年计，或数十年计。大工程需要一代人一辈子的坚守和努力，甚至几代人的接力奋斗。”

抒壮志 待梦圆

被任命为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设总不久，2004年1月起，景来红开始担任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黄河设计院）总工程师，成为这个“综甲院”的技术“当家人”。

黄河设计院始建于1956年，有近七十年历史沉淀，业绩辉煌。它是综合性的勘察设计企业，先后完成了以黄河流域综合

规划为代表的百余项黄河干支流治理开发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项目遍布国内以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计院为治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水利水电行业的主力大院之一，年产值数十亿元。

国家实行工程建设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无论何时出现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不管当时项目负责人调到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技术负责人，景来红负责多项重量级的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论证：黄河下游防洪工程、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黄河西霞院水库……在景来红的同事看来，他好像有三头六臂：“景总主抓多个大型水利工程的技术论证，同时进行的关键技术研究最多时可达十多项，压力可想而知。”

同事们觉得景来红像老黄牛一样，兢兢业业，即或遇到挑战，也迎难而上，想办法自己克服，不讲条件。“每年经常有一半时间在出差，考察、调研、汇报……只要在办公室，找他的人就像看专家门诊一样，排着队。景总总是耐心听完对方的汇报，帮助寻找解决方案。”



景来红在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施工现场

数十年走过来，景来红看过的资料成千上万，“如果堆叠起来，恐怕一个大房间都放不下”。工作再苦再累，景来红也无怨言。他说：“清华教我自强不息，我当然得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国家发展，每个行业的知识都在不断更新积累，所以在任何行业都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这也与清华人不断追求卓越的内在气质相合。”

景来红坦言，他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是清华精神的影响，也是黄河人不畏艰苦的文化遗产。“服务治黄、牢记使命——存在的价值；诚信服务、求实创新——生存发展的根本；团结协作、开放包容——发展的力量源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些价值观深深刻在黄河人的骨子里。正是学以致用，敢于创新，不断进取，景来红才得以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质量效益双优的精品工程。

荣誉面前的景来红却是低调的，他坚持自己只是代表，荣誉是团队的、是大家的。“无数人前赴后继，守卫黄河，我只是接力的一分子；无数人流血流汗，为大工程付出一辈子的坚守与努力……无论哪一项工程，我都不可居功。唯有继续以清华精神、黄河精神激励自己，不断努力，才能不负韶华。”

“国家卓越工程师”的领奖台上，景来红熠熠生辉的眼睛看着远方。他眼光所向，情之所系，心之所往，应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早日通水。他若许愿，一定是那个无数中国人的心愿：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江河携手，盛世梦圆！

王仁坤：勇攀水电“珠峰”

○陈万涛 邱云

王仁坤，中国电建所属成都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主持攻克了300米级特高拱坝结构、抗震及地基处理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创建了特高拱坝设计方法体系、安全控制成套技术及配套设计标准，填补了多项国内国际空白，引领了筑坝技术攀登水电“珠峰”，被誉为“我国特高拱坝设计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



王仁坤校友

潜心研学矢志科技报国

结缘水利，立志治水兴能。1986年，王仁坤硕士毕业进入成都院工作，参与设计二滩水电站，并承担国家“七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作为我国首座突破200米大关的高坝工程，二滩工程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为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二滩所积淀形成的完整成熟体系，为后来拱坝设计提供了“二滩模式”。

随着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成都院众多重大的水电工程加快了前期研究论证的进程，为王仁坤及成都院工程师团队提供了广阔舞台。“水电人大展拳脚的时代到了。”王仁坤倍加珍惜，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在攻克难题和创新应用中锤炼本领，也更加坚定了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的理想。

为全面系统提升自己，2002年，王仁

坤带着工程中的问题和思考，师从著名水利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在近40年职业生涯中，他先后主持或设计了国内外20多个大中型水电工程。其中，溪洛渡、锦屏一级等巨型工程都已建成投产，为引领水电技术进步、推动水电事业长足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坝优化成就“大国重器”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王仁坤干事业的匠心“密码”。优秀的设计离不开超前的设计思维和系统的设计理念。拱坝是适合狭窄河谷修建、安全性与经济性均较优越的坝型。溪洛渡水电站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双曲拱坝高285.5米，装机容量1386万千瓦，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作为设计总工程师，王仁坤经常问自

己：“我们设计的拱坝是不是既安全又经济？”“建基面抬高，减少开挖和混凝土，能保证安全吗？”类似这些问题，经常在他头脑萦绕。夜深人静，王仁坤仿佛又听到了遥远江河的呼唤，他决心走一条新路，闯一片天地。于是，他从最具挑战性的拱坝建基面下手，以查清坝址地质条件为基础，紧紧抓住大坝与地基相互作用及影响的辩证关系，经过巨量数值分析和物理模型验证，在无数次摸爬滚打之后，创新性提出了特高拱坝合理建基面设计与评价体系，力求锻造出安全可靠、环境和谐、资源节约、经济合理的精品工程。

这一创新成果运用于溪洛渡设计优化，较可研批准方案节省直接投资约6亿元。溪洛渡拱坝优化设计报告被潘家铮院士称为“高坝设计宝典”，为锦屏一级、大岗山、叶巴滩、孟底沟、白鹤滩等一系列特高拱坝设计及优化提供借鉴。

筑坝技术领跑全球水电

拱坝被认为是坝工界最复杂的建筑物。300米级特高拱坝，挡水荷载巨大，

加上特定的地质地震和枢纽泄洪等要求，给设计带来许多世界级难题。水电界有“三峡最大、锦屏最难”的说法。锦屏一级虽坝址处河谷狭窄，但地质条件复杂，且左岸中上部地基条件极差，解决不好将卡住锦屏“脖子”，305米的世界第一高拱坝便无从谈起。王仁坤带领团队，大胆突破国际常用的安全论证方法，将大坝与地基作为一个整体，创建了特高拱坝安全控制方法体系与成套技术，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最复杂的坝基处理工程。锦屏一级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它和溪洛渡水电站作为中国水电引领全球的里程碑工程，荣获工程界“诺贝尔奖”——菲迪克杰出工程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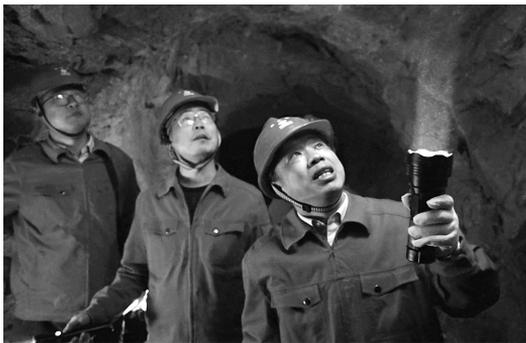
突破关键技术是工程建设的核心。大岗山坝址区地震基岩设计水平峰值加速度为大坝工程世界最高。高坝遇到强地震，能否“泰山压顶不弯腰”呢？王仁坤通过专题研究论证，确保了300米级特高拱坝结构抗裂和工程抗震，为高地震烈度地区高坝建设探索出重要成果。王仁坤率领团队完成的300米级特高拱坝安全控制关键

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3年，四川芦山7.0级地震发生时，刚浇筑完成110米的大岗山大坝安然无恙；2022年，泸定突发6.8级地震，距震中仅21公里的大岗山正常发电。

有标准才有话语权。工程规模和技术不断突破，对适用于200米内坝高的原规范进行修编，显得刻不容缓，



王仁坤（站立者）与团队研究论证工程方案



王仁坤（右1）在叶巴滩水电站现场勘察地质条件

“拱坝设计工匠”王仁坤再次挑起重任。在系统总结吸收新理论、新方法、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基础上，他主持修编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拱坝设计新标准。

“水风光储”服务双碳战略

“双碳”战略科学有序推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能源转型正深刻加速变革，风、光、储等清洁能源迈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如何将“间歇性”的风光新能源从传统的“垃圾电”转变为稳定经济的清洁能源，成为王仁坤需要攻克的又一能源“卡脖子”工程。

王仁坤带领成都院水风光储规划研究团队，从2010年开始研究水电、风电、光伏和蓄能电站的特性，创新性提出水风光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方案，共享水电工程水库的调蓄功能及电力外送通道，成功解决了西南新能源开发的难题，并促进川藏地区四个清洁能源基地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2022年，成果被推广应用到全国其他流域。

依托西南水电“大国重器”建设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及水风光储一体化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经验，将领航国

内清洁能源开发，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面升级电力基础设施。

王仁坤在水电建设上造诣深厚、贡献突出，入选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在灾害治理、护卫安全等方面，他同样展现出担当意识和深厚的专业功底。

2018年11月3日，白格滑坡再次堰塞金沙江。堰塞坝高达百米，满蓄库容达到7.7亿立方米。王仁坤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加处置，下游将遭受巨大损失。

“国家有难，我们不上谁上！”王仁坤在应急抢险会议上坚定地说。为了更全面、及时了解第一手资料，他顾不上高寒缺氧，紧急奔赴现场调查研究。这种风范和力度，既与他几十年工程建设积淀有关，更与他多次参与包括汶川大地震在内的抢险排险经历有关。

经过科学研判与充分论证，王仁坤与团队提出堰塞体开挖泄洪槽、降低溃堰损失方案并被采纳实施，抢险救灾工作取得了胜利。在国家安危面前，王仁坤十余天少眠不休，再次挑战身体极限，以一腔爱党报国热情，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对待工作，王仁坤全心投入；面对荣誉，他却常说，虽然自己是院技术总指挥，但这些成绩，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已到退休年纪的王仁坤，永远是个赤诚“战士”，守望壮阔无比的山川、无比热爱的事业，持续为重大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建设，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水电项目关键技术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江河上游，峡谷深处，高原腹地，依旧有他忙碌的身影……

（转自“电建微言”公号，2024年2月1日）

崔琪：从“银锭观山”找回老北京

○曹晶瑞

崔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2000级本科、2004级硕士校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

北京什刹海游客如织，崔琪穿过熙攘人群，在银锭桥停下脚步。他从背包里掏出本厚书，翻找到“银锭观山”内容，低头看看书，又看了看远处的西山，天蓝水清，西山的山脊一览无余。放在明清，这自是很寻常惬意的赏景，但放在前些年，凭栏远望，人们是看不全西山的，视野里楼层与西山“平分秋色”。

“站在当下，和历史对话。”崔琪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首都功能规划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24年是他从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第17个年头。从大运河（北京段）遗产保护规划到首都功能核心区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2014年开始参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及首都功能核心区规划要点的编制，崔琪用独特的视角直观见证着新版总体规划带来的实施成果，期待着“一张蓝图”指引下北京城市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效。因此，规划工作在崔琪眼中永远都有新鲜感。

降层复景，再现“银锭观山”视廊

在什刹海前海与后海的交汇处，有一座汉白玉石桥横跨南北。明代初年，这里

是一座木桥，像一个倒扣着的银元宝，得名“银锭桥”。后来木桥被改建为单孔石拱桥，但“银锭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咱们在银锭桥，凭栏就能远眺西山。”顺着崔琪手指的方向，蜿蜒的水系两旁，是颇具北京老城韵味的古建筑，水系的尽头，西山清晰可见。清朝时期民间流传的“燕京小八景”之一——“银锭观山”近在眼前。

“银锭观山”的美景，在数百年前就为京城文人所津津乐道，但岁月流转，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连苍茫的西山都被城市建筑遮掩了身影。崔琪说，在2021年之前，站在银锭桥上，是不能完全望见西山山脊线的，部分视线被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新北楼遮挡。根据资料显示，新北楼于1984年建成，地下1层，地上11层，建筑最高点约52米，从“银锭观山”的视角



崔琪校友在银锭桥

看，新北楼的高度越过了西山山脊线。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精心保护好这张金名片。‘银锭观山’是北京老城内典型展现山水城相融的景观视廊，属于老城内战略级景观视廊。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恢复‘银锭观山’景观视廊。”崔琪对于规划内容早已烂熟于心，因为这个要求已通过核心区规划实施要点传导到《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随着2020年控规批复得到再次强调。

他说，“银锭观山”视廊管控范围是以银锭桥为视点，沿后海岸线走势向西北眺望西山的扇形区域。视廊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高度不得遮挡西山山体，应完整展现连续起伏的山脊线景观，塑造水面、树木、山体由近至远层次清晰的传统景观风貌。

2021年，为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推动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传承历史文脉，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最终对积水潭医院新北楼进行了降层处理，“银锭观山”美景得以再现。同时结合降层和新建回龙观院区，适当调节新街口院区的规模，缩减床位，改善院区环境，缓解交通拥堵和就诊服务压力，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疏解的“增减挂钩”。

如今，什刹海来来往往的游客中，有北京本地居民、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有海外的华人或是外籍游客。有心的游客会像崔琪一样，专程到银锭桥上走一走，驻足感受一下“银锭观山”的美景，和历史对话。

汇集智慧，提升西单商圈连廊空间

在崔琪眼中，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进行安排，需要综合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美学艺术等多维因素，以实现城市的良性发展。“城市规划是一项极为复杂、综合性的工作。”崔琪说，“规划工作的法制性和政策性很强，必须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同时本身也带有很强的政策性，体现在对城市空间和各类资源要素的统筹、控制和引导，所以案头工作必不可少。但另一方面，规划师需要跑现场、做调研、摸现状，‘七分现状，三分规划’是规划行业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那么规划工作到底是怎么开展的？崔琪举了一个西单连廊空间提升的例子。作为西城区乃至北京城最知名、历史最悠久的商圈之一，西单商圈涵盖了西单商场、汉光百货、西单大悦城、君太百货等新老商厦及楼宇综合体，每天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新版总体规划提出要促进西单向高品质、综合化发展，核心区控规提出西单应成为展示新时代首都改革开放成果的窗口。西单连廊看似是个简单的过街天桥系统，在规划师眼中其实是西单商业区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系统，恰如“血管”，影响着整个商圈的“活力”，其改造提升成为西单商圈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重要机遇和抓手。

去年，崔琪参与到西城区政府和市规自委组织的西单廊桥空间提升项目中，负责方案征集任务书的编制。在工作过程中，对上位规划要求进行解读与落实，对廊桥建设的历史、地上地下现状情况、与周边商业建筑的联通关系、一二层车行人

行交通组织等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任务书的初步内容，再通过几十次的调研访谈、书面征集、网络渠道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沿线16家商户、人民大众、各行业专家、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从而形成凝结共识的征集任务书，配合政府开展国际方案征集，汇集中外各界智慧，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连廊空间提升方案，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实施完成并精彩亮相，形成西单特色的场景打卡点和魅力公共空间，并促进周边业态的互动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城市规划，一份总是 充满新鲜感的工作

作为十几年来北京城市规划的参与者和直观见证者，崔琪时常会感慨于北京的发展变迁，特别是在新版总体规划指引下，一条条老北京胡同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一个个街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一处处景观换了新的容颜……

崔琪说，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谋划首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时刻关注着“都”与“城”关系。

在此基础上，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城市发展规律，在具体策略层面会有针对性的优化。在新版总体规划指引下，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已经形成全域全要素全过程规划管控与实施引导。城市规划体系越来越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三级三类四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三级”为市、区、乡镇三级，即城市总体规划、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即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域规划

即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三类”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四体系是从规划编制空间、规划实施时间、规划监督反馈修正、规划保障运行支撑四个维度，建立了相应的规划编制体系、规划实施传导体系、规划监督体系、规划运行保障体系。

城市规划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比如，“现在在北京已经到了存量发展阶段，对城市规划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更新需要关注的除了空间，还有产权、政策、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因此规划师也要不断学习，持续更新知识库，“工作17年，虽然忙碌，但每天都能接触到新的东西，总能带给我新鲜感。”

崔琪对于城市规划工作有自己的理解，在工作过程中，规划师的“规划定力”格外重要，明确规划师的核心价值观是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规划，总要有取舍，严格恪守规划原则就不会错。做城市规划要有前瞻性，考虑长远发展的目标，也要综合考虑到可实施性和合理性。”

规划工作也能带来很强的成就感，崔琪至今都记得，《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审批通过时，他和同事们有多激动。在新版总体规划引领下，老旧小区改造、片区保护更新、公共环境改善、花园城市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在有序开展。对于下一个十年北京城市的发展，崔琪十分期待。北京城市规划的目标很宏伟，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转自《新京报》，2024年2月26日）

生命科学：从零到极致

——一群 TEEC 人的创新创业故事

千禧年钟声敲响，人类进入了新纪元。这一年4月底，一群身穿蓝色实验服的中国科学家站在一排排电脑前，双手举过头顶摆出胜利的“V”字，他们刚刚按照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部署，完成了1%人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身后墙上贴着的“让人类踏着坚实的序列迈进”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两个月后，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6国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绘制成功。这项生命科学领域的“登月计划”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评价为是“开辟新纪元的成果”，并称“人们将世代记住这一天”。

随着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完成，人类拥有了“生命说明书”，并希望以此来克服疾病，从而实现健康长寿。直至今天，全世界各国科学家们也仍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21世纪生物产业发展的机遇，中国没有失去。

随着学科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中国医疗健康产业驶入了快车道。在快速发展之下，有这样一群有着共同标签和强烈身份认同感的参与者，他们是清华校友，也是清华企业家协会（TEEC）会员。而作为参与者，这群清华人共同创造了一个进取、创新、无畏的群体形象，也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坚实支柱。

弄潮儿

1999年，纽约长岛，在一间不到30平



创业之初的孙中平校友

方米的出租实验室内，一家叫金唯智的生物科技公司成立了，其主要业务是为研究人员提供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服务。公司英文名“GENEWIZ”拆开来分别是“基因”和“能手”的意思，寓意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基因的奇迹，也唯有智慧才能创造财富。

公司的两位创始人孙中平（1982级无线电；1987级硕，生物）和廖国娟（1986级硕，生物）是清华校友，两个人不仅都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又都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对生命科学有着无限探索和好奇心的两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在生物科技领域闯出一片天地。

然而创业并非易事，更何况是在大洋彼岸。尽管当时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尾声，人们开始能够“读”基因，并刺激了DNA测序及其延伸服务的发展，但当时美国的创业环境并不十分友善。而廖国娟却觉得，正是由于前景不确定，所以

才更有意思，自己就想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对廖国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别人无法打垮你，除非你自己选择被征服”。于是，就在那间租来的实验室里，金唯智收获了第一桶金，而当有生物公司的研究人员来向廖国娟和孙中平咨询问题时，两人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回答，这份帮助得到的意外回报就是同时也是房东的这家生物公司，主动免除了金唯智的租金。之后的金唯智，就像开足马力的跑车，快速飞奔。

2003年，金唯智推出了全球首创的“当天7小时”快速测序服务，让包括洛克菲勒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多家世界一流研究院校陆续选择金唯智，作为其基因测序的合作伙伴。2007年，金唯智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建立第一个卫星实验室。2008年，金唯智回国发展，在北京建立公司。2015年，金唯智收购美国贝克曼（Beckman Coulter）的基因组业务，进军欧洲市场。三年后，金唯智加入Brooks Automation，由此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一部分。

“做世界最好，为世界更好。”这是廖国娟在24年创业历程中一直努力打造的企业文化，而这都源于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在廖国娟看来，这里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追求个人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并对他人和社会有积极的影响。而由此形成的企业文化凝聚了金唯智的团队：在个人层面不断进取；在团队层面积极合作，互相成就对方；在社会层面，则要追求“为世界更好”。2021年1月，金唯智中国总部大楼一期工程顺利封顶。作为项目设计



廖国娟校友

方，同为TEEC会员的查金荣领衔的启迪设计集团最终打造出了和金唯智高科技企业相符的总部基地形象大楼。

打破天花板

2018年12月17日，首个国产PD-1产品特瑞普利单抗（商品名：拓益）获批上市，随后更以相当于同类进口药1/3的价格刷新了PD-1的全球最低价，这些都让这款创新药的拥有者君实生物在国内初创企业中显得有些特别，也让这家创新药企成为了外界热议的焦点。

冯辉（1992级生物）是君实高管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特瑞普利单抗上市当晚，冯辉和几位初创团队成员聚在一起，无不感慨。青年时的梦想之花尽情绽放，他们也终究做出了中国自己的抗体新药。

1997年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冯辉便开始了海外求学之路，并在之后一直专注于新药研发。而在结束国外安稳生活准备回国之时，冯辉就已经想好，与其在国外做抗体药物，不如回国做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产品，打造梦想中值得骄傲的民族企业。

“如果一开始就想明白做创新药的艰辛，会碰到数不清的困难，也许我就改主意不敢回来了。” 尽管如今的冯辉可以

轻松调侃新药研发的不易，但他也始终认为，在中国医药行业，创新药的故事离不开梦想、勇气、激情和情怀。

在上海张江药谷大厦里一间不到300平米的实验室里，冯辉扎进了化合物筛选的瓶瓶罐罐中，而药审改革大幕的拉开为君实生物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助力。2015年特瑞普利单抗临床获批，成为第一个中国公司研发的获得IND批准的抗PD-1单克隆抗体药物，让君实生物迈入了临床药物开发阶段。也是在这一年，君实生物正式挂牌新三板，实现了资本化进程。

搭上时代顺风车的君实生物，跑出了加速度。冯辉更是感慨，如果早10年回来，或许他们这帮“海归”大概率会变成“海待”。“所以踏对时间节点很重要。”

同样踏对时间节点的还有药明生物。

2017年12月6日，药明生物3万升生物药无锡生产基地正式全面投产。这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使用一次性反应器的生物药cGMP生产基地，也是已投产的中国最大的生物药生产基地之一。

生产基地的全面投产，让药明生物成为国内第一具备生物药大规模生产服务能力的企业，也让它成为在MAH制度的巨大红利下第一家做好充分准备的国内企业。另一方面，全面投产也意味着药明生物成功搭建了从前端研发到后端商业化生产的一体化技术平台，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闭环。

站在投产仪式纪念板前的陈智胜，显得意气风发。2017年6月，药明生物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往前两年的2015年，药明生物成为独立公司，提供有关生物制剂药物发现、开发及生产的一系列综合服务。而如果再往前回到2011年，药明生物

还只是药明康德旗下的生物制药部门。

1994年，陈智胜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工程以及自动化双学士学位。之后他继续出国深造，并在美国从事多年抗体及疫苗的工艺研发、生产技术转移、工艺认证、质量管理以及报批等工作。2008年，陈智胜选择回国，并加入上海赛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担任首席运营官，负责生物制剂的开发、生产及质量控制。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要有新作为。”

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让包括陈智胜在内的很多生物和化学专业人才可以留学深造，开拓国际视野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行业经验。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创业环境以及创业氛围让陈智胜最终选择回国。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巨大的生物药市场和创新创业氛围吸引着全球目光；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不断技术创新，带领中国生物药研发走向全球领先。”

把国内生物药成本相较于国际降低70%~80%，让中国的病患用得到和用得起国际最先进的生物医药，这是陈智胜一直以来的梦想和目标，他也时常感叹，能从事目前的事业，要感谢在清华大学的那段学习经历。

“是清华的培养奠定了我的从业方向，化学工程是涵盖极为广阔的专业，对许多行业都有重要的影响，自己能从事生物医药行业也离不开当年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陈智胜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母校，读书时获得的“光华奖学金”给了他很大的激励和鼓舞。而后来在事业发展中，陈智胜也有机会与奖学金的捐赠者交流合作，这种相互扶持、彼此成就的感觉令他深受触动，也促使他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帮

助更多人。

万物生长

2015年，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何霆，获得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与其他两位清华生物系校友联合创办了“艺妙神州”，主攻CAR-T疗法——被称为最有希望攻克癌症的疗法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何霆的第一次创业。

没有像大多生物学博士一样选择科研之路，何霆的创业之举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母亲的支持和认同，母亲还说他是“不务正业”。不仅如此，3位创始人没有任何直接做CAR-T的经验，同时没有创业经验，甚至连工作经验都是“零”，也让这件事看起来困难重重。

“我希望做一件能够真正改变一些疾病治疗现状以及一些人生活的事情。”而要实现这一点，在何霆看来，“做公司”似乎比“做科研”更为合适。此时，清华大学成熟的创业项目孵化体系，在艺妙神州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成立当年，艺妙神州就获得了来自同创伟业、清华大学x-lab 创业DNA基金的天使轮投资。这笔天使投资让何霆真正踏上了创业之路，艺妙神州的第一个实验



何霆校友

室、第一位加入的员工、第一个新技术研发，都由此开始。

“对于我们来说，投资很重要，没有钱进来，我们的研究就没办法继续。”而刚开始创业的何霆根本不懂什么是创业和企业管理，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找到清华大学的孵化器——清华大学x-lab，后者则为其提供了体系化了解企业管理知识的窗口，这对当时没有经验的何霆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

有了第一笔资金，艺妙神州的研发进程大幅加快，并在此后的6年中七度获得战略投资。2020到202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内，艺妙神州研发出首款CAR-T产品IM19，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的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或难治的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复发或难治的套细胞淋巴瘤。凭借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平台和早期数据，产品先后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3项临床试验批件，这也正式宣告艺妙神州走进了中国自主CAR-T药物领域的领先行列。除了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等血液肿瘤领域一马当先，何霆也带领团队在肝癌、黑色素瘤、胃癌和胰腺癌、结直肠癌等实体肿瘤上实现了多个基因细胞药物的重大研究突破，真正让癌症不再是绝症成为可能。

何霆说，他是一个一旦设定了目标，就会全力去奋斗争取的人。“我们当时定下的目标就是希望用CAR-T技术来把癌症治好，也预料到这件事情会很难，但是当我们决定之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2021年，何霆入选了《财富》发布的“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财富》在对与他同时入选的商界精英们的评语中写道：“经过一场疫情的考验，

2021年，在经济继续复苏、推崇创新的新商业环境下，这些年轻的商界领袖置身于科技、零售、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持续地创造价值，引领着中国商业世界的变化，甚至影响全球。”

就像借助CAR-T赛道的火热，中国生物医药希望可以实现“弯道超车”一样，在中国发展并不算早的基因治疗，也被认为是能够带领国内医药行业“弯道超车”的潜力选手之一。

2021年3月30日，纽福斯生物宣布其自主研发的NR082眼用注射液（rAAV-ND4，研发代号NFS-01）旨在治疗ND4介导的莱伯遗传性光学神经病变（ND4-LHON），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册性药物临床试验许可，将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这是国内首个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眼科体内基因治疗药物。目前，该药物中国I/II期试验业已完成。此前已被美国FDA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授予孤儿药称号（ODD），是首个同时获得中国NMPA及美国FDA授予的临床试验IND许可的中国籍基因治疗新药。

纽福斯生物的创始团队，从2008年开始研究针对Leber遗传性视神经病变的基因治疗，并于2011年启动全球首个LHON基因治疗探索性临床研究并完成了此结果为全球基因治疗最长随访纪录。2017至2018年间，团队又进行了一项研究入组受试者达159例的临床研究，这也是目前全球整个基因治疗领域样本量最大的临床试验。

2018年7月，纽福斯生物完成了1500万元天使轮融资，这轮融资由华大奇迹之光领投，薄荷天使基金和北极光创投跟投。而在这之后，拥有十余年基因治疗领



肖溯校友

域经验，尤其擅长基因治疗工艺开发的肖溯（2006级化工）加入了纽福斯生物，担任联合创始人，她则被外界喻为是纽福斯生物的另一位“灵魂人物”。

从清华大学化学与工业生物工程专业毕业后，肖溯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取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并一直活跃于美国基因治疗药学领域。而对于选择回国加入一家本土创新药企，肖溯说做这个决定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2019年初，她以第23位员工的身份加入了纽福斯生物，并带领公司完成了1.3亿元的A轮融资。她的加入也为纽福斯带来了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让公司成为一家扎根中国、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公司。现在，公司已经完成了4轮10亿元融资并在中美两国的四个城市进行了布局。

药好，创始团队好，优秀人才加盟，以及对眼科基因治疗的成药信心，是肖溯选择纽福斯生物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目标就是通过提升产品开发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使得基因治疗变为广大病人真正可及的治疗方式。

和肖溯一样，苏州克睿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元元（2004级博，医学院）对于自己想要干什么，也有



徐元校友

着明确的方向和规划。

这位80后CEO在2009年清华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进行深造，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王宏伟，则是当时徐元元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导师。“他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的人，所以回国半年后，他就创业了。”

2016年7月，克睿基因在苏州正式成立，这是一家致力于开发针对实体瘤和常见遗传疾病细胞与基因治疗的临床阶段公司。通过创新的技术平台——包括通用型CAR-NKT平台AIMS CAR-NKT™和独特的AAV技术平台VELP™，克睿实现了差异化的管线布局，引领源头创新。公司成立以来完成近1亿美元融资，并率先完成国内首个病毒载体领域与全球Top20制药公司的授权合作，建成了11000m²的高规格基因编辑和基因治疗研发生产中心。

在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与否时，徐元元直言，不管做到怎样的业绩，只要创业了，自己就成功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明白自己真正想做的，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作为同校学姐和创业前辈，廖国娟也是徐元元的事业导师，TEEC“受助、互助、助人”的宗旨不仅体现在前者对徐元

元创业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也有企业发展中的资源支持。克睿基因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与廖国娟执掌的金唯智达成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此举加速推进了公司发展。

不仅是基因治疗领域，医疗器械的临床和技术创新也是近几年的热门方向之一。努力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外企垄断并在细分领域取得世界领先，成为这些初创企业的主要目标。

刘文博（2003级生物；2007级硕、2009级博，医学院）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已经专注手术导航和手术机器人领域十余年。2015年，刘文博参与创办了专注于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的国内创新企业华科精准，而其兄弟企业华科恒生已经在国内颅内电极市场颇有影响力。

选择创业，刘文博是经过了一番思考和疑虑的。“这一路有很多不容易，不过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也是时刻提醒我，让我能克服创业的艰难和挑战，才有了今天的业绩。”

目前，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手术导航世界上的主要厂商一般均采用反光球等标记点或者激光辅助定位的方式，通过三角法推算出某点的3D坐标并完成定位。刘文博直言，这类产品其实目前在临床



刘文博校友

□ 清芬挺秀

上存在定位时间长、操作复杂等不足，同时功能也局限于导航定位。而华科精准的产品通过和清华大学医学院多年的合作，瞄准世界前沿技术，创造性地将工业和消费领域的3D结构光技术应用于手术机器人，不但定位精准、稳定性好，而且使得定位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操作步骤大量简化、操作时间缩短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在临床应用上已成为国内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同时该技术还在业界取得较大反响，欧美主要厂商也逐渐开始布局3D结构光技术。

在刘文博的带领下，充分且适当的引

入清华大学强大的科研能力，在短短5年间，华科精准团队已有4款产品进入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评通道，其中两款已取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华科精准也一跃成为北京优秀的创新医疗器械企业代表之一。

“我们有能力做，也会做得更好，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时光悠悠，岁月流转，当懵懂少年蜕变成为行业栋梁之才，不变的是作为清华人的气节和坚守，以及心底的那份最初的理想和信仰。

（清华企业家协会供稿）

● 紫荆花开

“95后”第一书记，在村里干些啥？

○王思涵

“驻”进村民心窝的第一书记

齐耳短发，圆框眼镜，不施粉黛的青春脸庞，勾勒出江西省寻乌县长宁镇三二五村年轻的第一书记张哲瑜。在许多人尚未开始规划未来的年纪，作为一名标准的“95后”，张哲瑜已扎根在赣南的群山之间，操心着村庄的作物收成和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

2020年6月，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之际，张哲瑜考上了选调生。同年，位于江西赣南寻乌县的三二五村获评“全国首批红色名村”。相隔1900多公里的人与乡村，在冥冥之中缔结起深厚的缘分。

2021年12月，张哲瑜来到三二五村，担任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回忆过



张哲瑜校友

去，张哲瑜直言：“接到调令时，也曾担忧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但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参与研究生“知行计划”，去到脱贫攻坚一线时所受到的触动，以及学校一直以来倡导的“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就业择业观推动她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在乡村振兴事业上

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基层工作繁重且琐碎。作为三二五村的第一书记，张哲瑜不仅肩负着扎实推进三二五村基层党建的重任，还承担着防返贫监测、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村级治理、乡风文明等工作。为此，她需要高频次地走访、排查，防范化解矛盾风险，帮扶救助困难村民。

工作期间，她常常踏着朝露出门，披挂月色而归。为了方便地在田间地头穿行，张哲瑜抛却“爱美之心”，用耐脏的黑色球鞋填满自己的鞋柜；为了摸清村情民情，拉近干群关系，身为北方人的她，还在一年之内学会了寻乌方言，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成为深受村民信任的“张书记”。

“全能手”走出新路子！

“大家看，这是我们三二五村本地有名的鹰嘴桃。这种桃子又大、又甜、又脆……”镜头内，是张哲瑜如沐春风的笑容，镜头外，是她日复一日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的努力。

甫一到村，张哲瑜便被三二五村厚重的红色历史所吸引。三二五村的村名起源于1928年3月25日打响寻乌革命第一枪的“三·二五暴动”，毛泽东著名的《寻乌



张哲瑜校友（右）为留守老人包饺子

调查》《反对本本主义》两部著作也于这里完成。

在张哲瑜到来之前，因缺乏宣传，有些红色历史可能已被人遗忘，张哲瑜敏锐地感知到，它们不仅是需要被唤醒的历史记忆，也是值得挖掘的文化资源。凭借着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学到的专业知识，张哲瑜写脚本、拍视频、做剪辑，带领村干部们经营抖音、微信视频号，用各种新奇有趣的视频形式讲述红色名村的故事，视频总浏览量破百万。

红色文化的发掘、传播，提高了三二五村的社会关注度。为彻底改变三二五村的环境面貌，张哲瑜争取得到1000多万元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对村里的路面、下水管网、停车场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改造，让三二五村的村容村貌大变样。

以红色文化为抓手的乡村振兴初步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张哲瑜并未止步于此。她明白，要让乡村振兴的成果不流失，不能只依靠“外部输血”，更要引导乡村“自主造血”。她同村干部们一起，注册“红心果社”“寻福礼”等商标、品牌，以“品牌+文创”的商业模式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为扩大农产品销路，她带领大家做起直播电商，不仅亲自上阵客串“带货主播”，还劝说外地务工青年返乡创业，与村内的家庭主妇、脱贫户们一起，组建出一个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

他们通过线上直播间和线下展销会，将香甜的赣南脐橙、鹰嘴桃、百香果销售至全国各地，在最成功的一次直播中，张哲瑜及其团队取得了一晚50万元销售额的可观成绩。他们还开发出了百香果“云

□ 清芬挺秀

认养”小程序，让全国7000多名网友在三二五村认养了属于自己的水果。

张哲瑜积极推动红色文旅发展。为了把寻乌调查的品牌做大做强，让调查研究的精神深入人心，她打造寻乌调查1930红色文旅街区，以实景化的形式呈现出《寻乌调查》中1930年的寻乌城。文旅街区开业第一天的游客接待量，便高达7万人次。不仅给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还将三二五村“全国调查研究第一村”的招牌远远地打了出去。

在让红色底蕴成为带领村民“富起来”的火车头的同时，张哲瑜成立“三二五红色宣传队”，组织开展红色历史宣讲、红色诗歌朗诵等活动，传承红色记忆，提高集体凝聚力；还策划“乡村春晚”“新春时装走秀”“集体婚礼”等，组建“三二五村舞龙队”，推动移风易俗，丰富当地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多元的文化活动之外，她还推动了“三二五文化客厅”建成落地。在这个服务老百姓的文化空间中，城市书房、24小时健身房、艺术展馆、青年创业中心应有尽有，以三二五村为基点，满足附近3.5万老城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2022年，张哲瑜促成寻乌县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牢记“行胜于言”的校风，她以身作则，号召更多的清华学子一起，用乡村振兴的亲身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小村庄干了个大事业

自担任三二五村第一书记以来，张哲瑜走完了130户脱贫户、筹办了300多场文明实践活动、下了50多次大湾区、卖了400多万元的农产品、撬动了8000多万元



2022年寻乌脐橙节上，张哲瑜校友（右）和村里的主播共同出镜卖货

的红色名村能级提升……如今，这些数据依然在被不断刷新。

在张哲瑜和村民、村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三二五村——这个曾一度因为缺乏耕地、人口流出和果树病害而沉寂下来的红色村庄，通过新闻宣传、直播电商和市场化运营，由内而外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扎根在“小村庄”，干的却是“大事业”。凭借在乡村振兴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张哲瑜先后获得“赣州市身边好人”“江西好人”“新时代赣鄱先锋”等荣誉称号。

作为三二五村乡村振兴事业的“主心骨”，张哲瑜对这片热土的未来有着更深远的期盼：“要建设产业基地，发展红色文旅，持续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每一次新的尝试，都为三二五村的现代化发展体系安装上一个新的传动齿轮，让这个体系更好地运转并反哺乡村，提升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投身广阔天地，实现远大作为，乡村振兴是一场艰苦而漫长的跋涉。可张哲瑜相信，“路虽远，行则将至”，她将继续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乡村振兴中的青年担当！



邱勇访问新加坡、越南、泰国并看望当地校友

2024年1月25日至31日，校党委书记邱勇率团先后访问新加坡、越南、泰国，并看望当地校友。

在新加坡，邱勇与在新工作的校友代表进行了交流，介绍学校最新发展，了解校友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希望大家自强创新、行胜于言，以更强担当更大作为在深化中新两国间友谊与合作方面贡献力量。邱勇还看望了在新加坡进行海外实习的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学生代表，勉励大家充分利用海外学习机会，拓展宽广的学术视野，努力成长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层次人才，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活力。

在新访问期间，邱勇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举行会谈，两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合作协议。邱勇还与新加坡教育部部长陈振声会面，双方就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医学学科发展等进行了交流。邱勇还参访了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下一代搜索联合研究中心（NExT）、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和中远新港码头。

在越南，邱勇看望了曾在清华学习的越南籍校友代表。大家纷纷向母校汇报工作取得的新成绩，感念清华对自己的培养和深远影响。邱勇说，看到各位校友学有所成回到越南，积极投身中越两国友好事业，十分感动。希望大家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以更广胸怀、更宽视野担负起时代责任，努力成为中越友好的继承者、友好合作的推动者和共同发展的建设者。

在越访问期间，邱勇一行与越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胜会面，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教育、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作了交流。邱勇还与河内国家大学校长黎君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增进师生互访往来、加强学术交流和办学治校经验互学互鉴等方面达成共识。邱勇还前往越南教育与培训部，与部长阮金山、常务副部长阮文福举行会谈；会见了越南邮电技术大学校长邓淮北，越南外交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范兰蓉，分别就拓展双方合作领域交换了意见。

在泰国，邱勇看望了在泰清华校友代表，向大家介绍母校的最新发展情况并表示，清华人心中有水木清华，清华人更憧憬大地清华。希望校友们做传承中泰友谊的接力者，为增进两国友好、深化互利合作贡献力量。与会校友代表纷纷表示要发扬清华人的优良传统，不仅要通过实际行动反馈母校，更要为推进中泰之间的友好交流贡献力量。邱勇还调研了中泰两国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泰铁路施工现场，与清华校友、中建国际亚太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涛和中国建筑工程（泰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崇明进行了交流，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及清华力量在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邱勇还与亚洲理工学院校长山本和夫等举行会谈，双方均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愿望。

化工系、医学院、卫健学院、公管学院、社科学院、科研院、国际处、教育基金会、校友总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有关活动。

（宗和）

邱勇赴福建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3月14日至15日，校党委书记邱勇赴福建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15日上午，清华大学在闽引进生及青年校友代表座谈会在宁德市举行。在听取十余位引进生及青年校友代表先后汇报的在福建工作的感悟收获后，邱勇对大家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说，校友们恪守“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干大事业”的信念，毕业后选择到福建基层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奉献，彰显了清华学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希望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学习本领，用自强不息的奋斗、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勇毅前行，为新时代福建建设再立新功。

14日下午，邱勇一行来到闽江学院，

与在闽高校校友代表座谈交流。在听取校友们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汇报后，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党委始终坚持把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作为重点工作常抓不懈，近年来持续加大向地方高校的人才输送力度，努力为地方高校人才培养贡献力量。看到在闽高校工作的校友们对教育学术事业的热忱与执着深感欣慰，希望大家胸怀“国之大者”，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使命，为福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共同努力。

在福建期间，邱勇调研了闽江学院、清华附中福州学校、“天洲工程”项目建设地，推进深化省校合作。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校党委副书记过勇等参加有关活动。

（曲田）

李路明校长与瑞士校友亲切交流

1月14日，校长李路明、副校长王宏伟一行抵达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参观访问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苏黎世大学、卢加诺市政府和卢加诺大学等单位，进行交流访问。

“每个校友就是一个移动的清华，清华以你们为骄傲。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把清华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顶尖大学而奋斗。”清华大学新任校长李路明的讲话博得了校友们的热烈掌声。在苏黎世和瑞士校友座谈是李路明一行的第一站。瑞士校友会秘书长方念东代表全体校友对校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李路明向校友们介绍了清华近一年来的发展进步和未来的计划，着重介

绍了学校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还介绍了清华大学在国际化以及进一步开放吸引国际优秀杰出人才加入清华方面的全球布局。王宏伟副校长对这方面的工作做了补充。

来自瑞士各地和全球其他地区的近40名校友、家属和嘉宾参加活动。方念东秘书长感谢校友总会和瑞士校友会的信任，并向校长一行和参会嘉宾及校友、家属汇报了本届欧洲校友大会将由瑞士校友会承办的消息。在和校长一行合影后，校友们展开互动交流。交流结束后，校友们和校长一行依依惜别，目送校长一行踏上前往达沃斯的路途。（陈宇飞 乔志东）

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李路明当选清华校友总会理事会会长

3月18日，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工字厅召开。校友总会副会长姜胜耀、韩景阳、吉俊民、王岩等出席会议。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选举办法》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会长选举，全票通过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当选为清华校友总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

李路明向理事们介绍了过去一年学校在各个方面的进展，并表示，校友工作在促进母校与校友加强沟通联系、增进情感联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力地凝聚起校友力量、共促学校发

展。感谢理事们的信任，未来将与各位理事、校友总会秘书处一同为校友做好服务工作，努力团结广大校友，共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清华力量。也希望各位理事对学校发展建设和校友工作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

分管校友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表示，清华校友工作有着非常好的传统，今后将协助会长做好校友工作，更好地凝聚广大校友的力量，共同建设更好的清华。

会议通过由校友总会秘书长、校友办主任唐杰提名的校友办副主任朱亮担任清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德国清华校友会副会长吴春艳兼职担任清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

（朱芙蓉）

第八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总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2023年12月28日，第八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总颁奖典礼暨项目展示对接会在京举行。大会由三创大赛秘书长袁剑雄主持。

校友总会副会长、三创大赛组委会主任史宗恺在讲话中向获奖团队表示祝贺，对支持赛事的各合作单位表示感谢，并指出今后三创大赛要通过研究初创团队及其价值意义、总结凝练清华创业者的精神特质、探索服务科技强国的创新机制、发挥对社会的示范引领作用来实现赛事更高质量的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初创团队的成长，服务和推动社会的进步。

校友总会秘书长、三创大赛组委会执

行主任唐杰对第八届三创大赛进行了总结回顾，并介绍了第九届三创大赛的初步规划。计算机系教授、三创大赛顾问杨士强围绕“创业有开端，事业无终点”讲述了清华校友群体的创业故事。大会还举办了以“创新创业的清华人”和“三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两场圆桌对话。

第八届三创大赛设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集成电路与物联网等八大赛道，每个赛道分为种子、天使、成长三个组别，共有635个项目报名参赛。经过晋级赛、总决赛选拔，最终每个赛道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三创导师聘任、致谢赛事合作方等仪式。（三创秘书处）

● 院系工作

新闻与传播学院分会举办
《烟火人间》首映交流分享会

2024年1月13日，由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制作、509位普通人共同“主演”的纪录电影《烟火人间》在全国院线公映。首映当天，新闻学院校友分会在首映现场举办了《烟火人间》首映交流分享会。《烟火人间》导演孙虹，新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校友分会副秘书长庄臣出席。

作为国内第一部由UGC手机短视频共创而成的“竖屏贺岁片”，《烟火人间》由海量普通人拍摄的纪实影像共创而成。全片使用887条短视频，通过鲜活、生动、直接、朴素的自拍影像，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影像联结成围绕“衣、食、住、行、家”五大主题的普通人生活图景，呈现了农民、工人、卡车司机等群体的真实生活状态，描摹出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群像。

观影结束后，导演孙虹表示，早在2018年底、2019年初，团队就开始了这部影片的筹备工作。当时短视频的风靡似乎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纪录片行业带来了危机感；但另一方面，短视频以手机自拍的方式记录了普通人精彩、鲜活的生活，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呈现与表达的方式。特邀嘉宾科幻作家、“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和与导演因纪录片结缘的演员金靖先后分享了对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短视频的感受。多位校友及其亲友也分享了自身的观影感受，表示《烟火人间》这部饱含人文暖意的精彩影片，让人们通过芸芸众生的“自画像”看见了一个生动、真实的当代中国。

(姚欣可)

● 行业兴趣

AI大数据专委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
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2023年12月17日，AI大数据专委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70余位专委会理事及会员代表在线下或线上参加会议。会议由王霞主持。

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当选会长，精准医学研究院战略发展部主任王霞当选秘书长。

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杨柳出席并对新一届理事会表示祝贺，对过去为专委会工作辛勤付出的理事表示感谢。她充分肯定了专委会成立以来在校友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希望行业专委会发挥行业影响力，服务好校友；发挥情感感召力，服务好学校；发挥资源整合力，服务好社会。

孙茂松在发言中说，当选AI大数据专委会会长深感责任重大，将竭力为大家服务，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特点及态势”的演讲中介绍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独有的创造性、多样性、个性化等特点，表示生成式AI将改变人类的创新方式，带来产业生态的重新洗牌。

AI大数据专委会执行会长韩亦舜表示，AI大数据专委会有其特殊性，由于大数据可以赋能助力各领域实现升级、培养跨界人才的特性，专委会有责任加入打造清华技术应用领域的生态中。希望专委会继续秉承校友总会的服务理念，加强各专委会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一个面向未来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氛围与生态。

(AI大数据专委会)

各地校友会简讯

湖州市清华大学校友会成立

2024年1月20日，湖州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召开成立大会。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姜胜耀、湖州市副市长郑新友、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黄开胜、湖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臧雷鸣、清华校友总会副秘书长董吉男，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兄弟校友会、湖州市相关单位的嘉宾和校友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姜胜耀在致辞中表示，清华的校友工作始终围绕“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国家和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形成了“爱国奉献，爱校感恩，爱友互助”的三爱文化。他期望湖州校友会服务好当地校友，与母校发展同向同行，切实服务湖州的经济社会发展。

郑新友在发言中冀望清华校友与湖州科创链紧密融合，助力湖州搭建合作的桥梁，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湖州市民政局副局长耿斌宣读批复文件。大会现场对校友会章程、选举办法、财务制度及会费管理办法进行表决，并选举了第一届理事和监事成员，由董吉男公布第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名单。第一届会长杨清华作就职报告，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奇华作筹备工作汇报。

姜胜耀、郑新友、杨清华、湖州市教育局局长金淦英共同为湖州校友会揭牌。大会还进行了湖州清华校友活动中心揭牌、清华校友项目落地湖州颁发钥匙、清华校友助力湖州经济新发展交流会等活动。

（湖州校友会）

亚利桑那校友聚会纪念“一二·九”

2023年12月10日，亚利桑那校友会于Silverleaf高尔夫俱乐部举办了以纪念“一二·九”为主题的聚会活动。近四十位校友及其家人齐聚一堂，交流最近一年的生活点滴，互相勉励，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活动前，H&S建筑设计公司创始人胡冰校友捐赠了亲自设计的亚利桑那校友会纪念衫和纪念帽。纪念衫帽采用经典的紫、白校色，象征着中西文化的会通，亦是清华的历史与文化的见证。活动当天，校友们不约而同地换上纪念衫，品尝各自家乡的经典美食，大家共同回忆过往，分享现在，展望未来，气氛热烈。活动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蔡挺）

江西校友会 2023 年迎新活动举行

2023年12月31日，江西校友会2023年迎新活动在泰豪动漫学院举行。江西校友会会长黄代放、副会长周捷，以及2023届校友代表参加了活动。黄代放致欢迎辞，他介绍了校友会的历史和现状，并勉励大家传承清华精神，报效祖国，回馈社会。2023届校友代表分别进行自我介绍，对未来投身江西发展建设表达了决心与希冀。2015届选调生校友王太红、2020届校友习江北、2021届校友聂志斌先后围绕自身在基层工作经历与思想感悟进行了分享交流，并鼓励新校友们要传承清华精神，扎根基层，真抓实干，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核心。活动最后，黄代放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历，勉励大家要珍惜在基层锻炼的宝贵机会，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为江西的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江西校友会）

□ 校友联络

廊坊校友会举行 2023 年年会

2024 年 1 月 7 日，廊坊校友会 2023 年年会在廊坊市召开，60 余名校友参加。会长马利国在致辞中表示，校友会将一如既往地服务校友，提升校友工作水平。秘书长李江平作年度工作报告及 2024 年工作展望。会议增补刘敏胜等三名理事，聘任校友武万里、赵云峰、田雪棠为副秘书长。马利国和河北院主任张华堂为赵世琦等四位校友颁发了“校友工作贡献奖”。围绕“协同发展 创新引领”，刘敏胜等六位校友结合自身工作经历进行了分享。三创大赛秘书长袁剑雄、天津校友会会长庄宇、光明日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董山峰和张华堂先后发言。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张数一介绍了学校和总会的发展情况，希望廊坊校友会继续做好校友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廊坊校友会）

沈阳校友会举行迎新座谈会

1 月 14 日，沈阳校友会迎新座谈会在北方国际传媒中心举行，60 余人参加。校友会党支部书记张坚强在致辞中欢迎新校友的到来，并勉励大家要为沈阳和辽宁全面振兴作出贡献。校友会校友代表召集人王成鑫分享了自己在沈阳的工作经历，希望新校友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在辽沈大地上建功立业。新校友代表：沈飞的张馥麟、辽宁省公安厅的郜进、辽宁省委政法委的刁玉先后发言，表达了建设沈阳、振兴东北的愿望。其他新校友一一做了自我介绍。校友代表李纪宁、赵永圣，联席会长于宝海、霍起、刘元畅、周宇等在发言中欢迎新校友们的到来，并鼓励新校友积极参与校友会的活动，踏实工作，事业进

步，收获精彩人生。（沈阳校友会）

青岛校友会举行敬老迎春联谊会

1 月 14 日，青岛校友会敬老迎春联谊会在青岛府新大厦举行。王帆会长表达了对名誉会长钱善本等老学长及与会校友们的祝福，并表示未来青岛校友会将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校友服务工作。名誉会长刘东海向大家送上祝福，对未来校友会工作开展等提出了期望，希望校友会的发展越来越好。副会长姜兆义、王爱国希望在青校友能继续加强合作交流，团结力量，再创辉煌。孔庆山等在青校友与老学长们围桌畅谈，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联谊会前，副会长朱海与名誉会长刘东海、姜华山等先行拜访看望了老会长郭松年，并送上姜华山专门题写的“松鹤延年”条幅以表新春祝福。（青岛校友会）

欧洲清华校友交流沙龙举办

1 月 20 日下午，欧洲校友交流沙龙在意大利米兰的清华大学中意设计创新基地举办。校长李路明、副校长王宏伟，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公参周西松，以及来自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 40 余位校友出席了活动。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及部分校友嘉宾在线参加了交流活动。李路明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表示学校着力增强学生的全球胜任力，进一步夯实培养新一代创新拔尖人才的能力。希望欧洲的校友们充分发挥在各自领域的优势，为母校发展贡献校友力量。意大利校友会会长喻方欢迎欧洲各国校友们的到来。校友孙颖、雷宇芯等先后作了分享。德国校友会会长陈国辉、副会长吴春艳，瑞士校友会秘书长方念东，全英校友会副会长陈

彩等分别发言。校友们对进一步加强学校和校友的紧密联系、广泛发挥校友作用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和建议。活动结束后，校友们参观了清华大学中意设计创新基地。（意大利校友会）

南京校友会迎新春联谊会举行

1月20日，南京校友会2024年度迎新春联谊会在南京市举行，近300位校友和嘉宾参加。会长游石基在致辞中表示，南京校友会将继续做好校友会工作，为校友、为母校、为社会作出贡献。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肯定了南京校友会的工作，并向参会校友介绍了校友总会过去一年里的工作开展情况。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蒋跃建作《新征程·新南京》报告，并勉励各位在宁校友担当起属于清华人的使命，建设美好新南京。三创大赛秘书长袁剑雄介绍了第八届赛事情况及第九届规划设想，并欢迎各位校友企业积极参加三创大赛。南京校友会秘书长钱俊作2023年度校友会工作汇报。校友会各个分会负责人介绍了分会活动开展情况，并现场招新。联谊会还进行了颁奖、演出、抽奖等环节，年过八旬的顾金岳学长为联谊会献祝酒词将气氛推向了高潮。（南京校友会）

安徽校友会举办新春联谊活动

1月27日，安徽校友会新春联谊活动在舞狮表演中正式拉开帷幕，300余名校友及嘉宾参加活动。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唐风华回顾了2023年校友会的工作情况，希望校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校友会工作再上新台阶。联谊会上，校友们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节目，有四人合唱《我还年轻》，

有经典诗篇朗诵《沁园春·雪》，还有励志歌曲《飞得更高》，激昂的演唱激起了每位参会校友“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斗志。“清二代”们的表演也毫不逊色，曲艺《说唱脸谱》、小贯口《热闹长安城》、扬琴演奏《爱我中华》等精彩节目让现场掌声连连。活动现场还有清华附中合肥学校朱梦莉老师带来的女声独唱《灯火里的中国》及趣味游戏、抽奖等环节。（安徽校友会）

贵州校友会举行慰问老校友新春团拜会

1月27日，贵州校友会在贵阳市举办新春团拜会。当天上午，29位校友志愿者分成6组，携带贵州校友会及部分校友捐赠的慰问礼品，分头看望慰问80岁以上老学长，为老学长们提前送上新春祝福。下午，贵州校友会2024新年团拜会开始。校友会会长杨军在致辞中表示，校友会始终积极作为，不断提升服务校友的水平；希望广大在黔校友把本职工作做好做优，继续为建设多彩贵州注入清华人的力量。随后，校友们及“清二代”在团拜会上表演了精彩纷呈的节目，相声表演、吉他弹唱、合唱等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几轮抽奖活动更是让现场气氛热烈。当晚还进行了团拜晚宴。最后，在《难忘今宵》和《我在贵州等您》的歌声中，团拜会圆满结束。（贵州校友会）

阿联酋校友包饺子迎新春佳节

2月3日，癸卯年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阿联酋当地30名清华校友及亲友共计52人齐聚迪拜公主塔97层会所包饺子庆祝新年。大家准备了六种美味馅儿料和面团，一起擀皮儿、包饺子。聚会现场还有新春主题的儿童手工娱乐区以及供校

□ 校友联络

友们娱乐交流的攒蛋区，更有校友现场烘焙的蛋卷、自制冰粉等美味加持。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号召以及中东国家数字经济转型的需求，两年以来，在阿联酋工作和学习的清华校友从2022年初的6人迅速增加到了目前的54人，年级跨度近40年。虽然阿联酋校友会还在筹备中，但是当地清华校友的联络群就是校友们在海外的大家庭。阿联酋校友联络群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已经在迪拜、阿布扎比、阿来茵、Liwa沙漠等地陆续组织了5次大规模的校友聚会以及20余次小规模校友聚会。（黄静静）

平顶山校友会举行2024新春座谈会

2月13日，平顶山校友会新春座谈会在平顶山市润泽园召开。平顶山校友会会长陈红领在致辞中表示，平顶山校友会始终和校友总会保持高度一致，以“高质量发展”引领高质量校友工作。平顶山市副市长丁少革介绍了过去一年里平顶山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期待当地清华校友为共同建设更好的平顶山市贡献力量。校友代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科技创新管理部总监范新川和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学先后围绕各自工作经历作了分享。2024届工物系应届毕业生王泊覃、2022届五道口金融学院校友马腾、2019届材料学院校友魏要伟等参会校友先后发言，表达了要为家乡建设贡献自身力量的决心，并对平顶山校友会和平顶山市的发展建言献策。（平顶山校友会）

全英校友会举办首届“全球时事与人工智能”研讨会

2月16日，由全英校友会和苏世

民书院主办的“首届全球时事与人工智能”圆桌研讨会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成功举办，吸引了100余人参会。活动在全英校友会副会长高远的致辞中拉开了帷幕。在苏世民学者谢成锴的主持下，特邀嘉宾Chatham House杰出研究员、前所长兼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爵士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对话》的主题演讲。随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戎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副教授Yves Alexandre和马歇尔学者Sihao Huang进行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圆桌讨论，专家们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该环节由UKTA理事、苏世民学者张园主持。苏世民招生办Sarah Fisher作总结致辞，感谢各位专家的莅临分享和参会人员的到来，研讨会圆满结束。（全英校友会）

卡尔加里校友会参与主办《草原之夜》文艺晚会

3月17日，卡尔加里校友会参与主办的《草原之夜》文艺晚会在卡尔加里皇家山大学贝拉音乐厅举行。卡尔加里校友会会长王新华作为主办方代表和总策划致辞。阿尔伯塔省省长Smith送上了贺信和祝福。中国驻卡尔加里总领事赵丽莹等观看了晚会。晚会特别邀请到斯仁道力玛、乌日托雅等六位蒙古族艺术家，与当地150多位演员一起奉献了一场蒙古族歌舞乐的盛宴。晚会的上下半场分别以双钢琴合奏《黄河颂》和中国鼓乐《奔腾凯旋》开场，随后的节目围绕着草原展开，将中国、加拿大与蒙古国的艺术深度融合，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观众席掌声不断，晚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卡尔加里校友会）



童寯：“信步西东”的建筑人生

○刘梦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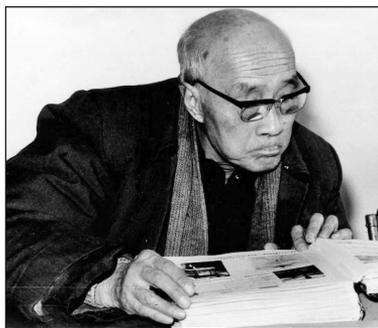
90年前，当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华北大地上实地考察测绘古建筑时，远在上海的童寯（1900—1983，1925级）利用业余时间，独自一人开启了江南园林的踏勘、研究之路。

梁思成两次写信赞叹他的同一部学术著作，童寯也与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楨并称中国“建筑四杰”。

今天，在北京画院举办的“信步西东——纪念童寯逝世四十周年绘画研究展”中，童寯对江南园林的研究，包括当年的测绘图纸、考察中拍下的照片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展览还展示了他在欧洲旅行期间留下的写生画作与日记。一边是江南园林及其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边是世界主义者的开阔眼光。一东一西，构成了童寯的建筑人生。

“江南园林是童寯先生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业，把江南园林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观察与研讨，一直被他视为使命和责任。”此次展览总顾问、童寯之孙、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童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风云飘摇中，它们和北方那些殿堂、庙宇一样，处在缺乏保护、无人问津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童寯超越时代意识到江南园林的珍贵。1932年至1937年，童寯遍访上海、苏州、无锡、常熟、扬州、杭州、南浔、嘉兴、湖州等地的古典园林，并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童寯先生

《江南园林志》。这本书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最早运用科学方法论述造园理论的专著。将近半个世纪后，童寯又在病榻上完成《东南园墅》，从世界造园史的角度研究江南园林。

与此同时，童寯一直致力于近现代建筑发展和各流派建筑理论的研究，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

“精心构思的杰作”

“拜读之余不胜佩服。（一）在上海百忙中，竟有工夫做这种工作；（二）工作如此透澈，有如此多的实测平面图；（三）文献方面竟搜寻许多资料；（四）文笔简洁，有如明人笔法；（五）在字里行间更能看出作者对于园林的爱好，不仅仅是泛泛然观，而是深切的赏鉴。无疑的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这是1937年5月17日，梁思成读完《江南园林志》的手稿后，写给童寯的一封信。信中，他梳理了这部书的价值，也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欣赏与喜爱之情。



童寯夫妇与儿子童诗白在园林中

童寯和梁思成的友谊源于学生时代，他们都曾在清华学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在宾大期间，他们曾住在同一间宿舍。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后启程去欧洲度蜜月，对那里的古建筑进行了实地考察，之后回到中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30年4月，童寯也踏上了相似的旅行路线，从美国回国途中绕道欧洲，探访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古典和现代主义建筑，留下了200余幅写生画作、一本旅行日记及丰富的摄影资料。

1930年8月，童寯回到沈阳，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回到北京后，童寯又接过系主任的重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童寯资助学生南下。他自己也辗转来到上海，和宾大校友赵深、陈植一起组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参与包括大上海大戏院、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内的建筑设计100多项，其中不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的后来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没有放下流亡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他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在家里给他们上课，并呼吁在上海的建筑师们一起为他们补课，终于让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进

入社会。梁思成在给第一班毕业生的信中，表达了对童寯的感激，“我要跟着诸位一同向童先生致谢的”，他还称赞童寯为“国破家亡、弦歌中辍”时的“一线曙光”。

在如此繁忙的建筑事务所工作与教学工作的间隙，童寯踏上了江南园林的考察之路。在当时，这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没有经费资助，没有助手相伴，全部工作都由他独自一人承担。

“这是在非常强大的内驱动力之下进行的。”童明分析，童寯从东北来到上海，被江南园林的魅力深深打动和折服，出于建筑师的本能，他想要去了解这些精巧且丰富的构造。

另一方面，当时那些园林并非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很多园子杂草丛生，甚至一片废墟。“园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时代的变革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这种现状让童寯有了要抓紧时间进行考察的紧迫感。”童明说。

“信步西东”展也在某种程度上解答着童寯致力于江南园林研究的原因。谈起展览一东一西这两部分内容，童明认为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从童寯当时留下来的日记，可以强烈地体会到他对于欧洲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喜好。这种情绪伴随他回到国内，促使他投身到对江南园林这种古典文化的发掘和梳理中。”

“眼中带尺”

在《江南园林志》的序言中，童寯讲述了自己步入日益颓败的园林时，内心的震撼与惋惜：“著者每入名园，低回歔歔，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惟有爱护一

草一椽，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可见他对江南园林的感情投入与挚爱。

童明说，从《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等文字推断，那几年，童寯考察了大约120处园林。在《江南园林志》中，童寯建立了园林研究框架。全书分为“造园”“假山”“沿革”“现况”“杂识”五部分，附有数十张珍贵的测绘图和上百张照片。在开篇，童寯将园（園）字图解为围墙、亭榭、池、石和树，“园之布局，虽变幻无穷，而其最简单的需要，实全含于‘园’字之内”。

他还提出了造园三境界，“第一，疏密得宜；其次，曲折尽致；第三，眼前有景”。有学者认为，这是他对清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精神回应。事实上，他的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深受王国维影响。如今，童寯考察过的许多园林已不复存在，比如上海的半淞园、苏州的靖园等，他留下的测绘图纸和照片因而显得更加珍贵。

童寯长子童诗白曾回忆那段时光：“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为了方便拍照，童寯花200元买了一台徕卡照相机，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支出。

童明介绍，那时的江南，只有少数城市通铁路或公路，很多小的市镇只能乘坐原始的小木船甚至步行前往。来到园林里，童寯便进行踏勘、测绘，因为是一个人，有的地方只能步行估算。但因其深厚的建筑学功底，童寯步行测算出的尺寸和

后来人用皮尺丈量出来的结果相差无几。“一个好的建筑师，他眼中是带尺的。”童明感叹。

“中西融通”

短短几年时间，童寯几乎从零基础起步，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搜集了丰厚的史料，完成了《江南园林志》。这源于他在古典文学、建筑以及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

童寯1900年生于沈阳。父亲制定的课程，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童寯的园林考察，一开始就是非常专业的调研，这得益于他在宾大所受到的专业训练。

童寯自幼学习油画，在清华时就曾举办过艺术展，在宾大期间，他主攻水彩画，曾得到美国著名水彩画家道森的指导。好友陈植曾在回忆童寯的文章中，特意提到童寯的绘画才能，称赞他有“照相机般的眼睛”。

对于江南园林研究，童明认为不能忽视童寯的世界主义者的视角。“童寯是一位中西融通的学者，他所秉持的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立场，然后再切入到江南园林的研究中。也正是在这种广袤的视野下，江南园林的独特性才能真正展现出来。”

事实上，童寯最开始关于江南园林的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发表在上海的《天下月刊》上，其目的在于向世界介绍这些文化瑰宝，也为了进一步明确东方园林的根源在中国而非日本。

“学术生命的一次爆发”

完成于1936年的《江南园林志》，到真正出版时已经过去近30年了。

1936年，刘敦桢来到上海，与童寯

□ 人物剪影

初次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童寯后来曾回忆：“那时，据我所知，对园林感兴趣而做点实际工作的，只有我们两人。”之后，刘敦桢将童寯的《江南园林志》初稿带回北京，计划由营造学社刊发。不料卢沟桥事变爆发，书的出版中断。相关手稿、照片和测绘图纸，被存放于天津英国麦加利银行的保险柜里，在后来的洪灾中，它们跟营造学社的资料一起，遭遇被水泡坏的命运。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各地整修园林，苦于文献残缺，缺乏证物，这本书的出版才又提上日程。花甲之年的童寯，重新描绘了自己当年步测的园林。1963年，《江南园林志》终于问世。

收到朋友的著作，时隔27年，梁思成再次写信称赞：“这书之可贵，就在这些图都是你亲笔画的，而且其中许多今天或已被破毁，或改走了样，许多照片也是难得的史料了……当年虽曾匆匆拜读，但因没有切身体验，领会不深。解放后，虽然已经到过苏、锡、扬两三次，每次也仅仅‘走马’，毕竟算是亲眼看过，有了一点感性认识，所以重读就比较懂些，深佩精辟之见，但以我这样对园林一无所知的人，尚有待进一步精读细读，才能尽其中奥妙也。”

说起童寯的一生，童明有一种遗憾：“我觉得在他的一生中，真正拥有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不断经历时代的风波，很长时间里都没什么机会实现学术成果的发表。”因而，1977年到1983年，被童明称为是童寯“学术生命的一次爆发”。在生命的最后5年里，童寯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完成了包括《东南园墅》《造园史纲》《新建筑与

流派》《近百年西方建筑史》在内的多部著作。“这都是他后半生所积淀下来的东西。”童明说。

1982年，童寯被查出膀胱癌。但他一直在埋头写作，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过。童明那时上初中，负责照料爷爷的生活起居。童明还记得童寯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写作“江南园林”词条的情景，“真是咬文嚼字，反反复复修改了很多遍”。

童寯晚年的时候沉默居多。童明当时不是特别能理解，到今天，他自己也已成为建筑师和建筑学家，再回想当年，“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使命中去了，要在离开前把手头的研究工作完成”。童寯重病住院及转诊北京期间，都带上了《东南园墅》的书稿加以订正。1983年3月，他在病榻上口述了此书的结尾部分，两周后去世。

不同于《江南园林志》，《东南园墅》是把江南园林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观察和研讨的，全书用英文书写，其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艺术。

曾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王澍，对江南园林的态度，从原来觉得老套重复且已经在失去意义，到重新生发热情与兴趣，真正的转折就是1997年读到《东南园墅》。他将《东南园墅》反复读了六遍，之后又把《江南园林志》拿出来重读，他被“情趣”二字击中。“建筑师的道路总是困苦艰难，什么能支撑你一直有感觉地做下去？是什么理论吗？重大价值吗？方法吗？我体会都不是，情趣，童寯先生说出的这两个字，轻轻飘飘，但最能持久，因为它活色生香，是不断生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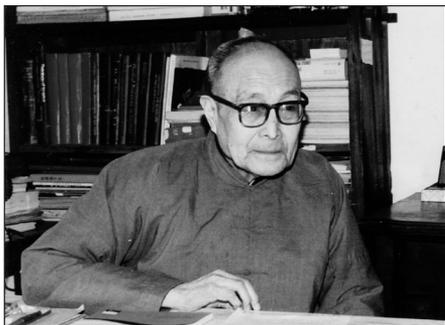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1月26日）

读懂父亲袁复礼的一生

○袁 方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家父袁复礼（1893—1987，1915级）已驾鹤西去36年，2023年12月31日是他130周年诞辰日。为此我们姐弟商定写一篇怀念文章。此文由我执笔，两位姐姐修改而成。

我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勤奋工作、平易近人的教师，在家言语不多，从不宣扬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我们知之甚少。直至“文革”结束后，通过1982年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60周年和1983年地学界为袁复礼90寿辰举行庆祝会的盛况，尤其是中国地质大学1993年出版的《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一书，读了几代同事和学生的纪念文章，从他们的切身感受中，我们才知道父亲的具体教学工作、学术成就和团结协作、开拓进取的精神，我们深受感动，也才知道为什么每年元旦和春节，有那么多批老学生来家问候。



袁复礼先生

把它捐给地质博物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又把该图的缩微图截成11幅，放大图载于《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一书前方，并以该书参加了2007年中瑞两国合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八十周年纪念展”之学术研讨会。那次展览，瑞方展出了版型统一的56册考察报告、13册游记和一卷珍贵的纪实电影。

父亲对地形图非常重视，认为它是表现地学成果的载体，也是一切科学工作和国防的基础。早年考察时，他亲手测绘各种地形图，诸如：仰韶村遗址地形图（1:4000），1:1万至1:5万的详查地形图、路线图、地质剖面图，而缩绘的1:50万至1:100万的小比例尺图则能提供全貌或方便随文刊载。西北考察团期间，他作为代理团长多方搜集有关的地图资料，返北平后的1933至1936年间编撰了“新疆1:50万山形水系图”16幅（北疆9幅，南疆7幅），亦由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法清绘，准备提供给中方团员及后来人当

2000年前后，我们姐弟陆续退休，无暇对尘封了三四十年父亲的“新疆工作室”散存资料进行清理，在一个书柜中我们找到一张两米多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旅行路线总图》，1:200万比例尺，推测是父亲1934年编成，由绘图员李士杰、汪纯明以晕滃线法清绘的。图上标出了考察队大队及中方七名团员考察路线和矿产、化石、考古地点等，是一份从未见过的珍贵的总结性图件，于是我们决定

□ 人物剪影

作底图使用，可惜面临日寇侵华危机无法印刷，直到1944年在昆明时，才托人在美国印制了300份。这图在解放后发挥了作用，一部分于1949年送解放军总参谋部供进军新疆使用，1951年又把该图50套送交中科院副院长陶孟和（由于195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结束工作，明确科考研究交中科院接收）。出于对地形图的重视，1932至1937年父亲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期间，还亲自讲授过“地形测量学”“地球投影”“地质制图学”“地形地貌学”等课程。另外，1950年父亲把侵华日军遗弃的朝鲜中部地形图一套（1946年在北平卖花生的小地摊上购得）献给总参谋部供志愿军使用；1951年签署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后，政府组织进藏地质工作队，父亲把赫定修订过的1:20万全套西藏地形图送给队长李璞，还把珍藏的1:100万美军航空测量地形图和刚收到不久的Norin（那林）著《西藏西部一喀喇昆仑地质志》借给加入工作队的助教朱上庆使用，这是当时唯一的图件资料。可见父亲对地形图的重视，以及盼望祖国强大的迫切心愿。

二

早年听母亲埋怨，父亲在编新疆地形图上花费精力过多，影响了自己的考察成果整理和发表。其实，父亲在随时代变迁而工作变动后，总是先投身新任务，再抽空整理研究西北考察资料。抗日南迁中丢失了他精选的十几箱标本（包括磨好的岩石薄片400片），致使研究中断八年。幸好近百箱采集品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沈兼士教授辗转藏于辅仁大学地下室才得以保存，抗战胜利回北平后，父亲在清华大学重新开始了整理研究。由于1950年

“协会”结束工作，明确西北科考之研究交中国科学院接收；应父亲要求，考古所派杨圣泉、杨秋涛两位先生前来协助对各类标本清理造册、誊写及绘图等工作，并把植物化石、动物化石、考古采集品连同其产地、产状、附图等说明资料，一并分类装箱，分别送往中科院下属的各研究所提供研究，只留下少数充实校内博物馆和实验室陈列。又因1952年院系大调整，迁至北京地质学院后，学院为父亲保留了一间“新疆工作室”，故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多次分批移交完成，两位杨先生离去，唯独岩石标本全部留下继续研究。

父亲在1948至1956年期间，发表过五篇对北疆，一篇对绥远的地质、地层、构造、地质运动等方面的总结性文章。

《新疆准噶尔东部火山岩》一文迟至1983年才发表，其经过细节我们直到最近才读懂。这得益于近年来新疆师范大学征集了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家属捐赠的先人著作、野外记录簿、图件、照片等大量原始资料进行研究，这两年我们也与北大朱玉麒教授在网上参与了对父亲的部分资料解读。究一斑而窥全豹，仅从涉及新疆岩石标本采集编号的“野簿第七册”



（一九三〇年）袁复礼在新疆阜康烧房沟

(1929年, 160页), 和两大袋不完整的初稿(袋面标有[火山岩分带研究]、妥善保存、1963等字样, 共86页), 便可见数百块岩浆岩标本及薄片的编号、产状、肉眼描述、薄片鉴定、岩石定名等详简不同的记述, 以及13块标本 SiO_2 、 Al_2O_3 、 Fe_2O_3 、 FeO 、 MgO 、 CaO 、 Na_2O 、 K_2O 、 H_2O^+ 、 H_2O^- 、 TiO_2 、 P_2O_5 、 MnO 的含量化学全分析表, 18块标本的 SiO_2 、 TiO_2 含量对比, 23块标本的 Al_2O_3 含量对比等半分析结果, 7块标本经光谱半定量分析对元素Cr、Cu、Mn、Zn、Pb、Si、Y、Yb含量结果。其中提到: 薄片已初步鉴定约70片, 待鉴定50片, 又补送数十块去化学分析及磨制薄片。

令人想不到的是, 早在1929年的野簿中, 他就由外文书籍抄录了7页(55种)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 1963年初稿袋中又抄录了15页(125种)外文岩浆岩的化学全分析成分表, 作为对岩浆岩定名及进行成因分析的参考。这些残稿中已对该区岩浆岩分带做出初步判断。在“文革”中断十几年、1978年复职后, 又得到岩石教研室刘金钊、杨慕华老师重新对补磨的薄片做出镜下鉴定, 曾仲泽、杨博光老师完成了岩石成分的化学分析, 父亲才对初稿做修改补充, 于1983年发表在《地球科学》杂志上。由此可见父亲对写论文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做到了他对学生的嘱咐: “论文量不在多, 但对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和范围, 必须有所发现, 并有明确见解, 使后人从事同一范围的研究时, 必须加以引用。”

同样, 其他几篇先发表的总结文章, 也得到精通某类古生物的同事协作, 对各种动植物化石研究、定名和确定年代, 还

参考外国学者的资料, 最后才建立了天山以北的两组地层标准剖面, 探讨了该区的地壳运动史。尽力打下良好基础, 不致误导后人, 这是他的愿望。

三

1938年母亲携我们姐弟六人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与父亲汇合, 又因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 昆明告急, 西南联大将大学一年级迁往四川叙永, 全家随父亲坐货运卡车, 又乘江轮至泸州转小木船到叙永。1941年战况好转, 返回昆明。几度搬迁, 颠沛流离, 1942年才由昆明郊外回城内定居, 我们姐弟四人正式进入联大附小读书, 直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解散。那时年幼, 只知道父亲忙于教学, 大部分时间是带领学生野外实习和进行矿产调查, 一出去就几个月或半年以上, 还记得他讲过在野外考察中有意显示腰间佩戴地质罗盘和气压计的皮盒, 并声称是手枪和子弹, 以震慑土匪的暗探。有时他从野外回来, 会带几件岩、矿石标本, 有手指大小的透明水晶晶体、易掰成表面平滑光亮菱面体的方解石晶体, 有时是含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闪亮晶体的矿石, 还有可以剥成薄片的大片云母, 都使我们爱不释手。也许就是这些无声的熏陶, 我们姐弟四人偏爱理工, 有三人在1952年后陆续考大学时, 响应国家号召, 报考了地质学院。

父亲一生博览群书, 始终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 亲自张罗订购图书、杂志, 充实馆藏。他常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内部影印书店为学院选购新书, 自己也购买了不少。1978年后行动不便, 改为圈注每期国内外新书预告, 提供给图书馆参考。因此他能了解地球科学前沿动

□ 人物剪影

向，引导后辈跟上步伐，晚年还在助手的帮助下指导研究生。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掌握了很多地质资料，非常博学，人称“活字典”，很多人有问题都愿意找他，他也能给予让人满意的回答。

父亲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国家的需要，随时投入到建设需要的艰苦的资源调查和研究中。抗战期间的1938年1月，应资源委员会要求，在湖南平江、桃源、常德、沅陵一带考察金矿，写成《湘东湘西金矿视察报告》。1938年8月，资源委员会再次请他考察西康（现四川）的金矿，调查了盐边、盐源、木里、盐东、冕宁、会理、德昌、米易一带，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整年，直到1939年8月他才回到昆明，之后写成三篇有关金矿的考察

报告。1942年他又协助系主任孙云铸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矿产地质调查工作，服务社会，支援抗战。解放后，父亲更加踊跃地投身新中国建设，向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提供建议，参加多种地质学科专业会议，并参与刘家峡、三门峡、三峡水库的工程地质考察等项目。

纵观父亲一生，为使饱受列强侵略的祖国能屹立于民族之林，他献身地质事业和教育事业60余载，勤奋严谨、以苦为乐，与同事们团结协作，尽力为后辈提供良好基础。六十寒暑，时代变迁，他看到祖国面貌日新、逐渐强大而欣慰驾鹤西去，堪称含笑期待后来人！

（摘编自《文汇报》，2023年12月24日）

“气候特使”解振华 谈判桌上16年

○霍思伊

2023年底，在阿联酋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是解振华（1973级工物）感到“最困难的”一届。2023年12月9日举行的中国代表团新闻会上，这位75岁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说：“有200多个问题要解决，我们要做减法，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有些国家坚决反对淘汰或减少化石能源，有的国家则非常坚决要淘汰化石能源，还有一些国家提出一些折中的方案。现在到底是什么方案，怎么去解决？”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坦率，不照本宣科，也不用外交辞令，人们已经十分熟悉他一口天津普通话、语速不快却掷地有声的发言。十几年来，他的形象似乎没有变

化过：笑起来显得宽厚、亲和，但当他严肃起来，没有人能忽视他。

2023年，是这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坐上谈判桌的第16年。2007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解振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首次亮相。他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的所有戏剧性现场，走过了中美气候合作的波峰与波谷。

“没有人会怀疑他在真诚地投入”

解振华又熬夜了。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2日晚9点，COP28大会主席国无奈地宣布，原本计划在下午结束的谈判，将持续到13日凌晨3点。早上7点，大会发布了最终决议

案文。

最终达成的《阿联酋共识》中，对分歧严重的化石燃料问题，采用了“转型脱化”的描述，即“在能源系统中转型摆脱化石燃料”，而非此前争吵最多的“减少还是淘汰”。这个最新表述，与会前中美发布的《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以下简称《阳光之乡声明》）中的立场一致。

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透露，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正是中美“一起当面做大会主席工作，主动提出案文措辞”。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起到了关键作用。

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解振华的时间“是按分钟来排的”。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大地（1970届工物；1982届硕，建筑）对记者形容。他说，大会期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团体代表、各种国际组织“一天到晚都要

找解”，他的休息只能见缝插针，“找个房间眯一会”，有时要熬通宵到凌晨四五点。“我们都劝他要注意休息，他的腰和腿不太好，但一投入到谈判工作，就完全忘了这些。”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1979级环境）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少有人可以像解振华这样同时获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关键阶段，他可以使事情顺利解决。”这是来自一位老对手兼老朋友托德·斯特恩的评价。2009年至2016年担任美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的斯特恩对解十分熟悉，两人共同经历了全球气候谈判历史中最重要的几次大会：从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和巴黎。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振华是“发展优先权”的坚定捍卫者。邹骥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2000年至2015年深度参与气候谈判。到现在，他还记得解振华在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最后时刻对发达国家的抗议：“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要消除贫困，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

他的语速明显加快，声音上扬，右手频繁摆动。话毕，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段话后来被中外媒



2023年12月2日，阿联酋迪拜，COP28主席苏尔坦·贾比尔（右3）、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左3）、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右2）等在COP28期间出席能源会议

□ 人物剪影

体反复引用，作为当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激烈矛盾的历史注脚。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此后几年的谈判焦点都在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只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因为它们是历史排放大国，但后来，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开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

面对这种要求，当时解振华明确回应，要求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承担更多减排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自主采取的减排行动没有什么谈判余地。”发达国家还将减排和援助问题绑定到一起，提出“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是获得资金和技术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有了德班的一幕。

邹骥认为，解振华的谈判风格并不是对抗性的。遇到分歧时，他首先想要“解决问题”。他会要求双方各自亮出自己的红线，“什么是不能碰的、是中方绝不会让步的，什么又是可以商量的”。在维护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上，他坚持原则，姿态强硬，绝不含糊。同时，他清楚意识到，气候危机是全人类的危机，谈判是“要寻找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阿联酋共识》中的“转型脱化”路径，是他参与推动的最近一个“最大公约数”。苏伟表示，“转型脱化”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减少排放，二是能源替代。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先立后破”原则，不像“逐步淘汰”那么极端。用解振华的话说：



2017年，解振华学长（右）将其所获“吕志和奖——持续发展奖”20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赠清华。图为时任校长邱勇为他颁发捐赠纪念牌

“这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解振华的气候谈判生涯中，上一个让他兴奋的“最大公约数”来自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归来，他立即召开媒体会称，《巴黎协定》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既提出还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允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能力和发展阶段来自主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是“一刀切”。

多位和解振华一起参与气候谈判的受访者说，除了坚持原则和灵活包容，真诚才是解振华谈判时真正的“秘籍”。他讲真话，从不回避问题，言而有信。他极有耐心，谈判陷入僵局时，会主动倾听各方的声音，做“穿针引线”工作。

在COP28召开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气候特使：谁能为之？》，文中回顾了解振华和美国几任特使的交往过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一位高级气候谈判代表这样描述解振华：“他会用拳头敲击桌子，然后给你个拥抱。但这么做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没有人会怀疑他在真诚地投入。”

解振华很擅长“交朋友”，他和很多谈判对手都发展出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和斯特恩互相访问对方的家乡，一起观看了芝加哥小熊队的比赛，品尝了美式热狗。

“我们很友好，互相间开了很多玩笑，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colorful）的人。”斯特恩说。

谈判桌下，他还带着欧盟气候委员康妮·赫泽高到江苏基层，看中国的低碳城市怎么建设。斯特恩卸任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后，每次来中国，解振华多忙都要见他一面。中美在2021年恢复气候谈判后，有次他对克里说：“我还记得，你当时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这让我很感动，我们都在为下一代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是中国气候谈判的重要“智囊”，他说，解振华之所以能团结各方，正是因为他谈判时不只关注彼此不同的国家立场，而是将对方视为活生生的人，他在试图去理解每一个人。

“将国际国内结合得非常好”

解振华是典型的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

1949年10月，他在天津出生。进入1970年代时，他刚好20岁，以天津知青身份，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下乡，在那个由40多名知青组成的集体中，解振华算是年龄较大的一位。

在冬天可达零下二三十度的东北山林中，他们的任务是在小兴安岭腹地建立起后方基地，一旦发生意外，可以让山外的人转移进来。那时，解振华每天做的事就是炸山挖洞、扛大木头，天气太冷，馒头冻成了“铁块”，要用斧子砍着吃。

解振华腰上的老毛病，就是做知青时一次卸货，不小心受伤落下的。多位受访者都说，解振华不仅眼看世界，更难得的是他还非常体察中国国情，这与他的这段插队岁月有很深的关系。

解振华后来被国际社会广为赞誉的一点，是不仅推动全球在气候问题上走向共识，而且能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转化为国内气候政策的驱动力，反过来，中国自身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也成为他国际谈判的基础和底气。“解振华把国际国内结合得非常好，既考虑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现实需要，也考虑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形象。”苏伟说。

结束知青生涯后，解振华在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从事科研工作并任助教。1980年代，他进入国家环保局，此后历任人事司司长、副局长、局长。1993年6月，他接任局长时只有43岁，此后在这个位子上干就是十多年。2006年末，解振华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分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领域，正是在发改委期间，他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参与国际谈判，并参与制定国内低碳转型政策。

邹骥在六年后成为了解振华的直接下属。在解的牵头下，2012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成立，邹骥是中心的副主任。他介绍，这是一个国家级智库，他到任后从“老解”那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不同国家历史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GDP的关系，结果显示，所有经济体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都随着人均GDP“先增后减”，呈一条倒U型曲线，曲线的拐点，就是现在所谓的“达峰”。

□ 人物剪影

“我们发现，中国其实可以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通过能源转型等方法，以较低的人均GDP水平达到较低的排放峰值。”邹骥说。这项研究为中国后来提交“国家自主贡献”奠定了部分科学基础。

“碳达峰”一词，也首次出现在2014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当时成立这个中心是有明确指向的，首先是为《巴黎协定》做研究上的准备。此外，解振华让我们最先去研究这个是有深意的，他已经敏锐意识到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可能仍面临着未来要达峰的承诺，所以要去研究这一点。而且，他也前瞻性地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国内而言不仅是挑战，还是机遇，能源转型背后有新的投资需求、技术创新，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走在前面。”邹骥说。

后来，解振华解释，为何是“2030年左右”，而不是“2030年之前”？一方面，因为2014年到2030年间还有16年，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其间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并不科学；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中国确定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促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讲一个道理让各方都能接受”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带着一众美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在没有提前约好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了“基础四国（中国和南非、印

度、巴西，英文简称BASIC）”领导人正召开闭门会议的房间内，要求中国作出更有力的减排承诺。

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改委副主任的解振华当时也在现场。斯特恩当时就坐在他的对面，他后来回忆，长达一个小时的讨论中，当美方质疑，中方一些提法“还不够好”时，解激动地脱口而出：“你说还不够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还不够好？”

这次大会最后只形成了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有评论认为“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一些西方媒体将失败归咎于中国在会上说“不”。但事实上，大会召开前，中国就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解振华说，这一目标已经体现了中方“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外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经济增速经历了高速增长，2010年，GDP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很担忧中国的排放成了脱了缰的野马。”邹骥说。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解振华立即召集了主要谈判代表和专家开会，复盘哥本哈根谈判，讨论下一步中国如何减排。天津会议在这一背景下落地，于2010年10月召开。这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正式谈判会议，约3000人到场。在邹骥看来，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始真正以崭新姿态出现在国际气候谈判舞台上，更强调自己要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中国代表团

在COP大会上发言都很少，这次却主动出击”。

《巴黎协定》顺利达成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和气候专家王韬等人撰文指出，这见证了中国“在这个最重要的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成为领导者的华丽转身。据生态环境部统计，中国已提前超额完成了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2022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超过51%。同时，中国在能源转型上也体现出更积极的姿态：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宣布了中国的“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左右达峰”上更进一步。

周大地指出，推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解振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对气候政策何时调整，他要求有足够扎实的科学证据，他善于把各方专家的力量整合起来做研究；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他能及时、充分和有效地把这些“科学的声音”传导给领导层，并最终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杜祥琬说，在政策的推动过程中，由于各方分歧很大，解振华不仅要广泛听取科学界的意见，还要在不同部委间协调，因为气候变化涉及到能源、环境等方面，最终“讲出一个道理让各方都能接受”。

邹骥认为，解振华在推动国际国内气候政策转变的过程中，之所以很有说服力，是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强，自身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问题研究很透彻。“‘老解’不说英语，却成为国际气候谈判圈如此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奇迹。原因是什么？有次国际能源署署

长法蒂·比罗尔对我说，他和解振华之间的交流，靠的是数据和专业知识，科学，这才是大家之间的共同语言。所以在‘老解’那里，能源转型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笔笔账他在心里算得很清楚。”

“他们能够认真倾听对方”

2023年11月4日到7日，73岁的解振华与79岁的克里，在美国西海岸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这里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阳光之乡”。解振华和克里谈到深夜、谈到“加时赛”，但也抽空在加州的阳光下一起扔飞盘，散步聊天。

最终，双方团队达成《阳光之乡声明》。这是中美2021年重启气候变化谈判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也是随后举行的COP28大会期间最为世界瞩目的文件之一。自从《巴黎协定》达成后，中美之间能否达成“联合声明”，几乎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风向标。

2010年10月，斯特恩受邀来到解振华的老家天津。美国气候特使乘坐了中国高铁，在天津的工厂里实地了解了中国在提高能效方面的工作，他还去解振华家中和他的妻子、儿子共进晚餐。在“交朋友”的基础上，解振华和斯特恩代表中美两国进行了初步接触，形成了两条“默认的”工作原则：第一，不再互相公开指责；第二，谈判前，先把各自的“红线”划清楚，在此之上寻找共同点。“中美此后的双边谈判，大体遵循了这样的工作原则。”邹骥评价道。

2014年春节刚过，斯特恩来到北京和解振华会谈，希望和中方发布一些“共同的东西”。邹骥是专家二轨谈判的中方协

□ 人物剪影

调人。他回忆，那时发改委视频会议室不够用，还得去借其他部委的会议室，就这样开了无数夜会，每次对话完都要连夜写成纪要，第二天一早就报给解振华。老解更忙。中美谈判的同时，中欧之间、“基础四国”之间也都在对话，都需要他解决一个个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当邹骥因谈判满世界跑，“飞出了一张终身白金卡”时，他也习惯了在路上随时接到“老解”的电话，并以最简洁的方式汇报进展。“那时候打国际长途挺贵的。”邹骥说。邹骥形容，在联合声明发布前复杂而艰难的谈判中，解振华的角色“是一个前线的指挥”。他指挥着一个庞大的队伍，从谈判团队到专家、智库，要搞清楚各方的诉求，包括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到哪个阶段了，未来还要炼多少钢、搞多少水泥，能耗的前景是什么。

201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会谈，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后来说，这是25年来美国和中国“就任何事情所能发表的最大联合声明”。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我终于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时刻……在北京，有一种真正的可能性。”

联合声明立刻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在《巴黎协定》通过一年后，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特朗普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2017年至2020年，中美在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对话合作也陷入停滞。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决定重返《巴黎协定》。2020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被重新任命为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三个月后，解振

华成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而这之前解振华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担任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和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原主任贾峰分析，解振华退休后被委以重任再度出山，彰显中央对气候谈判的重视和对解振华的充分信任。

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时期，解振华和克里一直保持着接触。同时和两位特使交往多年的苏伟指出，解振华和克里在气候谈判的国际舞台上已交往了二十多年。两人都是善于沟通的老手，虽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立场，但他们能够认真倾听对方，然后向另一方坦诚表达己方立场。

杜祥琬说，解振华和克里都有一种深切的责任心，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尽管有很多分歧矛盾，但气候变化是中美之间为数不多能抓住的“结合点”之一，要坚持住这个方向，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给《阳光之乡声明》的落实以及中美气候合作的未来前景，再度带来不确定性。邹骥说：“‘老解’对此看得很清楚，第一步先要谈成一个东西，第二步再去落实，这期间需要克服各种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都要向前走。”

在刚结束的COP28上，有外媒谈到了解振华和克里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对未来的中美气候合作以及中美关系表达了担忧。解振华回应说：“他（克里）今年已经80岁，我今年75岁了，我们不会离开这个领域，我们还会尽我们的努力来推动这个领域的进程。”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回忆在校团委工作的那几年

○贺美英（1961届电机）

1963年暑假前后，我从电机系分团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校团委工作。同时上调的还有单德启、承宪康、崔鸿超、贾春旺、陈清泰等10人。上调原因是由于当年一些在团委工作较长时间的干部被充实到了机关各部处，需要给团委增加新鲜血液。从那时到“文革”爆发不到3年，但这却是我进入清华后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工作上得到很大锻炼的一段时间。随着对学校情况了解的增多，包括“文革”中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内幕”，特别是后来通过学习、反思学校的历史，从今天的高度回过头去看几十年前走过的路，我明白了当年在蒋南翔校长领导下，清华大学党委加强团委干部队伍是出自重要的战略思考，要使学生工作和思想教育走上正轨，纠正以往各次运动和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用深入细致有针对性的工作方式代替轰轰烈烈搞运动的方式，把共青团组织建设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坚持实事求是，划清是非界限

1964年，在校党委领导下，刘冰、艾知生同志带领张慕萍、方惠坚、谭浩强等团委主要干部，在1961年拟定的《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一些问题的界限》（修改稿草案）。从这个文件的名称看，已经超出了清华大学的范围，很有可能反映了蒋南翔同志的一些工作思路，是蒋南翔同志



贺美英教授

和清华大学党委纠正“左”的错误、扭转“左”的偏向的一次顽强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左”的路线对我国高等院校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整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是“左”的路线的直接后果，而“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校教育革命和从1957年末开始的“红专辩论”，也受到了“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些运动中“左”的错误和偏向，对清华大学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既有自上而下的“左”的路线强势的因素，也有学校领导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即便如此，对有些“左”的错误和偏向，党委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和纠正。

根据何东昌夫人李卓宝老师的回忆，反右期间，蒋南翔和何东昌都认为不必要在青年学生中划右派，蒋南翔向中央有关领导人提出了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部分“极右”学生被送出学校劳动改造前，蒋南翔曾召集他们开座谈会，坦承原来以为只是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没想到

□ 回忆录

还有这样的组织处理。并说“下去结合自己的专业好好劳动锻炼，过段时间再把你们接回学校完成学业”。当年团委承宪康参加了会议。我校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李山说，他的舅舅彭伟君1953年考入清华动力机械系，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文革”一开始被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劳改，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到组织上为他彻底平反。改革开放后由于对工厂发展有突出贡献，晋升为高工并被评为劳动模范。彭伟君虽然受到过错误对待，但仍对学校充满感情，他曾向李山讲过蒋南翔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记得这个会是在1958年3月召开的。另外，大约在1961年有部分右派学生摘掉了帽子。蒋南翔校长召集他们开座谈会，方惠坚参加了座谈还做过记录。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蒋南翔用“望子成龙”表达了对这些学生的殷切期望，而这成了“文革”中批判他的“罪状”之一。

在教育革命中有的同学激情之下说了一些过头话，蒋南翔校长总是会进行纠正。他在听取各系汇报时听说有的班上的同学要批判“麦克斯韦方程”，立即指出



20世纪50年代末，团委干部在明斋团委办公室前合影

这是不对的，科学规律是不能随便批评、打破的。“红专”辩论中有个同学说我就想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被指为“白专”。蒋南翔知道后表态说这不是什么“白专道路”，如果清华出了爱因斯坦，那是我们学校的光荣。

据刘冰同志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蒋南翔多次提醒要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从1960年10月开始，清华党委就要求学校团组织多次在干部中进行政策教育。到1961年2月，刘冰指导校团委拟定了《班级团支部工作任务要点》《班级团支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要点》和《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三个文件的初稿，分别在分团委干部训练班和团支部书记训练班讨论之后，修改定稿印发各党支部和学生团支部讨论执行，并上报到北京市委大学科学部。

这三个文件尤其是《班级团支部工作中一些问题的界限》，政策性很强，规定十分细致、明确，总共50条，基本涵盖了班级共青团工作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中涉及的许多原则问题，在党的工作中也是完全适用的。根据刘冰同志的回忆，当年《红旗》杂志将这个文件选登在《内参》上。一次他和蒋南翔参加中宣部例会，康生在会前质问蒋南翔：“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吗？”会后，蒋南翔对刘冰说，我们这个文件是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是好的，合法的。这个文件后来对

高校工作“60条”中关于学生思想工作的内容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这说明，清华大学党委从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反思以往运动中“左”的错误和偏向，开始着手纠正并消除它所造成的影响。

1961年6月30日蒋南翔校长在清华大学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学校工作中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他指出，我们有些做法使我们得到了成绩，同时由于掌握得不够好，或者过了头，就走到反面，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又红又专是完全正确的，但掌握不好界限就会发展到红而不专、红而反专、以红代专的错误，如把科学上的定理当成资产阶级的旧垃圾。如在学校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是对的，但对“一条龙”“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如果宣传过了头，离开了其本来的意义，就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抹杀个人的积极性。如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话说过了头，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普通劳动者，那还有什么必要办大学？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斗争是需要的，但把这种斗争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就混淆了政治问题和科学问题的界限，违反了党的“双百方针”。蒋南翔还特别提到了所谓“新富农”问题，这原本是指有的贫雇农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发展起来，就不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被称为“新富农”。蒋南翔以此来比喻一些年轻教师被培养起来后，不愿意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后来他了解到，这一比喻被当成了衡量教师的一把尺子，并出现了“新富农路线”的说法。他意识到对业务好的教师扣上“新富农”“白专道路”的帽子是扩

大化、简单化，是完全错误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蒋南翔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对被扣了这些帽子的同志全部一风吹，行脱帽典礼。他指出，对有些思想问题要进行帮助，但决不能扣这样的帽子。这里蒋南翔校长所强调的，就是要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真理、正确的东西，一旦过了头、超出了自己的界限，就变成了谬误。

可见，从1961年拟定团支部工作的“50条”界限，到1964年在“50条”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出新文件，是清华党委对纠正“左”的错误，清除“左”的影响所做的非常严肃的工作，是通过指导共青团的学生工作来进行的。

转变工作方式， 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工作中划清是非界限，还要转变工作方式。采取搞运动大呼隆的工作方式，就非常容易过头，产生扩大化、简单化的问题。我到团委工作后，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50条”的第一条是要区分政治上的错误观点和思想认识问题，共分了6个小



2019年11月14日，清华共青团委60年再相聚，后排右3为贺美英

□ 回忆录

点，其中绝大部分规定的是工作方式问题。如不能给政治观点错误的同学乱扣帽子、班级不得擅自召开批判会、在帮助的过程中不能用对敌斗争的口号、不能违法乱纪等。那个时期中苏大论战的焦点之一是南斯拉夫问题，当时中方认为南斯拉夫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把铁托称为修正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有一名新生，入学公开说喜欢铁托，要做铁托那样的人。这在当时可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但是根据“50条”的规定，团组织并没有对这个在内部被戏称为“小铁托”的同学进行批判斗争，而是采取与他个别谈心交换思想的方式进行帮助。那时艾知生同志多次与这个同学谈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后，看重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成为一个显著特征。那时，社会上有的高考学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报考保密、涉外专业的自由，有的甚至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在“50条”中，明确要把阶级分析和唯成分论区别开来，并提出了不要把本人的家庭出身当作本人的政治态度、不要把同学与剥削阶级家庭有某些必要的联系当作政治思想上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等具体要求。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搞运动就一定会走到荒谬的地步。事实上，那时清华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相对是比较好的。

我到团委工作后，先是担任学习劳动部的部长，贾春旺是副部长，后为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初步学会了如何开展这样的工作。

那时，经历了几番政治运动和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停止了批判斗争，也没有工作组之类的外来干扰，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学校可以大力地抓业务学习了。我们在学习方面首先是对全校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出了报告。团委要求每个干部都要联系一个班级，我那时还在系里兼任电工基础课的助教，给学生答疑和上习题课。我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答疑，还要去找那些上课时提问少或学习成绩有点问题的学生个别交流，进行辅导。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对我自己的成长提高帮助极大。还记得给同学上习题课时，我常常准备了许多习题，一道一道地讲解，费了很大工夫但效果并不好。后来去听了老教师讲习题课，是和大家一起分析一道题有几种解法，然后比较哪种解法更好。讲的习题不多但给大家的启发很大。在这样深入的工作中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还有就是对一些特殊学生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如学校对一些学习拔尖的学生进行调查，给他们配备导师，加强个别培养。后来“文革”中把校级的拔尖生称为从万人里挑出来的“万字号”，而把系里的尖子生称为“千字号”。蒋南翔校长提出，为了这些拔尖生的全面发展，不仅注意业务上的培养，还要求在暑假给他们安排一些军训、劳动课。业务上的安排由学校教务部门推动各系进行，而军训、劳动就由我们来安排。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文艺、体育社团，这个群体有两个集体，一个是班集体，一个是社团集体。学校为他们安排了专门的宿舍，有的体育社团还特殊安排了食堂，在社团里成立了党团支部，有的同学就在社团里入了党。我们对社团同学的学习情况很注意，帮助

有困难的同学，使他们在两个集体中都得到发展。在学校的关心和团委的工作下，文体社团对于每个成员有很强的凝聚力，很多人在毕业后还保持着联系，甚至到了老年还经常组织聚会，唱歌跳舞。胡锦涛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一直参加他们的活动。

给我印象很深并且一直影响着我来工作的，是学校对女生的关心。由于经济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和活动量过大等原因，一些女生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有的甚至不来例假。学校对此非常重视，成立了女生工作组，由党委委员李卓宝任组长。在后来的工作安排中，特别注意女生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惯。如在七饭厅开设了女生食堂，在不增加投入的前提下，尽量把菜做得精细一点，种类多一点。考虑女生的饭量，馒头和包子有一两个的，不像其他食堂都是二两一个。在劳动、军训的安排中，也考虑到女生的特点。1965年的学生军训，就专门成立了女生大队，由我任大队长，化工系汪昆华任副大队长，在200号进行军训。期间的活动都考虑女生的承受能力，对个别在生理期或身体不适的女生做特别安排。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一提，就是学生中的高干子女。我们党的很多老干部的子女这时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经过高考入学，哈军工、北大、清华都是他们选择较多的学校。那时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全校副部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女有80多人。据说毛主席曾在一个小范围的干部会上讲到了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指出对他们要严格要求，干部子弟要“接班”而不是“接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不能高高在上。蒋南翔校长召集部分高干子女开



2023年5月，五六十年代老团干部在清华园工字厅聚会，右2为贺美英

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且给他们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如要搞好学习，要参加班集体活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等等。根据学校的要求在各系安排辅导员特别关注高干子女的情况，并安排一些教师及时解决他们学习中的困难。后来的调查表明，这部分学生学习上都很努力，成绩大多在中上水平；在班级里表现大都不错，有些入了党，担任了班干部。周末回家都是骑自行车或是乘公共汽车，不让家里的小汽车接送。为了让他们了解社会、了解农村，有一个寒假由我和贾春旺带队，领着大约30个高干子女到清华北边的上庄公社参观，访贫问苦。现在的上庄已经很发达了，坐车去也很快，但那个时候还是显得偏远落后。我们去住在贫下中农家，我带着几个女生住在一个姓李的贫农家。这位户主虽然只有40多岁，但显得比较苍老。几个女生进屋后见了他张口就叫“大爷好”，随行的村干部马上低声纠正，“叫大哥就行了”。大哥土改翻了身，住的房子很大，但屋内几乎一无所有，只在炕边盘了一个地灶。我们住在另一个房间，在生产队集中吃饭。有一次我

□ 回忆录

们在他的屋里看到他正在地灶的锅里用水煮地瓜叶，同学就问他：“大哥，你在煮猪食吗？”弄得人家十分尴尬，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在做饭！我过去也听说过农村生活很苦，但没想到解放后这么久了，在北京城不远的地方，农民的生活还是这么艰苦！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相信这些同学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在党委的关怀下，在团组织中成长

我到团委工作后，“左”的影响基本排除了，工作作风也转变了，直到“文革”爆发前，那是一个对我的成长影响非常大的时期，也是我非常留恋的时期。

蒋南翔校长在团中央工作过，他十分信任共青团的干部，也放手大胆地使用共青团的干部。制定学校共青团工作的“50条”，实际上体现的是清华大学党委的思想，是蒋南翔指示刘冰等同志亲手抓的十分重要的工作，但党委还是放手要团委的年轻干部参与研究、讨论并承担主要的写作任务。

团委的主要干部曾参加在三堡召开的党委常委扩大会，到会的除常委外，还有一些系的分党委书记。那时我们很年轻，对一些书记虽闻其大名却较少有近距离接触。比如李传信同志，我们都听说这个人很厉害，很能尅人。但在会议间歇，传信同志与我们交谈时却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其他的一些书记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与会的同志没有上下级的尊卑，十分民主，讨论问题时经常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但形成决议时又非常一致。亲临现场，耳濡目染，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教育很大。

清华的团委正是在这种榜样的引领

之下，形成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保持统一意志又和谐舒畅的工作氛围。团委的干部之间，既是同志式的关系，又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气氛。在会议上，大家不分职务高低，完全自由讨论，相互间可以插话。形成决议后大家都自觉遵守，统一言行。团委干部之间，没有利益之争没有相互猜疑。“文革”前学校曾进行过一次职称提升，无线电系的张克潜和团委的张慕萍是那批提升为讲师的代表，张克潜是搞业务的标杆，张慕萍做政治工作突出。张慕萍提升为讲师，团委没人有嫉妒心，因为他比我们多了十几块钱的工资，大家有时会起哄喊“张讲师请客！”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清华团委勇于承担重要的工作任务，党委也放手给团委干部压担子，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我们这些刚到团委工作的干部，由于都承担过独当一面的工作，所以成长较快。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带领学生到上庄公社参观学习。那次去了不到10天时间，一天晚上一个男生宿舍因生煤炉取暖发生了煤气中毒，幸亏一个同学起来上厕所晕倒在了屋门口，醒来后他立即叫醒了其他人，这才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这件事的发生使我受到极大警醒，真正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重大，有时候是人命关天啊！我好像一下子就成长了起来，成熟了起来。

这段在团委工作的难忘经历，虽然从时间上看是短暂的，但却是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和锻炼的几年。清华党组织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团结一致的班子风气、又红又专的自我要求，这些都从这个时期开始深深地铭刻于我的心中。

与光共舞——我的科教人生

○左铁钊（1964届机械）



左铁钊
学 长

日子过得真快，从1964年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工作，至今已整整六十年了。蒋南翔校长当年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我算是超额完成了。回首自己走过的六十年坎坷而奋进的一生，真是百感交集！

1941年2月5日，我出生在长江岸边恩施大山里的一个农户家里。当时我父亲左吉身为南京国民政府后方重伤医院院长，正带领着重伤员从南京向重庆撤离。怀孕六个月的母亲领着四岁的哥哥，从南京乘小木船去往重庆，船到中途，因身体实在受不了路途颠簸，靠岸恩施，生下不足七个月的我。我能活下来实属奇迹。

父亲毕业于南满医科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到北京协和医院担任医生和教授，母亲为护士。父亲是张学良的好友，“西安事变”时为蒋介石看过病。为消灭当时我国东南爆发的霍乱、鼠疫等流行病，父亲曾在福州建立了东南鼠疫防治所，后去美国侯普研究所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任命为台湾卫生部部长，但因对国民党的失望未去台上任，几经周

折我们全家1951年从香港回到大陆，父亲任湖北省卫生厅厅长。

我的学习生活随着父亲的调动而不断变更，先后在福州、香港、武汉完成基础教育，1958年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

北工大任教

1964年清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焊接教研室工作，教授“焊接原理”课程，并带1960级和1961级学生毕业设计。

不久“文革”开始，大学成了重点革命对象，科研教学活动全部停止，工宣队军宣队陆续驻校“上管改”。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被人举报打成“反革命”被关押，虽有三个月身孕，仍未逃脱批斗，每天挺着大肚子去“劳动改造”，直到产前几天，才把我从劳改队放出来。

“文革”让我经受了一次“再教育”，让我认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应该去努力探索未知，追求真谛，为人类社会与环境进步做出贡献。”这也成为我日后人生的座右铭。

十年动乱总算结束，逐渐回归正常的科教工作，为写教材我经常伏案工作到半夜两三点。在编写焊接原理时，发现在“焊缝金属中气体元素”一章中，对于焊缝中的氧氢氮等气体元素的含量和形态等都不可测，后走访北京和上海等地的气体分析仪器厂，也均未解决此难题。从1975年开始，我带领原理组团队进入这一物化领域，开展“焊缝金属中微量元素分析”

□ 回忆录

的研究，在工大建成了我国首个“焊缝金属中微量气体元素检测实验室”。1984年国际焊接协会主席、日本名古屋大学益本功教授来校参观，在我们实验室里久久不愿离去，他没想到在中国这么一所不出名的大学里，会看到如此高水平的实验室。后来我在德国参观亚琛和布论瑞科焊接所时，才得知焊缝金属中微量气体元素的分析是其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而其分析测定的水平远低于我们。采用氧氢氮分析仪，我们研制焊条药皮成分配方，控制熔池熔渣气氛的物化反应，制成了新型打底焊条，由南京焊条厂生产，为宝钢等冶金公司采用，取代了进口焊条。

德国七年

我爱人肖运鸿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研究生，十年寒窗，毕业时遭遇“文革”，八年里没有让他干一天专业技术工作，不是在车间当毫无技术性的线圈敲槌工，三班倒劳动，就是在冰天雪地里挖防空洞。经我到处求助，1976年他调回北京，结束了八年两地生活。为求更大发展，1983年他通过外语和专业的国家统考，获得国家教委出国进修资格，1985年被派往原西德不来梅大学。此后经他联系，我获得不来梅工学院客座教授的邀请函，以国内讲师身份“自费公派”出国深造。

1986年5月2日刚下飞机，4日工学院副院长和Puenitz教授就约我面谈，Puenitz教授一个月后将退休，我的任务就是接替他的教学工作，用德语给大三学生讲授金属工艺学，可我仅出国前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三个月德语，口语能力非常有限。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每天泡在学院图书馆补习德语，认真听教授们的

授课。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给六十多名德国大学生用德语授课时，还是非常紧张的。而在我用最简单的德语慢慢讲完90分钟的课时，学生们使劲鼓掌，敲着课桌给我称赞和鼓励。我的第一节课就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我想主要是我参照国内的教案，加入了深入浅出的专业知识，使原讲义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上完几次课后，我逐渐适应了在德国课堂上讲课的模式和节奏。然而我不甘心只做个金属工艺学的“教书匠”，希望在科研领域里能有更大的发展。在德国焊接协会主席Dr. Sosenheime帮助下，我参观了德国一些知名的焊接研究所，后决定到不来梅射线应用技术研究所（BIAS）工作，开始在激光制造领域进行科研工作，直到1992年初回国。

在德国工作期间，我完成了多个科研项目。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从1986年底起我开始的铝合金激光焊接研究工作。德国教研部（BMBF）一直有一项长期的科研计划，就是“运输装备的轻量化”，包括汽车、火车、船舶、飞机等常见的运输装备，这涉及到新材料、新型制造方法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运输装备的轻量化可以极大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提高这些装备的装载能力或运输速度。飞机的机身大量使用高强铝合金，但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传统的铆接工艺实现飞机蒙皮与机身骨架的固定连接，一架大型飞机通常需要使用上万个铆钉。我儿时在武汉长江边长大，亲眼目睹过工人们如何用通红炽热的大铆钉将桥体钢梁一根一根地固定连接起来，对铆接工艺的耗时低效印象深刻。飞机蒙皮只有2mm厚，使用传统的焊接方式会产生热变形，另外飞机上的高强铝合金在焊接

过程中会产生晶间热裂纹，这些对于安全性要求极高的飞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通过前期的课题研究，我对激光在制造领域的特点和优势有了深入的认识，我希望使用激光焊接技术实现飞机轻量化的目标。后来我参加了欧共体研究项目——运输装备轻金属的激光可加工性研究，经过大量的实验与探索，最终完成了金属材料铝合金从全反射材料成为吸收率高达95%的可加工材料，创新了材料吸收率的基础理论。

当我的研究成果——铝合金激光可焊性的阈值曲线首次在巴登巴登的欧洲学术会议上公开发表时，引起了学界的轰动，西方同行们都对一位来自亚洲的女性科学家能够颠覆铝合金的激光可焊性而赞叹不已，这对物理学也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这个成果公开发表后，奔驰总部（位于不来梅）的负责人就来BIAS邀请我去作报告。总部对这次学术报告非常重视，其欧洲各大分厂的技术主管全体出席。在三个小时报告结束后，他们深受鼓舞。随即奔驰的技术主管来到BIAS参观我们的实验装备，观看铝合金激光焊接的演示实验。当天下午奔驰就和BIAS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制定全铝结构轿车的研发方案。奔驰的竞争对手，奥迪发展部主管从此也开始长期蹲守在我的实验室了。奥迪A8的全铝骨架式焊接结构就出自我的实验室，这与传统的覆盖件车身结构有着天壤之别。

激光焊接的全铝结构汽车骨架成了我前期研究成果

的副产品，主产品还是激光焊接取代铆接在机身轻量化上的应用。在我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德国空客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终于在世界上最大的客机A380上全面实现了激光焊接的商业应用，实现了A380飞机蒙皮与筋板结构采用激光焊接取代传统铆接的新工艺，改变了飞机制造的工艺流程，并减轻了自重。为此德国政府对我表示尊敬和感谢，德国宇航院发展部负责人Dr. Laran曾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你在德国实现了飞机制造的技术大革命。”

在德期间我还被邀在宇航院、金属学会、欧洲激光材料加工会议等做学术报告。当我回国后重访德国时，德国教研部光学部门负责人Dr. Ruerich，对中方访问团团团长、国家科技部冯司长说：“感谢左教授为德国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在高手如林、技术领先的西方能完成多项开创性的科研工作，能为祖国争光，感到无比自豪。

在国外时间久了，我和爱人都很思念



德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德激光技术中心，前排左2为左铁钊

□ 回忆录

祖国和亲人，决定回国。我向所里提交了辞职信，来自各个领域、不同层面的挽留、劝说和阻拦纷至沓来，可以说是“软硬兼施”。尤其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者，大家长期在一起共事，他们很认可我在德国期间所做的重要贡献，认为我是个难得的人才，为我的决定感到非常惋惜。前前后后我参与了很多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改造，掌握了太多企业发展的技术机密，临走前签了数不清的保密协议，各种限制，事无巨细。所里面我带的这一批实验员和技术员对我的离开也是依依不舍，临别的聚会上有的人还掉了眼泪。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砺，在我的带领下这些人的业务水平在兄弟单位中早已首屈一指。想想真是令人感怀，刚开始在BIAS做实验时，没有谁愿意帮我搭把手，焊接用的保护气瓶都要我自己搬运。后来大家彼此认识了，他们对我的工作都是倾力相助，所里的其他小组碰到了实验难题，他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去问左女士”。

在众多挽留劝说下，我依然满怀在中国发展现代激光事业的信念，告别了工作七年的德国。

回国创业

1992年初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迎接我的既没有鲜花，也没有掌声，摆在我面前的创业之路的确异常艰难。我原工作单位北工大，甚至以我延迟归国为由不予复职。在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办公场所和设备，连计算机及软件等都是从德国带回国的。当时的工大领导对开展激光学科没有任何兴趣，而彼时德方力劝我返回，BIAS更是许诺以更高的薪酬。

老实说我下决心回国的目的就是想带着一批人，让中国的激光制造技术走出一穷二白的境地，个人的待遇根本不是我优先考虑的事项。最开始，我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激光制造实验平台，因为如果没有先进的加工手段，改造企业落后的技术就无从谈起，更别说激光制造技术的应用推广了。当时我估算了一下，最基础的科研实验平台大概需要2100万。激光制造技术的前期投入都是很大的，最先进的加工设备只能从德国进口，由基础的科研到最终企业应用的成果转化也不是个短期行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Sepord所长在我回国前夕坦诚地告诫我：你回去只有具备了三个条件才能白手起家，闯出一片天地——第一是要有资金和投入，否则实验平台和研究团队都无从谈起；第二是要有权力，要有话语权，要能主导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第三是要有成果，这是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很赞同他的说法。

正在我犹豫是否要“打道回府”之时，转机出现了，清华大学从事激光技术研究的周炳琨院士约我到清华一叙。周院士早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非常理解出国人员回国后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他认为我是焊接专业出身的，国内焊接技术领域的同僚对我都很了解。但在激光制造领域，我与国内光学界几乎没什么交往，这可能就是问题的症结。应该让国内光学领域的同行了解我在德国的科研成果，我也应该了解国内光学界的发展现状。一周后，周炳琨院士在中国电子11所为我组织了一场专场学术报告会，他把我引荐给国内的光学界，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报告一结束，11所的所长就单独找我，表达了想让我来11所工作的意向。11所是搞红外的，与我研究的激光制造密切相关，他们的总工和所长为了把我从北工大调到11所来，真是不遗余力。随后，作为当今中国光谷发源地的华中理工大学，前前后后7次请我去武汉作报告，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不久，清华大学第二次请我去作报告，这次是在清华刚落成的新图书馆报告厅，正副校长全部出席。清华是我的母校，清华机械系为了能把留住，连住房和职称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的知名度在国内慢慢打开了，我梦想的科研实验平台也渐渐有了眉目。

那时国务院下设有一个产学研办公室，负责组织和协调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和中科院三家单位在合适的领域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合作。其中国家经贸委是投资方，代表的是企业方面。印象深刻的是，国家经贸委技术进步与装备司江旅安司长对建立激光制造的产学研中心很感兴趣，最初他想把这样一个中心建在首钢。当时我对他讲，这个中心不能建在首钢。因为如果建在一个大企业里，无论什么样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平台最终都会变成一部加工装备，就没有任何科研的价值了，更别提在其它领域的技术应用与推广了。后来他就决定在机电部里选落脚点，北京机床所、11所，北京机电研究院等都是参选对象。由研究所投入实验室场地建设，国家经贸委则负责出资，完成实验平台的引进。这么大一笔资金的投入引来了各方博弈，筹建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把我整得团团转。最终国家经贸委出资140万美元平价外汇，地点选在了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因为相对而言它与各方的利益纠葛

最少，这也是各方平衡的结果。机电院将一座原来装满机床的车间腾退出来，上下两层，一共800平米。我全部按照德国标准进行了水电气改造。

1995年在北京市机电院正式建成“国家产学研激光技术中心”（NCLT），150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中心成立大会。这是国务院产学研办公室组织筹建的第七个产学研中心，我是中心的主任。彼时德方对我在华的科研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1998年德国宇航院激光所赠送我们两套激光设备，并派技术人员帮助设备拆装工作。我们在北工大“知新园”建成了“国家产学研激光技术中心研发部”。

1996年在北工大物理系支持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激光微技术（即激光光刻）实验室”，我们用三年积攒的60万科研经费，购置了德国准分子激光器，实现了最早的微米级齿轮的微光刻。同时我支持研究生陈涛开展生物芯片和微流控生物芯片的研发项目，在非典期间被封闭在校园里时，迎来芯片键合成功的巨大喜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7年我提出由中德双方在北工大共同组建“中德激光技术中心”的建议，得到双方政府赞同，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据此，中方在北工大主楼后面新建了激光技术中心大楼，期间德方派出工程师进行指导。此外每年接待中方激光代表团访德，其在德期间全部费用由德方承担。此后我中心每年挑选国内有关科研院所及企业15人，访问德国激光研究和制造单位。

为培养我国激光科技人才，2000年北工大正式成立“激光工程研究院”。中国大学里都没有设立激光科学专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培养研究生为目的的激光

□ 回忆录

工程研究院。至此，通过我和同事们的努力，在中德双方政府的共同支持下，在北京工业大学从无到有，先后建立了“中德激光技术中心”“国家产学研激光技术中心”“激光工程研究院”等科研教学平台，以及现代激光制造、激光微技术和能量光电子三个方向的十二个实验室。

除此之外，回国后我和同事、研究生们还完成了多个科研项目。值得提及的如：带领团队解决了某国防重大装置封装泄露与污染难题，用激光焊接取代了电子束焊接，该项目的设计方案和装备质量的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在60周年国庆检阅的全新大红旗轿车的生产过程中，带领研究生在一年内研发成功使用激光制造技术的相应软件，这是世界上第一套激光制造的专用CAD/CAM系统软件，它为轿车制造节省了几十上百套的模具；指导研究生研发完成大功率CO₂激光传输系统过程光流密度的变化机理，该研究成果指导了德国通块公司开发飞行光束跟踪望远镜光学系统，以及德国米巴哈公司在宝钢采用激光焊接取代传统电弧焊接，并提高了对激光武器的认知水平。

2003年我提出建立中国的激光辐射安全标准，以便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建议，得到国家质检总局领导、政协委员王风青的大力支持，后在11所组建了“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教书育人

2023年我即将83岁了，每年还都站上讲台，为从各个专业招进的一百多名研究生，讲授“激光科学与工程导论”，为培养他们严格的科研能力而贡献我的一份力



左铁钊为2023年入学的研究生上课

量。我真心希望通过我的讲座，能启发研究生们正确地进入我国激光制造的大舞台，让他们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近年来我心脏不好，曾留住ICU病房两个多月，今年我仍然站在讲台上，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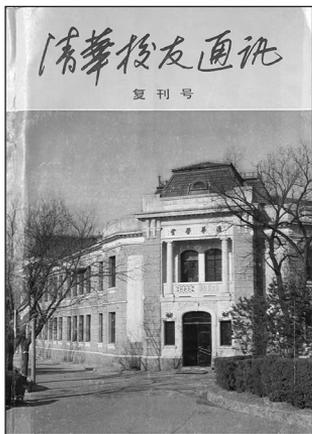
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中，我始终把培养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放在第一位，这些能力包括探索未知的能力，追求真谛的能力，以及实现改善人类社会环境的能力等，为此，我竭力把研究生放在科研项目第一线进行指导。当初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尚未建成时，我也尽力为他们创造优越的科研条件，通过与德国教研部（BMBF）协商，我一个个地把研究生陆续送往德国最好的研究所，参加一流的课题研究，并由德方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我从不把研究生当打工仔对待，也绝不赞成现在有的人把对研究生的培养变成成为导师服务的打工仔的做法。

很高兴在我从事教学与科研60年的前夕，《与光共舞——左铁钊从教六十年文集》出版了，它真实记录了我的人生经历、遭遇和感悟，算是为我这一辈子留下的一个宝贵纪念吧！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的由来

宗 和



一九八〇年四月，《清华校友通讯》复刊

清华大学有很好的校友工作传统，清华校友总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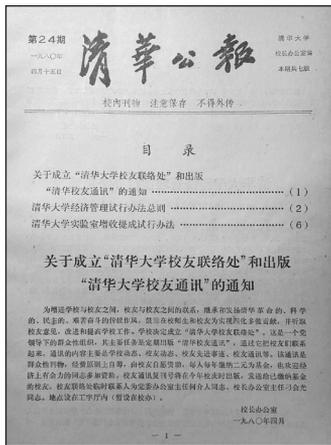
《清华校友通讯》是清华大学历史悠久的校友刊物，创刊于1934年，是清华校友联络的重要平台。由于历史原因，《清华校友通讯》在1950年4月29日出版第二期之后停刊。由清华同学会总会组织的校友活动暂时中断。

这种状况直到30年后得以改变。在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华大学经过拨乱反正，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校友工作传统也随之得以恢复。在1980年4月15日出版的《清华公报》上，刊登了由校长办公室发布的《关于成立“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和出版“清华大学校友通讯”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学校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其主要任务是定期出版‘清华校友通讯’，通过它把校友们

联系起来。”1980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复刊，至今已经连续发行44年。

校友联络处的成立，为校友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刊物的内容，《通知》也进行了具体规划：主要内容是学校动态、校友动态、校友先进事迹、校友通讯等。此外，《通知》对《清华校友通讯》的经费来源也作了说明：“经费原则上自筹，由校友自愿资助，每人每年缴纳二元为基金，也欢迎经济上有余力的同志多加资助。”值得一提的是，在总共86页的《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上，《校友捐赠录》的篇幅就长达5.5页，校友联络处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366名校友捐款1393元。由此可见校友们对于《清华校友通讯》复刊的热烈期盼。

《清华校友通讯》复刊是清华校友工作迈出历史性一步的见证，值得永远珍视。在复刊号的开篇词《我们愿做一只



（一九八〇年）《清华校友通讯》复刊通知

鸿雁》里写道：“这次复刊，完全是由校友们感人的热情促成的。”1979年3月27日，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恢复校庆，校庆日为每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邀请部分知名老校友返校，并发函邀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派人来校参加校庆活动。这次校庆返校，“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的正式

成立和《清华校友通讯》的复刊标志着清华校友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2023年是清华校友总会成立110周年，2024年是《清华校友通讯》创刊90周年。愿清华校友总会成为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符的校友组织，愿《清华校友通讯》这只鸿雁能够飞遍全球。

江西清华校友会初创背后的故事

○徐家鑫（1958届水利）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彼时，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桎梏中刚解放出来，看到国家复兴有了希望，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因而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江西清华校友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发起与成立的。

其实，清华校友组织的历史很久远，只不过因为历史的原因有过中断。1981

年，“清华校友总会”在学校正式成立（恢复），各地的清华校友也在纷纷酝酿成立校友会的地方组织。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江西籍的清华校友群星灿烂，如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吴有训、东京审判中国首席大法官梅汝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罗隆基、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翻译界大家许渊冲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是1949年以后，来赣工作的本外籍毕业生也有三四百人之多，他们在各条战线勤勤恳恳工作，为江西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鉴于此，1959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时任南昌市委建委主任的沃祖全学长找到万晓艾、王平、吴景柏、万学文、丁友



1988年第一次清华校友联络座谈会参会校友代表合影，2排左6为徐家鑫学长

陶和我等几个校友商量成立江西清华校友会之事。我们成立校友会的宗旨是：增进在赣校友的联系与友谊，增强校友与母校的沟通与联系，为江西省的建设与进步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成立校友会组织多少还有一点忐忑，因为当年除工会、工商联外，民间社团组织极少，当时还没有民政部门的审查登记制度，我们的成立会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认可吗？

此时，正好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我遇上了清华水利系教授施嘉炆老师。施老早年留学美国并取得多个学位，回国后在清华曾任工学院院长，德高望重，在国内外校友中有极好的声望，所以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成立时被选为副会长，1986年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我在陪同他游览南京灵谷寺时，向他汇报了江西拟成立清华校友会一事，他表示极为支持，并向我说明，清华校友总会的成立是经中央批准的，其章程中有“地方校友会”的章节，因此各地校友会的成立是有法可依的。

为了得到在江西工作的老学长们的支持，我们分别联系了江西政界、学界颇有影响力的两位老学长。一位是马继孔老学长，马老是山东人，在校时参加“民先队”，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组建抗日游击队，在革命队伍中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文革”后他从甘肃调来江西担任省委书记，后又任省人大主任。当我们向他汇报组建清华江西校友会时，他十分高兴，表示大力支持，并同意担任名誉会长，这样，我们就“底气十足”了！

另一位是谷霁光老学长，谷老1933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长期在江西从事历史

研究与教学，担任过江西大学校长、名誉校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考虑他年事已高，不敢随便打扰他，于是通过写信向他请教。不期地，他在正规信笺上用毛笔及时给我们复信，宣称支持我们的努力，因年迈不能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但同意担任名誉会长，这对我们又是一个很大鼓舞！

当年在江西工作的校友有五六百名之多，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配来江西工作的。校友会成立之初为南昌清华校友会，1993年经江西省民政厅同意，注册成立“清华大学江西校友会”。我们通过相互串连、征集，在1986年刊印的首册校友通讯录中，登记有南昌地区校友288名，其中1949年前毕业的有17人，另有九江、赣州、宜春、抚州等地区校友近百人。

在1985年4月召开的校友联谊会上，清华校友总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内称：“正当清华园里百花吐妍、万木争春的时候，传来了南昌清华校友会成立的喜讯”“在这美景良辰，让我们代表母校，向你们——生活、工作、奋斗在南昌的全体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人的问候！”“南昌是光荣的城市，英雄的城市……我们相信，南昌清华校友会的成立，必将为南昌古城增添异彩，并使她在振兴江西、腾飞中华的伟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南昌清华校友会章程，并选举沃祖全为会长，曾铎、徐家鑫、漆宝明为副会长，王平等27人为理事，并聘请马继孔、谷霁光、郭庆棻、陈癸尊四位老学长为名誉会长，张杰等8位老学长为名誉理事。

1988年3月，清华大学第一次清华校



作者与黄代放（左）在天安门城楼上

友联络座谈会在母校举行，我与黄代放代表南昌校友会参加，会后安排我们去

天安门城楼参观。

从1985年至今，江西清华校友会已走过了近四十年。回忆当年我们为她的创立所做的工作，确实是顺应了时代的召唤和江西广大校友的要求。四十年来，在历任会长、秘书长的努力下，在广大校友的支持下，校友会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得到了清华校友总会的肯定和多次表彰，为江西省的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正能量，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也要特别感谢黄代放校友领导的泰豪集团对校友会的倾力支持。

祝愿江西清华校友会越办越好！

杭州校友会成立初期的一些回忆

○赵葆初（1958届工物）

筹建起因

产生筹建清华大学杭州校友会的想法是在1979年，为主的是电机系工企1958届徐路学长和工程物理1958届的我。徐路学长1958年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文革”后期为解决夫妻长期分居而调来杭州，在杭州无线电专用设备一厂从事新产品开发工作。他不是杭州人，来杭后深感举目无亲，人地生疏，在寻找原有熟人时首先找到了身为杭州人的我。

徐路学长和我是在母校读书时就认识的。因为我们工物58班的同学是从机械、动力、电机、无线电等系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抽调的，其中不少同学来自徐路学

长所在的工企58班。徐学长在校时就十分活跃，是我们工物58班的常客。因此我们不仅相识，而且很合得来，毕业时又同时留校，更进一步增多了交往。大家都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会在杭州重新继续我们



1985年，钱伟长学长偕夫人（前排左4、左5）参加杭州校友会活动后与部分校友合影，后排左1为赵葆初学长

的友谊和合作。

在1977年至1979年间，我们几个清华校友（徐路学长、电机系1962届李隽培学长和我，后来又增加了无线电系1963届李玉琪学长）合作研制了一台名为“电子心率监护仪”的新型医疗仪器。该项目获得了1978年杭州市科学大会的科研成果一等奖，使清华校友在杭州市科委系统及杭州市政府系统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一个把清华校友联系起来、发挥集体的科技优势、为杭州市乃至浙江省作出更大贡献的想法，强烈促使我们着手筹建清华大学杭州校友会。

历史沿革

在筹建杭州校友会初期，必须提到1946届历史学系的王功炳学长。我是1962年至1965年期间在杭州青年中学（即现在的留下中学）作代课老师时认识王学长的，当时他是该校副校长。

据王功炳学长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在杭州青年会大院内有一个杭州清华同学会的常设机构。王学长曾经担任该机构最后一任的值班秘书。当时杭州清华同学会的主要作用是为外地来杭州的清华同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帮助，例如协助就业、资助差旅费用、安排子女求学、解决生活困难，等等。这个同学会很受大家的欢迎和爱护，使很多清华同学在最需要帮助时得到同学会的关照。同学会的经费来源是由在杭州境况较好的学长们捐赠，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很多清华同学得到了同学会的帮助后终生难忘，其中很多受过帮助的同学又给同学会和其他同学更多的回报，充分体现了清华学子团结互爱的精神。

1979年我打电话给王功炳学长，告诉他我们准备筹建杭州清华同学会。王学长十分激动，再三鼓励我们抓紧时间尽快与母校取得联系，需要他干什么他一定会努力完成。当时担任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的王学长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程来找我徐路，一再嘱咐我们尽快把“清华同学会”恢复起来。

筹建初期

1979年，我们与母校取得了联系。学校建议宜采用“校友会”的名称，学校里成立总会，各地成立分会，并指定杭州分会可联系浙江省内的校友。学校寄来了一批“清华大学校友登记表”，正式认可我们的筹建工作。

我家当时住在湖滨路平海路口的湖滨五弄，自然地成为我们校友会的联络中心。徐路和我分头跑到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机电部华东勘测设计院、杭州制氧机厂、重机厂、汽车发动机厂等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找到一个，联系一批。徐路主要负责与母校的联系工作和物色杭州分会的领导成员，我负责校友登记表的收集及校友通讯录的汇编，陈晨曦学长（1958届电机）负责财务和给校友们发通知。

通过一年的筹措，我们共联系上全省校友300余人。在选择杭州分会会长时就选了我们的师辈：杭州大学的朱守训老师（教），分会的副会长则由浙江大学的程肇基学长（1956届硕，电机）、杭州自动化研究所的朱伯章学长（1951届化学）和水电部华东勘测设计院的阮世锐学长（1963届水利）担任。徐路任秘书长，陈晨曦、邱志成（1961届土木）和我任副秘书长。

成立大会

1981年4月26日星期日，清华大学校友会杭州分会在杭州师范学院本部（文二路27号，现在杭师院分部）阶梯教室召开成立大会并庆祝母校成立70周年，到会校友有130余人，嘉兴、宁波、台州、温州、衢州均有代表赶来参加。久违的同学乍然聚首，显得分外亲切和激动，会上会有说不完的情况介绍，既有兴奋又不乏感慨。与会校友一致希望能多举办校友聚会，一致要求尽快印发校友通讯录。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最大的收获是涌现了一大批热心校友会事业的人员，其中最突出的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院长蒋葆增教授。蒋院长是20世纪30年代钱伟长学长上学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是我们老师的老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校友会全力支持，满腔热情，当场承诺帮助解决校友会的诸多困难，包括校友会经常性的联系地点、活动场所和印刷校友通讯录等，蒋院长还当即让两位在电子学院工作的校友协助处理校友会的日常事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包括朱守训会长和徐路秘书长在内的校友一致希望蒋葆增院长来出任校

友会会长。蒋院长非常干脆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前三任秘书长

徐路学长是杭州校友会的首任秘书长。1981—1982年期间，徐路学长几次去香港与父母团聚，后又举家迁居香港，校友会秘书长的工作全权委托给我。在以后几次来杭州时，徐路学长对校友会工作十分关心，一再表达了对杭州校友们的深情厚谊。

随着杭州校友会的不断壮大，我们与兄弟院校校友会的交往日益增多，和其他地区清华校友会的联系也不断扩大，原来的秘书处成员深感不胜重任。在1985年校庆活动时，我把秘书长的职务交给了第三任秘书长李路学长（1959届电机）。李路学长接任以后，校友会的工作有了明显起色。

杭州校友会的初期发展过程中，我必须提到的是水电部华东勘测设计院的弓正华学长。弓正华学长曾担任华东院的党委副书记，是我们校友会的副会长。弓学长对校友会的工作全力支持，不仅为校友们提供活动场所和饮食，而且让华东院担任

处长的校友们都来协助校友会完成各项具体任务。水电部华东勘测设计院也因此成为我们杭州校友会最具有实力的校友活动基地。

赵葆初学长已于2021年4月13日去世。此文为他生前所撰，详实记述了杭州校友会成立前后的故事，是一篇珍贵的地区清华校友会历史资料。



1986年和1995年印刷的杭州校友会通讯录

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学生艺术团民乐队

○刘沫（1997级水利）

清华大学民乐队始建于1924年，隶属于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是一支声部建制齐全，融演出、演奏和教学为一体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

国乐团的成立

西乐东渐，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民乐在清华被很多同学甚至是校方，认为是落后甚至不太入流的艺术。在这种环境下，清华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们只能互相扶持着成立民乐相关组织，举办活动。不但是学生与教工互相扶持，民乐与昆曲在当时也密不可分。

清华最早出现的民乐和戏曲社团是1919年成立的国声社，有昆曲和丝竹两部，存在时间不长。因为早期的清华学校里，学生主要是南方人，因此校内的流行乐种是江南丝竹，流行的戏曲种类是昆曲而不是京剧。1922年就成立了昆曲社团——菊社，菊社的成员除了排演昆曲，还表演丝竹乐。1924年5月泰戈尔来访清

华的时候，观看了菊社表演的国乐和昆曲，对国乐大加赞赏，请求再演一曲。第一个菊社停办以后，1926年又成立了第二个“菊社”，该菊社是一个京剧社团，这是后话。

1922年，清华校内还成立了一个教工的民乐组织“华员工会国乐团”，团员有图书馆管理员、报刊编辑、体育老师等，是一个以职员为主的教工社团。

资料表明，华员工会国乐团既演出江南丝竹，也演出昆曲。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在清华举办，接待演出中有民乐合奏和昆曲、京剧表演。参演者中，除了清华的教职员工，还有几位在校就读的学生。而这几位同学中，有人在1924年参与创办了学生社团“国乐团”。

学生国乐团成立后，在多方申请下，校方仍不支持，只说先请同学自己办着看看。学生自己凑钱解决了乐器的问题后，国乐团还是没钱聘请专门的国乐教师来



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民乐队演出合影（2023年5月21日）



泰戈尔（2排右）在清华（1924年5月）

校指导学习乐器和排练，而且没有排练场地。但是此时，学生国乐团得到了华员工会国乐团的帮助，教工们业余帮助指导同学们练习，并将自己的活动场地提供给同学们。

清华的民乐是体育老师教的

涂文先生这位清华的体育老师，为了清华大学的民乐可谓是操碎了心。涂文先生出生于1896年，原名涂传宪，别号奇峦，湖南省浏阳县人，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涂文先生1927年8月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体育部任体育教员，1933年8月考取公费留学，在美国爱荷华州大学专攻体操和韵律体操，1936年学成回国后继续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体育，曾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代主任。1939年后，曾就职于云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湖南大学、山西大学，1956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1975年病故，享年79岁。

涂文先生擅吹笙，一直热心辅导国乐团。留学美国期间也带着他的笙。1936年清华大学二十五周年庆祝会的国乐音乐会

便是由涂文先生负责筹备的，请了许多北京的民乐演奏家来校演奏。

不仅如此，涂先生在体育课上也不忘勉励同学们学习民乐。在他的体育课上，在同学们刚刚结束长跑还在气喘吁吁时候，他让同学们稍息，对同学们这样说：“前几年在清华，年年都有国乐社，这种组织是很好的。不过近年来大家都愿参加西乐会，对国粹反不理睬，国乐社也取消了，这不对的！须知在外国，中国音乐很受人欢迎。外国

人士见我们能以简单的一丝一竹，奏出幽雅的歌谱，都觉奇异，极口称赞我们的。想当年我在美国，曾在一镇市之礼拜堂中吹笙奏曲。那时老少咸集，堂中几乎满座，一曲甫终，Encore之声辙起，奏毕步出，尤被大众包围，上至白发老嫗，下至红颜小友，争相与我握手，直握至二小时尤未已！”

除了涂文先生，清华的其他先生，如余文江先生、邹峰隽先生（教授笙、笛、琵琶）、余岱东先生（笙）、方家谦先生（二胡）、徐国祥先生、余光宗先生、薛天汉先生（昆曲）等，也指导过同学们学习乐器、昆曲、京剧，有时同台演出。

1924年成立的这个学生国乐团在1933年还在活动，但在1936年时已经不再活动。

清华大学成立中乐部

1929年，清华大学终于肯出资扶持中国传统艺术了，于是成立中乐部，聘请“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先生指导清华的“中乐”。这个行为，相当于是校方斥巨资把本已奄奄一息的清华民乐彻底打没气了。因为虽然早期清华民乐和戏曲纠



爱新觉罗·溥侗

纠缠缠，但戏曲和民乐毕竟还是两种艺术形式，尤其是近代民乐。

罗家伦接任校长后，在清华大学成立了中乐部。在叶公超教授的介绍下，1930年2月至1933年，清华大学聘请爱新觉罗·溥侗先生为中国音乐美术导师。与溥侗先生一起在中乐部任教的还有叶仰曦、赵石安、元伯维等，此外还有兼职的俞平伯、余日萱等教授。

当时溥侗先生在清华开设“中国古典音乐与美术”课程，每周4小时教授昆曲，2小时教授中国绘画，月薪400元。1930年春季学期开设“昆曲班”后，1930年秋季学期又开设了“国乐班”。乐器均由学校提供，场地更不成问题。昆曲班演出时曾引起轰动，甚至清华校外的男女老幼竞相来大礼堂观看表演。1933年，清华大学“以经费拮据，停昆曲课”，至此前后共活动了四年，四年间清华大学的校长竟也换了三任。

校方聘请溥侗先生主持中乐部的这个决定终是给了本就踽踽独行、处于萌芽阶段的清华民乐致命一击，使其彻底沦为昆曲的附属，失去了独立的发展空间和参与变革的可能。而在溥侗走后，清华民乐从此寂寂无声，一直到15年后的1948年春，

才才有了萌芽。

薰风国乐社（中国音乐学会）

“薰风国乐社”是在1948年春，由几位爱好民族乐器的清华学生发起、在清华音乐室张肖虎主任和戴世佺先生的积极支持下组织起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的音乐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时，乐器并未随之南迁，而是由张肖虎先生代为保管。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以后，很快在过去中乐部、西乐部的基础上组建音乐室，由张肖虎先生领导，负责学生的音乐教学和指导工作。全校有歌咏队、男生歌咏队、农院混声合唱队、交响乐队及军乐队、钢琴班、声乐班、理论作品班等组织，均每周活动一次。

1947年时，音乐室除有张肖虎先生、戴世佺女士两位导师，有音乐教师9人，其中钢琴班教师5人、声乐班教师1人、提琴班教师3人。1948年“薰风国乐社”成立以后，又聘入西南联大文学院毕业的清华校友王震寰先生，王震寰先生后来成为民乐队指导教师。

清华复校后，同学们对音乐的热情远远大于战前，经常出席音乐欣赏讲演者约二百人，参加音乐室所组织之音乐活动者计五百余人，几占全校同学四分之一。

“薰风国乐社”建立后，张肖虎先生建议不仅是探讨古典的演奏，而且要从学术上研究中国音乐，因此更名为“中国音乐学会”，每周活动一次。1948年秋举办了第一次在学校的公开演出，并参加了全校的迎接解放和入城庆祝活动，1949年又参加了“三八晚会”、校庆、“五四联合演出”等演出活动。1949年5月以后，清



张肖虎先生

华大学成立了以系为单位的党、团支部，支部内活动成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形式，兼之社团活动与学习功课的矛盾日益突出，全校的文艺体育社团都进入了休眠期。

民乐在清华存在的土壤

除中乐部的国乐班为校方主办，解放前的几个民乐社团均为学生自发发起组织的。这一方面体现了清华学生的音乐素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族音乐在当时令大多数知识分子感觉落后、土气，但根植在人们骨血里的民族性格始终会召唤着人们去亲近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

1924年《清华周刊》上刊载的一位清华校友尚仲衣留美后的来信：“清华学生……务必学一种中国乐器（月琴、箫笛、三弦、琵琶），用中国乐谱——得到中国国乐之精神。Violin & Piano学学亦好，然总不如在中国时，把中国的乐器学好，再学洋乐器，就我个人眼光，中国乐器的静的精神，比洋乐好在万分。”

而且，“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观念在那时已经有了雏形，尤其是那些曾经留学国外的同学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晰，例如涂文老师在国外演奏的那段经历。

1948年以前在清华校内的先后数个学生民乐社团，几乎都是同时包含戏曲和器乐演奏的，器乐演奏都还承担着戏曲伴奏的任务，这说明那时的清华校内还没有真正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乐”。

1935年以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改革的探索加速朝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民族器乐的变革也在此时最终走向集体性，要求整齐、统一，并且强烈、饱满、谐和。这种声音的政治隐喻是显而易见的，它也成为随后中国民族乐队建设努力追求的目标。1937年，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国乐队，这是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借鉴了西式乐队原理组建的民族管弦乐队。有了国家的支持，民族器乐的现代化革命从民间的自发、业余社团的性质走向国家行为，其改革被大大加速了。

1948年成立的“中国音乐学会”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标志着清华大学内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民乐队”的诞生。张肖虎先生是掌握了时代脉搏的。

建国以前，民乐在清华发展的艰难，固然有校方支持不足、同学热心不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孱弱、时局动荡。“仓廩实而知礼节”，国将不国的时候，哪里有心情再潜心研究音乐？不仅是民乐，西乐在清华也几度凋敝，连平静的书桌尚且容纳不下，何谈艺术？而歌唱、戏剧这种对装备要求低、发动群众的效果更直接的艺术形式在当时异常兴盛，即使是在举校南迁的西南联大时期，也并未停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稳定发展期，中国民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清华大学也从1948年起聘请教师专门指导民乐队，终于迎来了清华民乐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

上海清华中学的由来

○陈世梁（1964届机械）

在如今的上海黄浦区茂名南路有一所“清华中学”，它不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但却和清华大学、清华校友有着不解之缘。现将我知道的一些情况介绍一下。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和全国一样，在“文革”以前就很热络的各种同乡会、校友会等纷纷恢复了活力。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上海校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一个“清华大学上海同学会”。“文革”后，校友会又开始活动，特别是解放前毕业的老校友对校友会特别有感情，他们从各种渠道收集分配到上海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信息，建立通讯网，组织座谈会。

1982年的一天，我接到1935年外文系毕业的老学长金兆骧打来的电话，希望我参加校友会的活动，我高兴地应允。原来校友会每年在清华母校校庆前后组织一次活动，而且有母校的领导出席，介绍母校的发展和近况。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活动就惊呆了：南昌路科学会堂的小礼堂里，校友坐得满满的，没有一千人，也有几百



1988年1月11日，陈世梁学长作为讲师团成员与清华中学同学对话

人，母校的凝聚力太大了！

不久以后，我又接到金学长打来的电话，说目前上海的教育正在恢复发展，我们同学会要为上海做点什么事，校友会理事会研究决定捐资一所中学，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同志非常支持，她原来是卢湾区教育局的局长，准备把卢湾区的红星中学改名为清华中学，由清华校友会的老学长扶助办学，我听后表示全力支持。卢湾区后来并入黄浦区。

1985年8月，我参加了红星中学改名为清华中学的仪式。在1985年8月14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新闻中有记载：“经市府批准，由上海清华同学会帮助卢湾区教育局办好一所完全中学——上海市清华中学。有关协议前日签字生效。”“副市长谢丽娟应聘为校委会名誉主任”。

记得会上宣布了两件事，一是每年从高中毕业生中选送几位优秀学生到清华大学学习，此前上海只有几所重点中学有资格参加清华、北大提前录取的招生考试，这个待遇等于是把红星中学提高到市重点。另一件事是由清华老校友组成“讲师团”，向中学生宣传清华精神，鼓励他们立志奋发学习、报效祖国。我也被列入讲师团的名单中。

在1987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新闻中介绍：“建校两年来，清华同学会集资向学校赠送了25台英文打字机，并设立奖励基金，先后奖励了100多位学生和教师。昨天，同学会又向学校赠送一架价值2000元的电子琴，并宣布成立上海同学会讲师团。”

社会学泰斗“强爷”走了， 去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宋春丹



讲坛演讲
李强老师在「人文清华」

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郝景芳选修了社会学系主任李强的“城市社会学”，听他讲城市分层理论。尤其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李强提到，劳工群体是这些年经常受到忽视的一个群体。或许正是这样的潜移默化，日后让她在《北京折叠》中创造出了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

李强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十多年，后又主导了清华社会学系重建，担任该系主任多年。他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018年入选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在学术圈里他名字的前缀由“人大”换为“清华”，后又被亲昵地尊称为“强爷”。2023年12月12日，李强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根基和最重要领域之一。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终身都没有离开这个领域。他的一生研

究，仿佛都在反反复复地说：何以解忧？唯有流动。

“自学成才”

1979年的一天，在北京东四的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外文图书展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国际政治系学生李强发现了一整架归类为Sociology（社会学）的书，其中心理社会发展论创始人爱利克·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吸引了他，他想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这是李强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也是他对这门引导人们“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的学科发生兴趣之始。

就在不久前，邓小平提出，我们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忽视了多年，现在需要“赶快补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被取消多年的社会学开始恢复与重建，国外学术专著被大量引进。

李强开始如饥似渴地读社会学原作。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停滞近30年，这个领域的书多是外文的，他英语基础好的优势就显露了出来。他1963年考进北京四中读初中，一进校就发现这里藏龙卧虎，有些家境不一般的同学英语已“滚瓜烂熟”，他震惊之余开始疯狂学英语。直到1966年夏宣布取消高考那天早上，他还在背英语。“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9年。虽然这里地处“荒山

野岭”，他却自费订了一份*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英文时政新闻周刊。

李强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硕士论文是关于西方的“白领阶层”，都需要大量查阅英文资料。光人大图书馆的书是远远不够的，他就跑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这里外文藏书很多，据说是全国唯一一家购书不受外汇额度限制的图书馆。

在人大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间，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他大都读了，他的社会学基础就是这样靠自己读书打下的。1984年，人大哲学系教师郑杭生从英国进修回国，在人大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李强找到他，两人一说即合，1985年李强研究生毕业后即进入社会学所工作。

1987年，人大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郑杭生任系主任，李强任副主任。郑杭生不久担任了校领导，虽然还兼着系主任，但具体工作多由李强主持。1990年李强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学，回国后不久，于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任命为系主任。

李强主持下的人大社会学系很包容。



李强老师（左5）带领本科生及课题组成员在清河阳光社区调研

人大社会学系2000级硕士、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何晓斌曾回忆，当时人大社会学系是一个神奇的系，招募了各方专业背景的人才，有李路路这样的学院派，有历史学者转型成性学研究者的潘绥铭，有在讲台上拿着发黄的手写讲义天马行空的徐向东，也有青年才俊洪大用、刘精明和陈劲松等。

“四个利益群体”

从硕士论文开始，李强就在研究社会分层。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人还不知有“社会分层”这样的社会学术语。社会分层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概念，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各群体之间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制度化社会差异体系。那么，阶级与社会分层是什么关系呢？李强曾解释，社会分层是个包容性较强的温和的概念，阶级可以说是“属性差异”最为明显的社会分层群体，绝大多数分层群体都称不上阶级。

李强说，社会分层涉及平等与公平的话题，不均等（不平等）与不公平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均等（不平等）指资源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有差异的，不公平则是指资源分布的格局不合理、不公正。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突出特点是“身份制”，或者说它的“不流动性”，改革本质上就是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使其得以流动起来。

改革前，中国社会主要有四个大的“社会聚合体”——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改革中这四个聚合体都发生了巨变。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受损状况，李强与孙立

□ 怀念师友

平、沈原等共同提出了“四个利益群体”之说，将社会群体分为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特殊获益者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很大变化。“专业户”“万元户”等是最初的特殊获益者，1992年后一批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下海”，出现了一个经济精英集团。

李强认为，对“普通获益者”的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询问人们，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李强被任命为系主任时，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大潮高涨。在副校长郑杭生支持下，他在人大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前身。他多次采用PPS抽样方法，组织全国规模的社会学调查。这是一种等比例等概率的抽样调查，难度很大。

1996年，他主持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入户问卷调查，该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1986年到1996年的生活水平变化。结果，高达83.6%的城市居民和88.7%的农村居民回答生活“好了一点儿”或“好了许多”。

在李强看来，“普通获益者群体”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基础就在于此。这个群体的构成十分复杂广泛，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获益群体，也因此成为改革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另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国企大规模改制，一批职工下岗，从这个普通获益者群体中分离出去，进入了“利益相对受损

群体”。虽然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比起一些农村贫困地区的要好一些，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是强烈的。而上述农村贫困地区人群和其他一些最困难群体，就构成了“社会底层群体”。

改革中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这些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还谈不上是稳定的阶级阶层。20世纪90年代初，李强在研究中发现，国企职工是一个社会地位相当不错的阶层，无论经济地位、福利待遇还是社会声望都比较好。短短几年之后，一些人却面临下岗，生活下坠。但到21世纪初，改制完成，留下的大型国企又重新成为人们追捧的目标。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让李强深感震撼。

“复系一代”

1998年暑期刚过，清华大学负责抓文科建设的校党委副书记兼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显章和校长助理李树勤在人民大学见到了李强，邀请他加盟清华，主持社会学系复建工作。

改革开放后清华一直尝试复建文科，并于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院曾设立“哲学与社会学系”，但老清华传统优势的社会学学科没有独立建系。

李强收到邀约后犹豫了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学界征求同仁们的意见，没想到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去。1999年9月，他接受邀请，正式调入清华大学。2000年，社会学系在清华复建，他出任系主任，兼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系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挤在清华文科北楼两间办公室办公。楼里挂着清华社会学先贤们的画像，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李景汉、李树青、

陈序经、吴泽霖、杨堃和费孝通。李强专门拜访了费孝通，汇报了社会学系复建情况，费孝通说：“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

孙立平、沈原等社会学研究者纷纷加盟清华。沈原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过科研处长，对学科建设很有想法，一再强调要研究社会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孙立平原是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李强为了邀请他加盟，和校领导积极沟通，不走职称评审流程，教授职称、博导、住房一并解决。孙立平历来最不愿意做管理工作，进入清华后几乎天天到系里，积极参与讨论，写学科规划文件。

李强与孙立平、沈原等讨论后为清华社会学发展确定了三个重点方向：一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这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二是城市社会学，因为清华工科很强，城市研究基础雄厚；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景军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景军是哈佛大学博士，放弃了美国的终身教职回国。他的导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大牌教授，因此他进清华后开拓了医学社会学。

清华社会学系复建初期没有博士点，在两院院士吴良镛的建议下，李强在建筑学院规划系招收了博士生。有一段时间，社会学系的博士生补齐规划专业课后拿的是建筑学工学博士学位，这些毕业生后来在城市规划界突出了社会规划特色。

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张小军、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后裴晓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郭于华等也纷

纷加入清华社会学系，各自开拓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

那时清华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队伍，社会学系很长时间坚持了这个原则，保持着十来个教师的规模。这个精干的团队个性十足，“一个顶一个”。熊知行楼里经常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偶尔大嗓门的争执声。李强则没什么锋芒，总是和和气气，云淡风轻，把人事行政和后勤方面的琐事都承担了，让老师们能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术上。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赵鼎新曾评价，清华社会学系“复系一代”是一批极具个性和学术眼光的人物，而李强却能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在几年内就为清华社会学系开辟出一片天地，令人赞叹。清华社会学系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该系名列社会学学科第三名，打响了名头。

面对真问题

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前十年是中国社会学界在决策咨询中最能发挥作用的时期。

那时，清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由



2020年元旦和学院师生合影

□ 怀念师友

李强兼任，执行主任为沈原，副主任为谭深，得益于李强的人脉和领导力，研究中心搭建起了由一百多位国内外专家组成的专家网络。

那时研究中心经常召开“圆桌会议”，邀请党政官员、经济界人士、媒体、研究者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参加，讨论社会热点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中心与环保总局有过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参加过紫坪铺等工程的评估，为水利电力部做过《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做了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调研。

当时北京社会学界形成了以北大、人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为主的专家群体。李强待人友善，善交朋友，人脉远远超出社会学界，因而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处理好“三校两院”之间以及与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研究院、中央编译局等官方研究机构的关系。

清华社会学系提出了“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问题”的建系宗旨。在中国社会学界的诸多学派中，清华社会学系以实证学派见长。这与历史传承有关，老清华社会学系的费孝通、陈达、吴景超和李景汉等都是长于田野调查的学者。李楯说，前辈学人常称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进入清华之后，李强不再经常组织大规模全国性调查。他觉得，这种调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搜集数据，对于数据的分析利用反而不足，不如聚焦于社区，更多开展解剖麻雀式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

他采用中国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

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总体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结构。丁字的一横代表着人数众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很低的群体，一竖则代表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系列人数很小的群体。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演变成了“土字型”。也就是说，中间阶层有了明显增长，一部分人实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进入了中间层。“土字型”社会结构的出现无疑是社会结构的进步和优化，但处于下层的社会群体比例仍然较高，离较为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有距离。

李强提出，制约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四个世界”，即“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这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除人们所熟悉的城乡差别外，中小城市和超大城市在经济、社会治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异逐渐凸显出来。

根据2010年的《中小城市绿皮书》，城市的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为小城市，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为超大城市。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见，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或“土字型”，大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超大城市则已接近于“橄榄型”。

李强认为，当今中国城市可以明显区分为“超大城市”和“其他城市”两个世界。这使得新兴中产阶级产生“天花板”和“区隔”心态。最新研究证明，当代全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来自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沮丧的中产阶级”。同

时这也说明，我国社会实际上还沉淀了大量的资源。“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打破“四个世界”的分割，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社会经济就有望获得更大发展。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设想的三个空间的人口数量是，第一个空间500万，第二个空间2500万，第三个空间5000万。即第一空间的人口约为全部人口的6.25%，第二空间为31.25%，第三空间为62.50%。2016年在“人文清华”讲坛与李强和作家格非对话时，她笑着承认，这个比例是她“拍脑袋”想出来的。

李强表示羡慕小说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这要是放在学者身上那就叫伪造数据、学术不端了。他以社会学家的严谨认真测算了一下，看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他说，按照书中描述，不同空间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这类似于社会分层中的“职业分层”。他引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计算出，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职业上层人数占11.3%，中层占41.4%，下层占47.3%，不是太吻合。但如果是一般城市，那么职业上层的比例是12.67%，中层是38.44%，下层是48.89%，跟《北京折叠》中的三个空间更接近一些。

李强说，所谓第一空间、第二空间、第三空间的核心问题是不能共享。这给我们的启迪是，不要造成空间的封闭，有差异、有贫富都没什么关系，只要在同一空间里，有畅通的流动渠道和上升通道，社会就有希望。

“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李强曾说，要想预测未来，最好还是

看看历史。回顾20世纪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只有四个字可以描述：沧海桑田。

或许因为总是把眼光放在这样一个长时间段下，他有一句经典口头禅：不要急，不着急，慢慢来。

他说，社会科学在中国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沿革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科学逐渐成为显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同“人文”混淆。频繁使用的“文科”一词，不仅混淆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也混淆了社会科学与应用文科（比如商、法）。他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

他坚持清华大学要办社会科学学院，认为社会科学都是通的。香港很多大学都采取这种模式，社会科学只分领域，不分学科，因为现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统一。2012年，他出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

2014年，他启动了“新清河实验”。他认为，社会学论文的核心必须以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实证研究往往又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这对学生非常重要。绝大部分社会学学生论文都是以一个社区为基础，做比较长期的实地调查，这个学风从费孝通那代社会学者就开始了，燕京大学的许世廉教授等人就搞了“清河实验”。

近年里，本科时有“小钢炮”绰号的李强身体渐渐虚弱，但他从未停止工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回忆，在最后的日子里，李强常与弟子促膝长谈，稍有余力仍谋划不止写作不休，去世前十天仍有论文问世，前一天仍有文章发表。

李强的离世让很多人感到突然，他才73岁，大家认为这正是做更大学问的年

□ 怀念师友

纪。韩国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发文悼念，称李强为“拥有能够展望中国之未来的睿智和智慧眼的社会学家”，他的离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整个东亚社会学界的一大损失。

在八宝山送别李强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本科生、2007级硕士研究生，现任雀巢中国业务总监的刘洋与同学敬献了花圈：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刘洋解释，“已识乾坤大”是指，李强老师家学渊源，后成为学界巨擘，也是政府高参，其眼界、境界都高于大多数

人，对社会底层逻辑和高层布局的了解也超前于大多数人；“犹怜草木青”是指，他一直保留着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对事物规律抱有真诚的好奇，对社会问题抱有真切的关怀，对学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还在关注着“新清河实验”的进展，嘱咐学生坚持下去，摸索出一套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刘洋和她的同学们都觉得，李强老师当得起此语。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1月8日）

弦歌不辍伴师归

——回忆刘西拉老师

○江 枣（2005级博，土木）

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刘西拉同志，因病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刘西拉，山东青州人，1940年1月出生于重庆。1957年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68年至1981年任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1981年至1985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土木工程系进修。1986年至1998年历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8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讲教授等职。

刘西拉同志是我国著名土木工程专家



刘西拉教授

和工程教育专家，第八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被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清华土木系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2005—2010年连续六年，在清华大学研究生“一二·九”合唱比赛中，土木建管系

都一骑绝尘，以大分差领先第二名的绝对优势夺冠。这六年的夺冠与刘西拉老师有直接关系。

“一二·九”合唱对那几届几百上千名土木系研究生意味着什么？你现在去问他们中随便一个，得到的答案八九不离十都是“终生难忘”“热血沸腾”“灵魂震撼”。2005—2010年的土木系研究生“一二·九”，具有巨大的能量，这能量近20年始终雄浑磅礴。刘老师毫无疑问是这能量之源。

2005年9月，我推免来到清华，被清华土著、资深学生干部杨帆拉着加入了土木系研会。很快就迎来了研究生第一次大活动“一二·九”合唱比赛的筹备。“一二·九”合唱比赛可以说是清华校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最受重视的文艺活动了。土木系近十年来一直是“一二·九”合唱比赛荒漠。2004年请了一位美丽的艺术专业小姐姐加加来做指导，拿了三等奖第一名。研会各位信心大振，准备在2005年大干一场。

某次排练后研会留下讨论，记不得是谁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老刘要来！“杨

帆们”都大呼小叫“天哪！”我当然知道刘西拉的大名，可是他不是专业大咖、清华土木老系主任么？他来“一二·九”合唱干什么呢？“老刘老牛×了！”土著们教导我，给我讲述他年轻时代读书的各种传说，和20世纪90年代当系主任时带领土木系研究生“一二·九”合唱唱哭台下评委严良堃的高光时刻。

印象中那年刘老师在所有同学伸着脖子的瞩目鼓掌中第一次步入排练大教室。他大步流星，一副老牌帅哥风范，气场十足，冲同学们挥手的样子有点像纪录片《周总理在万隆》走下飞机那一刻。你能感到整个阶梯教室一下子被摄入一个能量场中。一个65岁老人体现出极度的专注、纯真、赤诚和热情。他的肢体语言很丰富，不一会儿就红光满面，一件件地脱衣服，脱下衣服往讲台上一甩，迫不及待地扭身又忘情投入作品创作中。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荡气回肠，大为震撼。

从此后，刘老师每周打飞机往返京沪，所有同学都期待着和刘老师在排练场相逢。那一年，土木建管系第一次燃爆大礼堂，拿了冠军，是第二名拍马也追不上的高分。那一夜很多参赛同学兴奋得整宿未眠。我们研会和主力成员去了大慧寺海底捞通宵庆功。刘老师也去了，和我们一起狂欢达旦，高歌畅聊，开怀大笑！夺冠后这一场彻夜海底捞，成了以后几年不变的传统。刘老师从来不会缺席，也不早退。海底捞的服务员都记住了我们，更记住了这位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老先生。

在我印象里，刘老师毫无尊长架子，我们背后都直呼他“老



刘西拉老师和同学们在系馆多功能厅排练

□ 怀念师友

刘”。他可以和我们哈哈开玩笑，可以手舞足蹈给我们演示他关于某个舞台细节效果的一个新设想，演完问怎么样。为了某个创意和设计想法不同，老刘和我们会争得脸红脖子粗。2005年大捷，刘老师的艺术雄心被激发。赛完没几天，他就跟我们会说，明年的歌他已经选好了，唱《救亡进行曲》！

这就是当年刘老师携土木系研究生在1994年创造清华“一二·九”合唱历史的经典歌曲。当年演出完一位评委在点评时说，自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后还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他和另一位评委指挥都哭了。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拿到第一名，得了第二，很多同学意难平，接受不了。刘老师专门给同学们手书写信，安慰大家，给大家鼓劲：“我相信连古老沉默的礼堂和每一块砖头都会记住昨晚我们土木系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

“要让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记住我们的歌声！”这也是我参加的六年间每年排练刘老师都会给同学们下的命令。所以，必须再一次，让《救亡进行曲》的时代最强音响彻大礼堂。

刘老师选定的2006年第一首歌是《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关于舞台的想法特别多，一有想法就打电话，然后研会就想办法执行。也是咱土木系人才济济，刘老师怎么天马行空奇思妙想，我们都给他接住落地。

刘老师还想复刻重现1994年二百号人从二楼撒传单的名场面。这个现在管理加强了办不到了，给改成在二楼两侧全埋伏下我们其他年级的同学，最后段落刘老师转身指挥全场齐唱环绕立体声“工农兵学



2007年研究生“一二·九”比赛现场。刘西拉老师指挥，本文作者江枣领唱（前排右1）

商，一起来救亡”。刘老师为了不能再撒传单别扭了半天，反复问杨帆：“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老不死心。

他想得非常细，我感觉他在脑子里自己给自己演了不知道多少遍，哪里怎么唱哪里男生哪里女生哪里大领唱哪里小领唱，哪里加什么动作做什么造型，哪里要做一个停顿哪里推上去，甚至他自己指挥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姿态，都是他根据作品情绪反复演练过的。

现场还是出了状况。《四渡赤水》临近尾声有几句是刘老师独唱，可是他全情指挥，完全顾不上从之前的领唱杨薇老师手里接麦克风！停下来拿麦克风，那作品情绪和完整性就没了。刘老师直接转身，肉嗓开唱，中气十足，表现力拉满，分毫不受影响，全场掌声雷动。待到段落间歇，刘老师再从从容走到杨老师跟前接过麦克风，气定神闲唱出最后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合）神呐嗨嗨！”大礼堂的顶快被掌声和欢呼声掀翻了。这个突发状况又成就了清华“一二·九”合唱史上的一个经典名场面。毫无悬念地，再一次独占鳌头。

2006年赛后海底捞之夜，刘老师就宣

布2007年我们唱《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是刘老师平生挚爱。我猜想从2005年起他就一定在脑海里反复设计描摹这首作品在“一二·九”舞台上的呈现了。

刘老师从年轻时就认为最体现清华精神的一句话是：“We do the best, you do the rest.”这次，为他最看重的歌，他要一支管弦乐队！土木系研会传统主打特别能折腾，就怕不折腾，越折腾越来劲。我们系有校艺术团交响乐队队长和小提琴首席，真的拉起了一支专业齐全的小型管弦乐队。

第一支歌是《我和我的祖国》。通常两首歌第一首比较抒情，或者戏剧性，第二首更重情绪情怀，以“让大礼堂的每一块砖都记住”为直接目标。

刘老师自己拉小提琴，当过校艺术团首席，开过专场音乐会。在排练现场他常常对乐队演奏提出看法，表达乐队此处未能实现他想要的效果。他以一人代一支乐队，忘情投入酣畅淋漓地用人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一番模拟示范表演，全体同学都看得目瞪口呆，齐拍巴掌叫好，大呼过瘾！

刘老师对我中场视频脚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我们做一个视频，让观众看完眼中噙泪，然后这时管弦乐队“叭”响起进行曲前奏，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中场视频我写文本，韩松剪辑制作。做出来后大约刘老师也很满意，因为他要求由他亲自来担任视频的旁白录音。

2007年是我们所有人公认舞台水平最高的一年。比赛现场唱完，中央音乐学院原总教务长方埏学长立刻含着泪从评委席上跳起来叫好。别的系都想来刺探，土木系现在年年那么牛，他们怎么练的？！我

保留了一个视频——上场前一小时，刘老师在系馆多功能厅给大家作最后一次排练和动员。看了这个视频就全知道了，刘老师怎么带我们练的。不怕叫别的系看，看了也学不去。因为注入每一个演唱同学的歌声和泪水里的，是刘老师的精魂。

我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刘老师述说他的同学们的故事，我看到当年坐着听的同学里面，好些现在也成了总工，在各自单位独当一面，还有人已经当了市长，真感到一种传承的力量。土木系不算大系，每年研究生“一二·九”都是当届研一倾巢出动，台湾籍的同学、韩国籍的留学生，按政策是可以不参加的，可是都主动来，排练次次不落。韩国留学生是个特别棒的低音大贝司，原来教堂唱过诗的，来做我们的男生小领唱，跟我们一起唱《共和国之恋》，一起歌颂古巴革命；台湾的慧勋姐姐参加一次不够，第二年自己又来，不光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和我们一样热泪盈眶，还和我们一起意气风发地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呐！你说神不神？还有什么比这个统战效果更好的吗？

在很多地方“一二·九”活动都是走形式，很多大教授也根本不屑掺和这些学生活动，可是刘老师不，他直接倾注灵魂，不计投入地燃烧发光。“一二·九”有老刘给我们当精神领袖，可是2008年，刘老师说他这次有要事分身乏术，不能再当指挥了。刘老师推荐了程晓辉老师来做指挥。程老师正是1994年土木系第一次将《救亡进行曲》唱响大礼堂时的系研会主席。

刘老师说：新陈代谢，自然之法，重在平稳过渡。他不做指挥，工作量反而更

□ 怀念师友

大了，因为除了指导我们排练，他还要每个音符每个动作手把手地把程老师给带出来。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在排练结束后，我们继续留在系馆多功能厅讨论到后半夜。刘老师夫人陈陈老师也从上海来了。陈陈老师不怎么说话，微笑着坐在一边看刘老师滔滔不绝。我们一起给每个声部单独录示范音频，一遍遍培训程老师，过审脚本文案……

程老师一直进入不了状态。我们跟他说“您得像一团火！”给我们说得他越发没有信心，打了几次退堂鼓，可是刘老师一直死挺他，就说“程晓辉没问题”。直到卓越的伴奏加入合练，那个号一吹、鼓一擂，程老师终于找到了感觉，整个合唱队伍士气也一下子就上来了。在别的系以为土木系没有了刘西拉指挥不再是不可战胜了的2008年，程晓辉老师经过一番脱皮苦练，带领我们拿下了四连冠。

比赛结束研工部部长武晓峰老师问我们系杨军老师，你们系那指挥是谁？杨老师说我们系一个年轻老师。武老师说，刘西拉走了，你们又弄出一个这个！你们还让不让别的系玩了！刘老师说：我们前几年“一二·九”最可贵的是训练磨合出了一个高效的模式，一个有机的团队。这次我虽然走了，这个模式这个团队还在运作。新人进来，通过磨合还能达到高度。这是我这个老人最骄傲最欣慰的！“一二·九”如此，学术梯队亦如此，学科、院系、学校建设亦如此。

此后2009年和2010年，都是由程老师担任指挥，日益成熟。刘老师依然参与选曲，并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不辞辛苦从上海飞来北京为大家排练。这两年土木系延续着冠军的辉煌。2010年“一二·九”

因各种原因我没有保存这一年的资料，对着电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这最近的一年了……拿起手机给龔华师弟发微信，依稀记得他是那年的领唱。

龔华师弟秒回，劈头甩给我三篇人人日志和一个百度网盘链接。13年过去了，晚上七点，这些东西都在手边，说拿就拿出来。他还把当年同学们人人上发的日志都打印保留下来了。三篇人人日志，酷酷师弟们用看似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吊儿郎当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段经历带给他们内心深深的震撼和认知的巨大改变。

土木系六连冠在2011年终止了。大约是2010年响彻综体“土木建管六连冠”的呐喊过于嚣张，校研会在2011年“一二·九”改变了规则。不要高分，不要冠军奖杯，刘老师也决意坚守他心目中朴素走心的“一二·九”精神。

那年我第一次作为观众在台下看比赛。看其他院系在跳舞、表演，只有土木系坚持干干净净唱歌。《太行山上》一曲终了，一直绷着脸的评委阎肃带头站起来鼓掌。结果不出所料地名落孙山。

阎老爷子最后登台点评发言。他说：“有一件事情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看大家都拿个红绸子从台上这头跑到那头，跑上来跑下去，还有弄个方阵，变来变去，都闹个旗子挥过来舞过去，这些个东西有多大意思呢？我感觉我们的同学们并不喜欢这些嘛！”一舒胸中块垒！

我不知道后来清华的“一二·九”合唱有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从那之后，我也就没再掺和过系里的活动了。

能跟随刘老师，参与创造了令几届土木建管全体研究生终生难忘的历史，是我今生莫大的骄傲和荣幸。

怀念我的老师龙驭球先生

○张楚汉（1957届水利）



龙驭球先生

龙驭球先生逝世一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他，也回想起过去70年作为龙先生的学生和后来又一起从事教学、科研的一些感人故事。

我初识龙先生应追溯到1955年他教我们的结构力学课。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水利系结构力学课一直是由龙先生主讲，他讲课的特点是慢条斯理，句句精辟，没有半句多余的话。同学们刚开始觉得听他讲课不太带劲，但越听越觉得对力学原理分析透彻，十分精彩。期末考试是口试，进考场抽考题，约一个小时准备，把答案演算在活页纸上，面对老师对考题逐题作答。龙先生总是沉默寡言，一语不发，但当他露出一丝微笑时，就肯定是回答的有错、或不到位、或演算有误，因此同学考试时都怕龙先生出现笑脸。有一学期期末考试，是一道演算超静定刚架内力的题，我用了力法、能量法两种方法都得出了同一答案，龙先生从头到尾未说一声，也没有笑脸，拿起笔就在成绩册小本上记上5分，签上名字，我就离开了考场。龙先生对力学概念极其重视，例如讲虚功原理

这一基本概念，令我们在几十年后仍有深刻体会，这对后来学习和研究有限元变分方法极有助益。

1961年，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主修课之一的弹性力学也是由龙先生指导我自学、做题，最后通过考试。

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兵学员和老师们都编在一个专业里，我当时是专业主任，龙先生又从土木系调到我们的专业，给学员们主讲力学课。当时正是有限元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刚传入国内，我系还承担了援助阿尔巴尼亚菲尔泽水电站土石坝结构的应力分析任务，就想采用有限元方法计算。大家都对刚听说的有限单元法倍感新鲜，但又不知道是个什么方法，运用了什么原理，在计算机中如何实现。其实，这个方法自从1956年第一篇有限元文章出现，并由克拉夫教授于1960年正式命名为Finite element method（有限元法），在西方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当时在国内还是起步阶段。龙先生具有坚实的力学功底，我们专业又派出了一位年轻教师协助龙先生一起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去学习土石坝的分析计算，龙先生便开始钻研，编写出了有限元的教材讲义，用极其通俗的语言讲解了有限元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给老师同学们科普这一方法，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龙先生也是在我校普及这一方法最早的先行者之一，为后来广大师生学习推广该方法以及应用于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随后的几十年间，龙先生在有限单元法研究中继续攻坚克难、砥

□ 怀念师友

砺前行，对广义协调元和混合有限元方向不断创新，终在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算是实至名归。

1978年，我被选派为第一批留美学者之一，临行前，我向龙先生辞别，到他家求教，问他去了美国UC Berkeley那边学习研究什么问题，龙先生毫不犹豫地说，还是研究你的水坝抗震吧。就这一句话，让我在美两年时光里，跟随着克拉夫教授，夜以继日地学习了十多门研究生课程，完成了一篇水坝地震空穴研究的论文，由此

感到名师之见的重要性。

龙先生晚年搬到了荷清苑，我和他正好当了邻居，楼上楼下，每天看见龙先生坚持走路散步，尤其是在他生病以后，还坚持拄着拐杖傍晚在院里走路，他与疾病做斗争的坚韧品格令我敬佩感动。

龙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为人谦和谨慎、正直厚德，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为人学和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后辈纪念他、缅怀他，就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无私的奋斗者方澄

○任 重 冯钟潮（1959届机械） 钟学初

这是一位为国家兴盛终生奋斗的老人——方澄。

她的一生走过了99个年头。百年人生里，她见证了这个国家和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走向富强的历程。她在反对侵略、推翻旧世界、缔造新世界的斗争中成长，在她和同时代无数人的奋斗下，中国走向富强。

方澄出生于1924年12月22日，原名冯钟潜。她的父亲冯景兰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伯父冯友兰是中国著名哲学家，姑母冯沅君是中国著名文学家，人称“冯氏三杰”。母亲全珺师范毕业，当过老师，孩子由她亲手带，方澄从小就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熏陶，一直成绩优秀。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占领北平，北大、清华、南开先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时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



伏案工作的方澄学长

任的冯景兰，亲手销毁了学校转移带不走的地图、地质矿产资料，只身随校南迁。此时冯钟潜正上初二。次年找到机会，母亲和姐姐带着14岁的冯钟潜和九岁、七岁、一岁多的弟妹辗转香港、河内，到达昆明。这段经历对她后来选择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冯钟潜学业优秀，1938年，她进入南菁学校，在这里念完了初三和高中。南菁

学校由著名爱国将领、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在昆明创办，学校秉承“笃学、慎思、行端、履实”的校训，严谨治学，培养出大批栋梁英才。

冯钟潜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居里夫人。她喜欢探究事物的本质，想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物理学家。1942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那一届物理系仅招了十几名学生。

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师生们不得不“跑警报”到野外田间上课。但西南联大有最优秀的老师，学生也为了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从西南联大的师生中，走出了2位诺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5位院士，一大批人文社科大师。

在刻苦学习物理专业各门课程的同时，冯钟潜逐渐看到科学与技术不能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她认真寻找着解决问题的答案。她追求真理，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1945年参加了“民青”，194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不久，大批特务和军警闯入西南联大和云大等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白色恐怖没有吓住进步学生，一场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席卷全国。冯钟潜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1946年5月，冯钟潜因参加学生进步活动面临危险，党组织安排她立即撤出，之后的7月就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遇刺的事件。

冯钟潜将她原本的名字“冯钟潜”改成“方澄”，用化名先到上海后转淮安，



冯景兰教授

历时数月终于到了苏皖解放区。就这样，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冯钟潜变成了苏皖解放区的战士方澄。

方澄先后在苏皖鲁解放区新华社华中分社、报社工作，经历了战火考验。1949年随新华社从西柏坡进驻北京，此时家里人才知道，好几年没有音讯的冯钟潜是现在的方澄。方澄回北京后，大家本以为她会继续在新闻领域发展，出人预料的是，她响应国家召唤，放下新闻工作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3年，方澄离开新华社，先后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电子所、二机部九院。她在这三个单位所做的工作都是为研发核武器做准备。她工作的保密程度越来越高，工作地点越来越远、越来越荒凉。

1961年初，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原子弹的预研告一段落，领导要求在两年内掌握关键的技术原理，基本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核武器爆轰试验和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同步进行，实验核物理学家、后来的“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淦昌和实验部主任陈能宽负责爆轰试验。在长城脚下的试验场17号工地开始中国原子弹最初级、最艰难的爆轰的冷试验。

□ 怀念师友

试验场在荒郊野外，冬天里寒风刺骨，夏天里暴雨冰雹，起风就满天黄沙。住的是平房的大通铺，吃的就更困难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国家调拨物资全力支持研制工作，可国家面临严重的困难，定量的粮食不够吃，走路都觉得累，食堂用杨树叶做菜给大家吃。方澄是试验场唯一的女工程技术人员，她自己不管天寒地冻还是烈日炎炎都住在帐篷里。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爆轰试验没有延误，两年经过三千多次爆轰试验，依据试验数据，探寻原子弹内爆的规律，完善设计理论，和理论计算相互补充，结合原子弹武器化实战要求确定核装置的结构，做出原子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为了进行更接近原子弹实弹的测试，17号工地于1963年3月整体进驻新的试验场——青海221基地。方澄又“离家出走”了很多年，唯一不同的是留下了邮件地址：青海西宁221信箱。而在多年后，家人才知道她去了青海221厂。

221厂的爆轰试验场是升级版的17号工地，在王淦昌等领导的指挥下，方澄和试验部的科研人员又在这里进行了数千次的爆轰试验，他们用掩体里的各种实验设备，包括自行研制填补空白的仪器，记录测试弹体结构、爆炸材料及形状、产生中子数量等问题，为继续完善设计方案提供支持。

方澄在221核武基地担任试验部第9室副主任，兼任第6组组长，组里有50多名科研人员，负责核武器试验的核物理与放射电子学方面的工作，研发制造测量所需各类电子仪器，不仅做爆轰试验，还对核爆进行数据记录和测量。她的组员回忆方澄作为核电子学专家、部门负责人，智

慧、稳重，领导有方，是个极有个性的女强人。

多年后，221厂结束研制核武器，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才有机会到青海金银滩海晏的221厂参观。

代号221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占地1170平方公里，有18个分厂和其他配套机构，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出用于实战的核弹头。

前不久我们去221基地回来，给方澄看221厂拍的照片，她一张张慢慢地看，若有所思的样子。本以为她会讲些经历的事，没想到她看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去海晏了？好呀！我们当年就住过这样的房子，海晏海拔三千多米，总觉得憋气，冬天就算特别冷，窗户也要开条缝，全关上就透不上来气了。”

当年在221参与核武器研制有成千上万人，和方澄一样，大家都没有一张221厂的照片，更不会说221的事。“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1964年10月，祖国大西北升起蘑菇云，人们知道有群人靠着信仰的力量，打造出共和国的矛和盾，奠定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

到了1968、1969年，情况变化有些始料不及，方澄和221厂的不少人到了河南上蔡“五七”干校。

1974年至1989年，方澄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这是方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她的聪明才智、经验积累，在工作的最后15年里发挥了作用，她像在核基地工作时一样，把全身心都投入工作之中。

方澄任高能物理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研究生导师、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高能快电子学NIM系列”项目。她

亲自设计、领导完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中飞行时间探测器电子学NIM系统的研制，为高能物理研究和宇宙线实验做出了贡献。1991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她本人也在此重大项目中获奖。她曾被评为高能物理所先进工作者、8321工程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但她一贯低调，从不谈起这些。

方澄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成功不会趾高气扬，挫折不会灰心丧气，更不会丧失信念。凭方澄的能力，她本可以选择出国深造，在窗明几净的大楼里研究理论，当个教授或者研究员，发表高质量论文，功成名就。然而，她选择去解放区，选择隐姓埋名去核武器研制基地，选择维护国家利益。她说：“我从选择这条路的那天起就没考虑过这些。”她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方澄生活简朴，关心公益事业。20世纪90年代，她穿着50年代的衬衫走到街上，路人觉得式样别致，问：“您这衬衫在哪儿买的？”方澄不是一位不懂得美和时尚的人，她所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环境都



晚年的方澄学长

让她有很好的品味，但她心里根本不在乎这些。她保持简朴是为了做更多的事，仅希望工程，她就资助了安徽、江西两地农村近百名孩子上学。

1989年，方澄离休了，她一样拿得起放得下。她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把专业书籍、研究资料转给需要的人，离开了她工作15年的实验室。她轻装转入新“战场”，翻开了人生新的一章。

方澄兴趣广泛，学习能力超强。她喜欢旅行，去了很多原来没时间去的地方，她英语交流无障碍，在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很多地方深度游；国内的名山大川更是走了个遍，她最喜欢太行山的雄伟挺拔，去过很多次。她喜欢绘画，上绘画课，她不画梅兰竹菊，喜欢画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河，还去了不少名山大川写生。她喜欢唱歌，参加了老同学合唱团，曾在很多重要场合演出。她有语言天赋，英语很好，还一直想学好法语，离休后时间充裕，很快就把法语“捡”了回来。

方澄酷爱读书，她阅读量大，涉及领域宽泛。阅读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睡前阅读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2023年6月26日，方澄和往常一样，晚上10点躺在床上，打开床头灯，翻开一本书饶有兴致地读着。不曾想，她就这样看着书，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

方澄一身正气，为人至诚，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爱憎分明，生活简朴，热爱家人，忠诚国家民族，坚持原则，不争个人私利，不给人添麻烦，视艰难险阻为坦途，不知疲倦永远前行。她用一生诠释了“两弹一星”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

（转自“西南联大博物馆公众号”）

和徐瑜青老师一起调研的日子

○姜 朋（教）

经管学院会计系徐瑜青教授，因病于2023年11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徐瑜青，1945年4月出生，河北曲周人。1968年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后，曾在西安市供电局工作。1979年3月调入清华大学，参与了经济管理工程系的筹建工作。长期从事会计学领域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1997年晋升副教授，2004年晋升教授。201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瑜青教授在人才培养方面付出极大心力。1998—2008年，她一直担任本科毕业班班主任。两度荣获清华大学优秀班主任一等奖。她退而不休，从2005年起，连续多年带领学生开展农村社会调查。2014年被评为清华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她曾担任经管学院本科生社会实践首席顾问、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专家委员会委员。

2023年11月5日早上，看到徐瑜青老师去世的消息，有些回不过神来。明明不久前才读过介绍她7月份参加清华大学“银龄计划”去山东，到乡村振兴工作站指导学生社会实践的公号推文，明明教师节还和她通过微信……

结识徐老师，是因为带领学生去农村调研。徐老师很早就带领学生开展调研活动。她曾提到：“1986年暑期我曾带研究生、本科生赴甘肃进行过40多天的调研，兰州市周边及河西走廊已经去过了。”2005年，经管学院决定将“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暑期实践列入全院二年

级本科生的培养方案。那年6月底，学院组织165名二年级本科生赴甘肃省开展农村社会实践与调研活动。徐老师带队去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和碌曲县。“6月29日，由北京乘火车到兰州海拔1200米，7月1日从兰州到合作市海拔3000米左右，五天后到碌曲县海拔4000米左右……”那次，她得到了一个藏族名字“德吉措”，是“吉祥、海”的意思。

我是2005年9月才到清华工作报到的，因此没有赶上这次调研。而徐老师虽然在那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的名字却和农村调研、学生社会实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006至2008年，学院连续组织二年级本科生开展以农村金融为主题的暑期调研。接下来，2009至2011年，组织了农村医疗主题调研；2012年又进行了“农村金融发展及信息化”主题调研。这几次，徐



2006年7月，徐瑜青教授（右4）带领学生在甘肃定西调研

老师都全程参与其中。此外，徐老师还分别于2007年9月、2008年5月、2009年2月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福建省三明市、浙江省温州市和杭州市进行了补充调研。

在被聘为学院本科生社会实践首席顾问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中，先后于2016年暑期和2018年1月，带领学生赴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定陶区、曹县，调研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2006年7月中旬那次调研，我有幸跟着徐老师共带一个支队，前往甘肃省定西市。记得赴甘肃调研的三个支队在兰州分开后，徐老师和我带领学生先到定西，而后分开。徐老师率领第一分队在定西市安定区开展调研，然后前往通渭、陇西和漳县。我则带领第二分队去临洮、渭源、岷县，最后再到彰县和徐老师会合，经定西市市区返回兰州。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农村调研，也是单次走访的地方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从徐老师那里，近距离学到了很多。比如怎样和当地接洽人员、机构沟通，如何管理学生，安排组内分工，布置每晚的总结、行程结束时的总结，等等。点滴细节中，满是兼具对学生鼓励支持、启发指导和管理规范、约束匡正的实践智慧。

2008年6月底，我又有机会和徐老师同行。作为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研的三支支队的总负责人，徐老师先行去当地打前站，让我随学生乘大巴前往。记得那天司机在张家口附近下错了高速，不得已绕城走了很远的路，时间上颇为耽搁。车到太仆寺旗治所宝昌镇北端一座加油站休息时，徐老师打来电话询问。之后，大约每

隔一小时，我们会通话一次。那次，我作为留守，在锡林浩特市周边转。徐老师则不顾辛劳带队去了最远的东乌珠穆沁旗。

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本科生农村医疗调研，虽然和徐老师去的不是一个地方，但却仍有幸同车出行。2010年7月下旬那次，徐老师是赴宁夏自治区调研负责人，她带队在银川下火车，转往贺兰县，我们则继续前往中宁县。调研头几天，每当我因为开例会忘记按时向徐老师报告平安，她那边的电话就会打进来。那时的徐老师，身材微胖，精力充沛，说话时声音非常洪亮，中气十足。她爽朗的笑声，常能鼓舞每个人。学院同事对徐老师的采访报道中提到，徐老师读书时曾是学校的文体积极分子，嗓音极好。但任教后，有一次因病失声。为了能继续站在讲台上，她遵从医嘱，保护嗓子，把嗓子都用到教学上，而放弃了歌唱的爱好。

2011年6月下旬那次农村医疗调研，在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之后，我们在南宁先行下车，转去扶绥，徐老师则还要再走很久，才能抵达目的地云南大姚。

带着学生去农村进行调研，其实是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前期，教师要培训学生，与当地对接，联系协调行程；中间跟着走访农户和相关机构，随时处理各种突发问题，还要特别关注学生纪律和安全；回来后，又要总结、评比，撰写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但徐老师却乐此不疲。其间融注着她对这片土地、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热爱，浸润着她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体现着文章不写一字空的严谨治学态度，也饱含着她不计较个人名利、倾情投入关心学生成长的师者情怀。

由于调研的缘故，那时总有机会去徐

□ 怀念师友

老师在伟伦楼南侧的办公室。小小的房间被收拾得非常规整。靠墙矗立的书架，也许是由于防尘的考虑，被罩上了布帘。桌角放置了一叠从废弃的打印纸上裁下的纸边，用燕尾夹夹好，可以作为便签使用。

徐老师对调研资料的整理非常用心。她喜欢将资料打印出来按主题编辑、装订成册，翻检起来便利许多。记得去渭南调研那次，在徐老师那里看到了2005年学院组织去甘肃16县市调研时学生写就的笔记。这给我后续的研究带来很多帮助。

徐老师带领学生开展农村调研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她退休以后，既没有工作量的考核要求，也不会因此带来什么名或利的回报，甚至还曾自己掏钱为走访地区捐款。显然，徐老师是把农村调研当成了自己晚年最重要的事业来做的。疫情之前，她还计划着手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记得2018年底，在一次本科生社会实践讨论会上，徐老师提出希望我在来年初带领学生去广东调研某房地产扶贫项目。因为之前预排了学院里的培训课程，我当场就回绝了。话出口时就有些后悔，而后时间越久，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那次恐怕是让老人家失望了。

跟徐老师一起共事多年，听她谈得最多的，都是学生和调研。实际上，她家累极重。先生、女儿都需要有人照顾，但要强的徐老师却从来不提这些。徐老师住在南楼的时候，常能在校园里看到她推着那辆带大梁的自行车。车筐里、后座上的载物，显示是刚从超市或是食堂采买回来。后来徐老师搬到了双清苑，在校园里见她的机会少了，自行车也被购物拉车替代。她的声音依旧，身形却显消瘦……

刚看到徐老师今年7月份去山东指导

学生社会实践的报道时，还感慨于她老骥伏枥的精神样貌，然而不想，她竟会如此匆匆地离去。

冯雪峰曾说，有些人能让后来者“在前进的路上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背影”。把自己的足迹踏印在祖国大地上，把时间精力倾注于学生培养的徐瑜青教授，也是这样一位能让人抬头就看到背影的人。

徐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已经成为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终将成为永续激励后来者的力量源泉！

2023年11月23日

七绝·哭李强院长

○孙明君（教）

清河实验谁堪继，以善待人心乐天。
雪落无边幽寂夜，闻兄登假独黯然。

七律·痛悼李强老院长

○肖红缨（2012级博，教研院）

雪绽京华天地哀，西风何妒折英才。
强音振律琼林汇，正道传经玉树栽。
社稷倾心依涧壑，清河问计远尘埃。
如虹气势言犹在，万唤先生去再回。

七律·悼刘西拉老师

○安利群（1981级化工）

惊闻噩耗地天昏，犹记和颜对语温。
于国于团顶梁柱，亦师亦友少年魂。
西风拉瑟余音绕，东海轻歌快乐存。
厚德如山人敬仰，清芬万缕满乾坤。

清华选调生王卿逝世，年仅35岁



王卿校友

2023年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二级主任科员王卿同志，在南京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终年35岁。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个最灿烂的年纪，她用短暂的生命旅程，为大家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王卿，女，1988年11月出生，江苏泰兴人，2012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江苏省委选调生，2019年选调至省教育厅，在职业教育处工作。2023年11月，在省教育厅举办的青年干部走进玄武教育活动中，王卿同志曾动情地说：“在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期，我能躬逢其盛，作为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倍感骄傲和自豪，更心存感恩。”

王卿同志勤恳、要强，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事业都是打拼出来的。作为省教育厅的青年干部，我们更应先学一步，不断适应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以更高的层次和水平肩负起服务教育事业的重任。”她总是这样激励自己，为工作倾注蓬勃的热情和能量。初到职业教育

处，她一边认真工作，一边反复研读相关政策文件，研究职业教育领域的热难点问题，深入一线了解职业院校发展现状，快速熟悉情况。平时，她常热心地提醒同事们及时吃饭休息，自己却经常因为伏案工作、学习废寝忘食。2022年，她在兼顾处室工作的同时参与全省综合考核工作，有时一天需要到两个区市出差。期间，她对全省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和职业院校校情的熟悉程度，让工作组的同事们惊叹不已。在职业教育处四年，王卿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我省每一所职业院校，她都如数家珍；与她共事过的同事、朋友都被她的热情和拼劲深深感染。

王卿同志认真、奋进，投身事业能担重任。她的工作表现得到领导、同事的高度赞誉，曾获得省教育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连续三年在厅机关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在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过程中，她牵头负责我省职业院校的申报工作，不辞辛劳，在半年时间内连续组织4次申报院校线下集中培训和数次线上培训，有学校提出疑惑，她总能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做好服务，每所学校的专题网站和申报材料，她都一一仔细查看，有针对性地反馈修改信息，不遗余力地和学校一起修改打磨材料，跟进申报进度。几稿、十几稿……材料反复修改，深邃的夜空见证着她奋战的身影，工作群也经常闪动着她深夜的留言，有时凌晨归家，孩子已经睡熟。最终，在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中，我省获特等奖一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她说：“牵头负责教

□ 怀念师友

学成果奖申报期间，我付出了心血、劳动和感情，用心用情干事业，就要在省内将统筹工作发挥到极致，在全国呈现江苏职业教育的最佳风采。”

王卿同志善思、敢为，面对挑战勇于开拓。她博学多识，学习能力极强，江苏职业教育良好的发展基础为她施展才华、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四年来，她兼有开拓创新的胆识和踏实肯干的态度，在一个个挑战中尽全力推动我省职业教育向前发展。通过“双高计划”建设工作，她深入20余所建设单位一线，认真修订省属高校（高职类）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考核指标，给省内高职院校推动高质量发展更有力的指引。她深度参与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工作，在三市之间来回奔波，走学校、看项目，总能想出更有新意的点子，她先后选树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党建联盟、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学院等10个标杆项目，为全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单元的职业教育发展高地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她牵头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平台建设方案，不断进行跨省市统筹沟通，力促江苏吴江、上海青浦和浙江嘉善实现职业学校统一招生录取，为全国跨省域职业教育合作发展作出重要尝试，2020年8月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省域中职统一招生”为题，专门进行报道。

王卿同志细心、专注，处理事务精益求精。不管是办会、办事、办文，她都条理清晰、认真细致，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她习惯把事情做在前头，充分考虑每一类复杂多变的情况，用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落

实各项工作。今年4月，她开始负责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从通知下发前的政策调研，到自主申报、拟推荐项目材料准备，每一步都走得既坚定又踏实。“您放心，这个我们厅里统一办理。”“好了发给我，我们尽快走流程。”“感觉还没有改到位，本来假期想去北京看我先生的，我还是先把材料改好吧。”“有些格式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她认真研读教育部相关政策，反复与申报院校耐心细致地研讨拟推荐项目推荐书与支撑材料的每一处细节，总是积极热心地回复每一条工作消息，确保全部材料以最优状态上报教育部。今年9月，王卿的忘我付出又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教育部公布了28个全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我省不仅100%申报成功，且是唯一入选项目数达到3个的省份。

王卿同志的一生，是忠诚履职、敬业担当的一生，是感恩奋进、光辉灿烂的一生，她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王卿曾说：“我们要做信念坚定的明白人，我们要做真情投入的奉献者，我们要做见识广博的奋斗者。”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年轻干部应有的担当和付出，真正凸显了江苏教育人的本真和底色。她不是稍纵即逝、一闪而过的流星，更不是炽热燃烧后消散在空中的烟火，她是一棵深深扎根于教育事业的大树，在实践担当中深扎大地、延伸根系，用可贵的坚毅厚重了时光，用如盖的绿荫慰藉了我们。她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直面困难、永不服输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摘编自“方志江苏”公众号）

应用光学专家潘君骅院士逝世



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君骅研究员，因病于2023年12月18日在苏州逝世，享年94岁。

潘君骅，1930年10月出生上海市。1952年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前身）工作。1956至1960年，到苏联列宁格勒普尔科沃天文台学习，获副博士学位。1980年，调至南京天文仪器厂，主持

2.16米光电望远镜研制工作。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受聘于苏州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

2019年5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国际编号为21633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潘君骅星”。发现这颗“潘君骅星”的近地天体望远镜，正是由于他的技术支持才得以完成。潘君骅长期从事光学元件及仪器研制、加工和测试工作，在组织大口径光学工程项目实施、倡导非球面应用、推动光学检测技术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君骅学长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生前曾多次参加清华大学苏州校友会活动，与校友们分享他的科学人生，鼓励校友们拼搏奋进，发扬清华精神，为国家多做贡献。

张天泰老学长仙逝 享年100岁



张天泰老学长，因病于2024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张天泰，湖北省钟祥县人，1924年6月18日出生。1946年10月至1949年9月在清华大学学习，先在理学院物理系，后

转文学院哲学系。1947年12月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杨坤泉。曾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党支部书记、“南系”党总支委员、党总支宣传委员。

1949年9月调至北京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工作。1951年调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任干事，担任市委书记刘仁秘书至1966年。1957年至1966年6月，在北京市委研究室任组长。1977年在北京光电研究所任副所长。1978年至1979年借调至北京市委工作。1979年在北京市科委外事办任组长。1980年起，在北京计算机学院任副院长。1985年4月离休。

海南校友会原会长尹双增逝世



清华大学海南校友会原会长尹双增学长，因病于2024年1月5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0岁。

尹双增，1934年1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县，1957至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历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

海南大学校长、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为我国的水利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和科技交流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尹双增学长曾担任海南校友会会长多年，他积极为广大校友服务，在校友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月7日上午，尹双增老会长追悼会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尹双增老会长生前工作过单位的领导、同事、亲朋好友及清华校友五十余人前往悼念。海南校友会名誉会长林辉二，原会长尹炼、陈良刚，原常务副会长、海南大学原校长李建保等出席追悼会。追悼会上，海南省科协副主席徐伟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尹双增会长的一生，尹炼诵读别诗悼念。（海南校友会）

建筑声学专家徐亚英先生逝世

世界著名建筑声学专家、厅堂声学设计大师，原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1959届杰出校友徐亚英先生，因病于2023年12月6日在法国巴黎逝世，享年89岁。

徐亚英先生原籍苏州，1934年生于天津，1953—1959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9—1979年留校任教。1957年起徐先生专注于建筑声学，获声学专家马大猷教授及美国著名声学专家利欧·柏仁内克博士指导。徐先生曾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深度参与北京音乐厅、国家大剧院（初始方案）的声学设计和研究，后受邀赴法国 IRCAM（音乐声学研究所）从事音乐厅声学研究。1987年徐先生在巴黎成立 Xu-Acoustique 事务所，作为建筑声学顾问，

提供国际高规格表演场馆精密声学设计的解决方案，并于1995年和2004年分别获法国建筑科学院授予的“最佳技术顾问奖”及“建筑技术科研成就奖”。

徐亚英先生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为近百座文化演出和艺术展览性建筑进行了极为出色的声学设计，多次与获普立兹克奖的建筑师合作，代表作如：与法国建筑师波宗巴克合作的卢森堡爱乐音乐厅（1994年获奖，2005年建成）；与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合作的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改造（1983年获奖，1989年建成）；与美国建筑师法兰克·盖瑞合作的巴黎美国文化中心（1989年获奖，1994年建成）。

（建筑学院）

化学系离休教师何其盛逝世



何其盛老师，因病于2023年12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何其盛，1926年出生，江苏常州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校读书期间，何其盛师从张子高、高崇熙等教授学习化学类课程，同时还选修文法学院和工学院化工系的部分课程。1951年毕业后，先后在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工化系、化学系从事教学、管理、科研工作。曾任工化系教务科长，化学与化工系无机化学教研组副组长。在科研方

面，关注环境治理，废旧物资回收综合利用，在研究堆积如山的废马口铁处理中取得了回收锡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国内首创，得到部级科学进步三等奖。

何其盛老师1987年2月离休后，将精力集中到校史和化学系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化学系老校友的联络工作中，向海内外广大清华校友、在校清华学子介绍清华历史沿革、清华的人和事。如为《清华大学人物志》撰写张子高、高崇熙、曹本熹人物传等；在化学系举行成立60、70、8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参与筹备、撰写化学系史；在高崇熙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他积极参与联络老校友，邀请老校友回校参加纪念活动，编撰纪念文集。何添楼建成后，他积极联络化学系老校友捐资兴建高崇熙教授纪念铜像，并编撰纪念文集。

（化学系）

清华大学原副总务长裴全同志逝世



清华大学原副总务长裴全同志，因病于2024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裴全同志1930年7月生于北京市，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后在清华大学做一名学徒

工，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青年工人成立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新思想的启蒙。1952年被提拔为清华大学主管后勤管理的年青干部，历任出版科副科长、财务科科长、行政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总务长等职务，在清华大学的后勤伙食、住房保障、基础建设，培养提拔后勤干部，组建后勤队伍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9月光荣离休。裴全同志是清华后勤战线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同志，一生奉献清华的后勤事业，是清华工人中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成员。

高原既立望高峰

○万俊人(教)

2023年12月17日上午，纪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蒙民伟人文楼举行。本文是人文学院前院长万俊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聚会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对于清华大学复建文科并光复其综合性大学的身份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成立堪称一件标志性事件。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我参与了24年，占这一过程的近六分之五。我是1999年4月从北大转来清华的，记得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是同年秋天从中国人民大学转来的，起初，他负责复建社会学系，我负责复建哲学系，我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华重建学科春秋。令人痛惜的是，前几天他不幸离开了我们，我怀念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岁月。我们还能坚强地活着，只有继续努力，才是对他的最好怀念。

今天，我以一位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身份讲三句话，作为我个人的纪念。

第一句话，“三十而立”尚在高原，我们的目标应该始终定在“立的高峰甚至巅峰”。纪念“而立”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和筹划“而立”之后的事业。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年了，先祖有言“三十而立”，今天我们大致可以说，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不仅“立”起来了，而且已然“立”在高原，身位不低。在从开始文科复建到立足高原这一艰难的进程中，



万俊人老师课间回答同学提问

30年前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为清华复建文科的母体，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仅孵化出了清华其他多个文科院系，而且为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延揽了大量骨干人才，使得清华文科的复建从一开始便能够确立高起点、快速度、大模样，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纪念和庆贺的。但是，以清华大学的独特身份、社会各界和国家对清华的高远期待观之，身在高原还远远不够，百尺竿头必须更进一步，清华的文科必须勇立潮头，志在高峰，甚至敢登顶峰。这需要我们在好好回顾总结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当下和将来要走的路，以及如何才能尽快登顶，实现我们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我们在文科的学科建制、文科复建的基本目标和实际效果等方面都已达成、甚至超过了最初的规划预期，就像前面各位老领导和同仁们所说的，我们的文科已然进入国内高校文科的第一方阵。最近我看到

过一些材料和报道，学界也基本公认清华的文科整体上可位列全国前五、前六的位置，一些学科甚至已逼近全国前茅，这一估计也比较契合我个人的直觉。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满足，更不应有哪怕是些微的松懈。“行百里者半九十”谚语留给我们的警示是，纵然百里征途已然走过九十里，我们依然还在途中，更何况，我们的比照标准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一流或全国前茅，还应该比照国际前沿和世界一流。而且，最重要的还需要记住：前面的路要比走过的路艰难得多，越到后面，步履会越发沉重，风险和难度都会成倍加大。这是因为，从高原到高峰——更遑论登上顶峰——远比从平原到高原来得艰巨险峻，挑战更大，需要我们付出更高的智慧，怀有更强的意志和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一如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非平常者所能企及。必须记住，从高原向高峰甚或顶峰迈进的行程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陡坡攀登，直面更大的挑战，充满更大的风险，其难其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此止步则前功尽弃。古今中外，各行各业，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警惕。

第三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作为清华新文科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或者说，作为一位新清华人，24年的经历并不算长，但在我个人的学者生涯中也不算短。虽然从基层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仍然工作在教研本职工作的第一线，这样的处境让我想起父辈们常说的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当然，最好的状态



万俊人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是“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样说并不是常规表态，更不是客气，而是出自我真实的内心承诺，这是我24年前选择加入清华时就确定的承诺，加入清华后我的亲身感受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承诺。在此，我愿意分享两位老清华文科前辈给我的积极影响。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老前辈王玖兴先生。玖兴先生是解放初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德国回来的，他的身份特殊，是唯一听过20世纪德国、也是20世纪欧洲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家海德格尔讲课的中国哲学学者，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专家，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女婿还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女儿做过清华经管学院的教授。事实上，来清华之前我只知道王玖兴先生的大名，却从未敢打扰过他。可我来清华还不到十天，玖兴先生便约我面谈，还专门请我吃饭。这让我十分意外，更意外的是，玖兴先生席间跟我谈的唯一主题是如何办好清华哲学系。他告诉我，当年甫归，他便受清华哲学系创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之邀加入了清华哲学

□ 荷花池

系。他说，那时候的清华哲学系是全国最好的哲学系（另一位清华哲学前辈张申府先生也谈到过这一点）。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拒绝了金岳霖先生让他随其一起转入北大哲学系的邀请，宁愿闲赋在家也不转校，直到后来金岳霖先生再转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哲学所，他才重新“上岗”，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只效忠于一所大学。”坦率地说，王玖兴先生对老清华哲学系的这种忠诚和感情让我深受感动，也大大加深了我对清华哲学的认知和信念。

另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张岱年老先生。我在认真考虑清华邀请时曾经先后征求过四位北大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因为我实在缺少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动力离开北大。这四位老师和朋友是，我的恩师周辅成先生、我亲近而仰赖的张岱年先生、北大哲学的老主任朱德生先生和师兄陈来教授。恩师周先生自然不同意我离开北大，因为我是他十来位弟子中唯一留在他身边的，但他毕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师从国学院吴宓先生，所以也说“清华终

究还是个好去处”。朱德生先生则支持我来清华，理由是“或可提供一个不错的发挥新空间”。陈来学兄则十分慎重，让我给他一周时间“了解和判断”，一周后他给我的建议是“各有利弊，各有春秋”，由我自己抉择。待我问张岱年先生时，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说：“我当然支持你去清华，因为是我向清华推荐你的。”我怯怯地问他老人家：“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有些让我意外，大意是：他推荐的第一人选是他的得意高徒陈来教授，但最初因故未果。我是他推荐的第二人选，理由是，他认为复建即重建，时过境迁，复建的难度甚至不会小于创建，所以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发现延揽人才、组织和管理团队的能力，更需要性格开朗和心胸开阔的中青年人。起初，我自己也猜想，大概是因为岱老比较喜欢我心无城府又比较乐观的性情罢，所以高看我了。没想到，待我准备接受清华邀请并把这一决定当面告诉岱老时，他才最后说出一个特别的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是你们湖南人（金岳霖）创立的，你去复建清华哲学

系最好了。”我听后有些吃惊，问他老人家：“您咋不早说呢？”岱老回答说：“我不想一开始给你额外的压力，现在你有了决定，我说出来就没有顾虑了，或许还可以给你一



2023年11月14日，11位清华人文先贤雕像在蒙民伟人文楼落成

些信心和鼓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张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竟然成为了我在清华工作时常萦绕耳边的教言和精神动力。我想说，张先生和王先生两位老清华哲人的信任和教诲，是引导我迅速成为新清华学人并真心承诺这一身份天职的精神力量所在，至少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最后，我还想再多说一句，今天我们的纪念大会能够在崭新的蒙民伟人文楼里举行，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曾经

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老校长对大学精神的经典阐释，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然具有其强大而深远的生命力。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清华大学的不断壮大，大师和大楼已然可以兼得，人文学院能有先得大楼之幸，应该感谢学校对文科的厚爱和支持！在我的理解中，这座新楼也是今日清华“更人文”的见证和象征，我希望她也能够成为清华人文学科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新阶段之新起点。

诗意清华 诗意人

——《因为清华》创作自述

○吴鹤立（1983级力学）

“清华之所以是清华，所谓若何？”是我创作《因为清华》这首长诗的基本发问，全诗围绕这个出发点分为“感恩、学风、印象、文化、风物、情怀和同学”七个主题展开，共33章，也是我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章回体手法以一个清华学生的经历和感受，力求用文学的语言从一个清华

学生视角诠释“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清华”的落脚点。正如“一千个读者的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叫“因为清华”？或者什么是“所以清华”？我把答案留给了读者朋友，请您来回答：“为什么叫‘因为清华’，又为什么是‘所以清华’！”

从2015年夏天在成都杜甫草堂开始酝酿这首长诗至此次作家出版社再版，《因为清华》的创作历时已近八年。回想起这首长诗的创作历程，最让我感怀的还是2019年初在成书的第八稿时，妻子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猛然发现我的长诗通篇除了华丽的辞藻外，就是没有诗歌的意境。这，让我痛苦至极。为此，我愤然搁笔罢写，一直到2020年的夏天才再次提笔，期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后来我把这次对话的原型写进了我的诗歌，就成了“诗，不是写出来的”这句感慨的真实背景。



吴鹤立校友（左）在清华图书馆出席“作
者面对面”分享会后与主持人张秋老师合影

□ 荷花池

可能有人会问，你不过就是业余写写而已，至于这么痛苦吗？是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那种痛苦就是我能清楚地知道我写的不是诗，可我就是找不到诗的语言该怎么来表达！那些极尽形容的空洞字句，最不缺的就是信誓旦旦的表白和风景这边独好的浮夸，被我自嘲为一首不折不扣的“口水诗”，以至于我决绝地认为自己根本就不会写诗，并彻底放弃了这首长诗的创作。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确定我的那次断然地放弃是否与我的性格有关，但我能肯定与清华学风对我的感召有关。

2021年7月，我的长诗有幸入选“清华校友原创作品支持计划”，并作为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图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次出版后，曾有中学生读者朋友跟我说，读我的诗歌能帮助打开作文写作的思路；也有同学跟我说学习我的诗句表达能启发提炼作文的语句。对此，我感到欣慰、感到鼓舞。我想，很多时候“放弃”的确是很难的，可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能比“放弃”更简单？很多东西贵就贵在“坚持、坚持，再坚持一下”。我很庆幸我能够坚持下来，坚持完成了《因为清华》的创作，至少让越来越多的读者看到了“我们都有一颗奔腾的心，却总在寻找安宁”的人生旅程。

书香激扬青春，墨润因为清华。“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气质，一所学校也会有一所学校的气质。”这是我创作《因为清华》的第一个动因，也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创作初衷。随着对清华风物研读得越深、对清华生活廊回得越多、对清华精神思索得越久，我就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清华”两个字，不仅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种文化。

清华人，首先是人格的清华，然后是文化的清华。

作为一个在清华求学、深受清华文化熏陶的过来人，在我看来，那些枯燥的理工科知识恰恰是自然之秘泛着灵性的律动，这驱使我忍不住要以理工的思维，借助文学的触角来试说一下清华的工之美和清华的文之真。

清华的工之美，美就美在深远，那是“心有千重浪，门泊万里船”的气势；

清华的工之美，美就美在刚毅，那是“斩棘之处，执锐之人”的担当；

清华的工之美，美就美在执着，那是“百年一叶，同方一魂”的情怀。

“工，那顶天的一笔是从现在做起；那立地的一笔是从我做起；而脚下的那一笔，正好踩在这片土地历史的棱线上。”

清华的文之真是隽永的。那是荷塘月色下的寻声慢捻，那是“你是人间四月天”的轻声呼唤，有日出喷薄之动容，有雷雨滂沱之惊心。“堂上清风起，窗前林语纯”。那份文心，那份文润，那份无形就在于“诗意清华诗意人，采云枕藉在冰心。等闲不让东风度，自有灵犀已近春”。

不得不说，清华是催人奋进的清华，是“气高可揽九天月，直上云霄衍紫光”的清华；是“一院春风争化雨，百年足迹关山阅”的清华；是“仰天拔剑起，平地射天狼”的清华。

清华又是感人心怀的清华，是“书山有路千重雾，明月无声万里空”的清华；是“纵使高阳暖桃李，满园深树犹怯寒”的清华；是“德厚修为远，心渊出大家”的清华。

然而，清华更是令人回忆的清华，是

“千情不抵一情在，故园此处一楼拦”的清华；是“人生回首如相问，岁月无痕心有痕”的清华；是“人在水木境，日出万树霞”的清华。

如果您热爱清华，我想对您说：“清芬挺秀处，何患无少年。”

如果您关注清华，我想对您说：“为有长风真清色，不辞人间第一流。”

如果您向往清华，我想对您说：“人间多少事，亦梦亦相逢。”

如果您怀念清华，我想对您说：“柳岸烟波静，荷塘月色新。”

“若水不争木自华，一花开过一花发。学堂雅月声声慢，蛙语惊荷处处家”。清华，今生幸得有您，我爱清华！

“我们会记住别人说，素质，赢得成功。可我们自己还想说，气质，赢得人生。”窃以为与其说清华学生学有所成是因为拥有学习方法，莫如说是因为拥有学习的气质。只有会学习的人才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而那些不会学习的人，总在寻找别人的学习方法。有学习的气质，自然就

有学习的方法。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因为清华，一个烙印，背书一生”。可以说，这是我创作《因为清华》的另一个动因，也是我想传递的另外一个创作初衷。我真心地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借助我的诗歌和我一起走进清华，领略清华的风物，分享清华的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说《因为清华——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清华》“不仅仅是一本诗集，也不仅仅是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清华”的本源所在。

我们到底该用怎样的视线来审视我们的文化，也许有太多太多要说的，可我们做的，又有多少？位于清华图书馆地下一层的邳架轩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坚持不打折销售《因为清华》的书店，那份坚持如同我创作《因为清华》孤独地坚持了八年一样，正在孤独地坚持着。感恩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坚持，感恩所有和我一样坚持着的人，“因为有你同行，我们，才与时间为伍。”



《因为清华》新书发布暨“作者面对面”交流分享会，后排左7史宗恺、左8吴鹤立

“岁月，静好。同方，才是我们对岁月应有的回声。没有同方部的清华，正如没有清华的我”；“太阳落了，会再升起。枫叶红了，还会再绿”。不管是到过清华的人，还是没有到过清华的人，我愿有一天，“心清华，人清华”是我们各自对自己过往的岁月烤蓝。

注：文中的诗句摘自《因为清华》。

话说校花紫荆花

○姚 坚（1980级自动化）

作为清华校友，大家一定颇为熟悉学校的校色和校花。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校友们纷纷从各地返回母校，映入眼帘的是校庆日紫色和白色相互辉映的各种标识，再加上校庆前后盛开的紫荆花，整个校园都徜徉在紫色的海洋中。

有人说，紫色之于清华人有着特殊的情感，园子里那四时的风月花鸟，无不浸染着四季不变的那一抹颜色——清华紫。其实紫色和紫荆花在清华的渊源深厚，建校初期的英文校歌中，便这样唱道：

“O Tsing Hua, fair Tsing 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此时的清华，已经形成紫、白二色的校色文化。

1934级陶瀛孙学长在《清华校友通讯》复9期刊登的文章中写道：“春天的清华园是极美的，到处是花，而以紫荆、丁香开得最盛。”新竹清华大学的杨觉民教授曾述及，在来台建校前一般即“习惯把紫荆和丁香视为清华的校花，但未见诸典籍，可能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上述说法得到历史传承并最终得到学校章程确认，即2014年《清华大学章程》第六章第41条、第42条规定：学校校色为紫、白两色。校花为紫荆花（*Cercis chinensis*）及丁香花（紫丁香 *Syringa oblata*、白丁香 *Syringa oblata* Var. *alba*）。校庆日暨校友返校日为每年四月最后一个

星期日。

紫荆花作为清华校花，在春天里一簇簇绽放，开满校园的各个角落。紫荆是豆科属落叶乔木或灌木，其特性是先花后叶，茎条缀以紫红色的花簇，每到初春时节三四月紫荆花便两到十朵成一束，团团簇簇紧贴着树枝而开放，花团锦簇，呈现紫气东来、诸事吉祥之感。紫荆的叶子稍后生出，为心形嫩绿且略带淡淡紫色，紫荆的果实是豆科经典的扁长型荚果，里面包裹着2~6颗黑色的扁圆型种子，在八九月份成熟。紫荆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尤以北方地区为多。

紫荆花之所以成为口口相传的校花并最终得到学校章程的确认，相信首先是源自早年清华的校旗校色。据载1916年秋，清华学校为增强学生体魄，加强锻炼，成立兵操训练营，但尚缺少一面军旗。1916年12月28日《清华周刊》的消息称：“兵操军旗式现已绘定。旗系紫色，中间置白



紫荆花

色圆圈，内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可见早年清华校旗即由紫白两色组成。

闻一多是1913年秋天正式入学的，属于清华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之一，他在现代诗《园内》中颂扬校旗时写道“飘呀！紫白参半的旗呀，化作云气飘摇着！白云扶着紫气呀！”诗中还对园子的历史做了回溯，也表现了对“园内”新的生命的感情，将它们描绘为“瑞芝”，“紫的灵芝，白的灵芝，妆点了神秘的芜园”。

另一种说法与1916年除夕在清华上演的一出剧目有关，当年闻一多所在的中等科曾报名参加了校内的戏剧展演比赛，以《紫荆魂》为中文名演出莎士比亚戏剧 *Much Ado about Nothing*，并最终获得优胜奖。剧的内容与赞颂紫荆的品性有关，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在校友眼中，紫荆花作为校花，还有以下象征意义。

一是校友间的亲密团结。紫荆作为校花在春天校庆日前后盛开并一簇簇群放，象征着清华同学和校友之间亲密相处，共发芬芳。紫荆是成簇开花的，在开花的时候整个枝条密密麻麻百朵簇生，十几枚单花簇生为一朵花团，几十朵花团装点成一束花枝，成百上千束花枝凝聚成一株高大雄伟的紫荆树。校友们回校拍照时，也多以多枝花朵茂密的紫荆作为背景和群体构图，以紫色的烂漫霞光为自豪。这正是清华教给每个毕业生需要坚守的信念，个人的发展与成绩来源于集体的团结和支撑。紫荆代表了一种“团结”与“和谐”，众志成城，积极向上，奋发进取，风雨与共。

二是中西合璧的校园文化。清华在建校之初秉承的建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而紫色是红蓝相调的结果，红色象

征中国，蓝色代表海洋，而紫色对清华大学而言也就意味着中西合璧、融汇贯通，是开风气之先、博采众长。大家熟知清华早期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但即使在那时，建立中国自己的大学、培养国家建设栋梁的使命，也一直是前辈学长们思考和奋斗的主题。1928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科转为国立清华大学，面对内外时局罗家伦校长表示，“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

三是借以思念故园与师友。紫荆花一直是人们寄托对故土和亲情思念的指代物。唐代诗人杜甫在《得舍弟消息》一诗中开篇就写到紫荆，“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以抒发“骨肉恩书重，漂泊难相遇”之叹。由于早期清华的绝大多数学生要派出留洋，多数同学在离开校园后还要离开故国，因而乡愁之恋尤其深重。早期清华人的这种经历和思绪，也借紫荆花的寓意将对母校和家国的思念加以寄托和传递。

四是敢为天下先的品格。紫荆在校庆日前后盛开，它开花时北方大地还是一片枯黄，多数阔叶乔木都还没有生叶发芽，而紫荆生物学特性先花后叶，早早给清华园带来了春的气息。徐葆耕老师曾在《紫荆解颐》一文中写道：“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但紫荆花还是很准时地返回清华园，迎着凛冽的寒风开放了。她同我们一起守候这最后的寒冷，迎接温暖的人间四月天。”

五是紫荆花还寄托了对“人文日新”清华文化的传承。以我校师生完成的“两

□ 荷花池

弹一星”重点项目——“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项目为故事原型创作的五幕话剧取名《紫荆花开》，在建校90周年演出取得极大成功。以紫荆花命名的各种标识和符号在校园内外接续传承。在入学通知书紫色的信封上，印有紫荆花簇拥着清华二校门；毕业典礼上同学们身着的新版学位服主色也是校色“清华紫”。校内有紫荆公寓、紫荆操场、紫荆食堂，校外有校友紫荆跑团、校友紫荆读书会等各种联谊组织，让众多校友在毕业后延续光大着清华托付给他们的理想与信念。作

为校色的紫色和作为校花的紫荆花，已经融入到一代又一代毕业生的血液中。正如1930级季羨林先生在《清华颂》中写的：

“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1000多年以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紫荆花，映衬着紫色的悠扬，值得清华人永远铭记的校花。

记忆微光中的大礼堂

○杨蓉（1988级汽车）

每次听见《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我都会有片刻恍惚，仿佛回到了清华礼堂。三十年过去，许多往事都渐渐褪色，只有星星点点的记忆像微光，依然照亮我的人生。

1988年上清华，在这个中西合璧的美丽校园，我第一次见到了蓝天下，砖红色的大礼堂，圆形穹顶，白色石柱，前面是绿色的大草坪。清华学子在这里开启梦想，也在这里挥洒艺术的才华。

演讲

校长、嘉宾和学生在这里演讲。印象最深的有几个，一次是校长张孝文说：“有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这句话对我这样敏感多思的人是有用的，在后来的人生中时时想

起。另一次是钱三强的演讲，里面有一段在美国实验室吹玻璃的往事，听完留下了一个印象：科学研究的光环之下，需要无数单调和平淡的时光，需要真正的热爱和坚持才能走下去。还有毕业生代表左涛的讲话，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他和陈崇军是



大礼堂前，左起：汽8侯杰、王德新、张丽珍、杨蓉、宋萍、汽9宋红

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感慨，从贫穷的四川小城出发，只要我们努力，也可以在这所顶尖大学有一席之地。

艺术圣地

到清华，第一个感慨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无论你喜欢什么，都有人可以作你的老师，从十几岁学子到白发教授，每天各种思辨讨论。各大社团人才辈出。无论你喜欢的是原子物理，还是道教佛学、文学艺术、武术太极……喜欢体育的，这里有奥运冠军；喜欢健美的，北京市健美先生是你的学长；喜欢诗歌的，有一群诗人陪你朗诵海子的诗。如果喜欢唱歌跳舞音乐的，大礼堂会是你的圣地。

几乎所有的演出都在大礼堂。最受欢迎的是每年一次的校园歌手大奖赛，可谓一票难求。因为我们宿舍有歌手侯杰，每次都能幸运地拿到亲友票，欣赏到最精彩的演出。许多演员的名字和表演的节目大都遗忘了，但记得吉他伴奏Sound of Silence悠扬的和声，蒙着眼睛唱《一块红布》的压抑和激昂，还有一些堪比专业的献唱。每次侯杰都选好了歌，认真准备，每天练习，结果经常到比赛的时候，嗓子疲劳出了状况。我坐在下面，紧张地听她的演唱，第一次体会了粉丝为偶像现场应援的患得患失。后来清华最出名的校园歌手是李健，我女儿都能唱他的《传奇》。

大礼堂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最令人惊艳的是杨丽萍的《雀之灵》，如仙如魅，不似真人。后来看过拉斯维加斯和百老汇的许多绚丽歌舞，清华礼堂那个简单舞台上的孔雀舞，依然是我记忆中最美丽的舞蹈。



1996年，杨蓉（左）回校游玩，借了国标队的裙子和赵阳（1992级精仪）合影

参与的舞台

我自己第一次参加的演出，是我们班新生合唱《血染的风采》，张丽珍和吴为民朗诵，侯杰、吴大军、王德新、罗瑞锋等一人一句领唱，然后全班合唱。侯杰独唱了《掌声响起来》，这次演出发现我们班人才济济。

一直怯于舞台的我，在这里也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舞台梦。在我编舞《望天》和《雪在烧》的过程中，侯杰、张丽珍、王德新一直给我鼓励：“你可以”，让我能坚持下去。《雪在烧》需要男生，我到宿舍让他们一个一个学动作，然后选人，从来没有跳过舞的男生们，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学习，一板一眼地做动作，落选了也绝无怨言。选好后大家一起排练，舞蹈队的况维也来帮我们示范动作。我还曾经参加过热汽系的健美操队，和空八、内八的女生一起去北京体育学院学习。然后我们在大礼堂的舞台上随着音乐蹦蹦跳跳，活力满满。

后来我鼓起勇气参加了舞蹈队，虽然韧带很差，下不去腰，每次看见其他队友完美的舞姿暗暗自卑。张丽珍在宿舍帮我压腿，我疼得全身颤抖，最后也还是差强

□ 荷花池

人意。有幸在舞蹈队的专场演出中和其他队友一起跳了俄罗斯舞和孔雀舞，孔雀舞的服装还是从东方歌舞团借来的，演出永远让人紧张而兴奋。还记得那次男生们表演了Michael Jackson的*Beat it*，场下一片尖叫。

电影

那时候，大礼堂偶尔会在周末上映电影。片子不多，所以会重复放映一些老电影。几乎每年我都会去看《罗马假日》和《魂断蓝桥》。格里高利·派克英俊潇洒，奥黛丽·赫本清丽无双。后来我和先生去了罗马，站在The Colosseum门前，想起他们曾经在1950年代骑车走过那个路口，不由感慨“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那样的美人，也只留下影像供人赞叹。

《魂断蓝桥》也是黑白片。几十年过去，我还能想起费雯丽美丽的眼睛，在那张像瓷器一样精美的脸上，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中，蓄满泪水的眼睛，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脆弱感，悲剧就是把最

美的事物摧毁给你看。后来看了《飘》，我才知道她有一双绿色的像猫一样的眼睛。每次看完《魂断蓝桥》，《友谊地久天长》的歌声都会反反复复在我耳边回荡。

大草坪

夏日的夜晚，我们班的同学会相约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席地而坐，随意闲聊，一起唱歌，从《北方的狼》《恋曲一九九零》到《一场游戏一场梦》。草坪上有情侣在轻声密语，有校园歌手在边弹边唱。弹唱应该算清华的一道风景线，多年以后，我的密友说，她曾经从北大骑车，路过清华大礼堂，夕阳下，看见一位少年独自坐在草地上，信手弹奏吉他，自在地歌唱。她怦然心动，推着车慢慢走过，没敢上去打扰。

友谊地久天长

时时从各种节目里听到《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都会有刹那的恍惚，仿佛又回到大礼堂。在明暗光影间，坐在那里，

跟朋友一起看《魂断蓝桥》电影；跟同学一起看校园歌手大奖赛；或者跟31个同班同学一起，身披学士服，头戴学士帽，齐齐整整在礼堂前照毕业留念。那一一张张年轻的容颜，因为告别而含泪的双眼。此后一别经年，同学散落在世界各地，偶尔聚会喝一杯酒，倾诉红尘里各自的悲欢。如今三十年过去，申剑同学成了陪伴我们的一颗星，人生短暂，只有那些记忆中的微光，依然给我们温暖。



汽81毕业留影

● 桑榆春晖

“银发导游”徐孝蔚：用热爱传承历史与文化

戴着黑框眼镜、拿着自制的“手卡”、指着杜甫草堂内的楹联……日前，一位白发苍苍却神采奕奕的老人带着自制的“手卡”在杜甫草堂内向大家讲解。一路走，一路讲，听讲解的队伍也从最初的10人变成了30余人。这位老人便是成都旅游行业著名的“网红”——“银发导游”徐孝蔚。

今年87岁的徐孝蔚曾是一名电力职工，63岁那年他考取了导游证，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并很快打响了“银发导游”的名号，在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这些知名景点时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喜欢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听到有些导游的讲解比较浅层次，心想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导游。”回忆起考导游证的经历，徐孝蔚表示，自己能一次性通过导游考试胜在掌握了基础知识。

徐孝蔚口中的“基础知识”一词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却是涵盖了建筑文化、饮

食文化、宗教文化等传统文化知识。“考导游证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想为大家多做服务。”徐孝蔚表示，自己1959年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时，清华大学的校长对他们提出的寄语中包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参加工作以来，徐孝蔚就到了基层从事电力工作。而在他看来，工作只有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因此他在退休后，选择了继续发挥余热。“在导游工作上发挥余热，也是我为旅游事业尽自己一点力量。”徐孝蔚表示。

因为年龄原因，徐孝蔚更多的是为身边人以及需要的部门做义务讲解。不仅如此，徐孝蔚还参加原四川省旅游局组织的导游词编写及旅行社内新导游的培训讲课。徐孝蔚第一次讲解的时候，便围满了人。“当时很有成就感，还有很多人在听我讲解完后和我合影。”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孝蔚表示，这代表了大家的认可。如今，徐孝蔚的讲解大概服务了1500余人次。

在杜甫草堂两个小时的讲解里，徐孝蔚深入浅出、古今结合的讲解引得听众掌声连连。从上海来的游客顾嘉会在杜甫草堂入口处听到徐孝蔚的讲解后便跟了一路。“他不是为讲而讲，融合了很多他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所以能听到丰富的文化背后的故事。”顾嘉会表示，“他整理的笔记内容非常丰富，能让我们了解到很多平时不知道的知识。”



徐孝蔚讲解杜甫草堂

□ 荷花池

徐孝蔚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珍藏着已经泛黄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旅游影集。两张地图上清晰地标注着他每次出行的时间、线路、到访景点，影集里保存着他每次出行的门票、照片、明信片等。“在去之前我要搜集资料，规划好线路，做好准备，回来之后，要做好总结。”徐孝蔚表示，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数十年来，徐孝蔚搜集了很多文化旅游及历史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我对历史

文化比较感兴趣，能够和大家分享，并且得到大家的认可我是非常高兴的。”徐孝蔚希望自己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知识分享给更多人。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旅游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活得越来越年轻。”徐孝蔚表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自己会一直坚持义务讲解，继续传承中华历史与文化。

（转自中国新闻网，2023年11月22日）

● 诗词书画

七绝·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建院卅周年感怀

○万俊人（教）

而立年勤何所立，高峰在望待云梯。
前程漫漫其修远，试步崔公旧韵题。

七绝·奉和万兄俊人院长

○孙明君（教）

昔岁青矜今白首，卅年自疚为人梯。
星移斗转流光逝，照野韶华待品题。

清平乐一首

○王廷军（1979级机械）

几声春晓，
窗外呼晴鸟，
枝上新芽和露小，
一夕天涯芳草。

荷塘同学少年，
如今两鬓微斑。
回首如烟往事，
依然心在天山。

毕业四十年忆清华

○杨宝林（1979级电机）

回首向来四十年，千般春色寄从前。
青衫有梦书塘月，学子无忧画柳烟。
载物情生因水木，厚德心笃赖名贤。
常青藤下繁花竞，岁岁新枝展校园。

浪淘沙·雪后游园

○谷焕成（一九八三级自动化）

瑞雪早春前，
昨夜翩然。
琼花玉树绽娇妍。
老馆新斋皆走访，
痴醉流连。

华发忆当年，
岁月阑珊。
荷塘月夜梦缠绵。
载物厚德犹谨记，
行胜于言。

七律·睹同学视频介绍母校风光

○张 强（1988级电机）

一别名园几度秋？得君重续旧时游。也随琼雪回荒岛，长忆春风到主楼。
往事前贤堪畅想，新生后进未须愁。初啼已是足惊艳，来日相期更上流。

七律·毕业五十年重逢

○孙世明（1970级机械）

春晖四月满清华，柳绿桃红处处花。
五十经年怀旧梦，七旬如愿再回家。
荷塘月色印潭水，理教湖光泛彩霞。
好景常新春不老，余将残岁种桑麻。

清华园梦境

○黄 强（1993级硕，自动化）

紫荆团簇 银杏堆黄 荷花满塘
木窗斑驳 绿藤萦绕 风拂书香
飞掠九天 无限星光 心驰神往
紫光电闪 绿野寻幽 博采众长

水木结缘

——庆祝建校 113 周年

○王东光（1970届工物）

题名金榜写新篇，神秘清华在眼前。
顶顶师生交益友，青青水木结良缘。
卷开邨架上千本，钟响闻亭历五年。
岁月悠悠慈母念，紫荆桃李是常谈。

七绝·清华人文社科三十年

○刘 石（教）

擎云自是少年事，伐木固甘旁作梯。
易逝光阴休叹怅，宏图再绘觅新题。

七绝·清华人文先贤群雕落成典礼

○孙明君（教）

风流绝代耀青史，天降群贤聚国华。
昨夜星辰今夜炽，前瞻征路灿朝霞。

注：11位人文先贤：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赵元任、吴宓、朱自清、闻一多、蒋廷黻、
雷海宗、金岳霖、冯友兰。



厚德载物



龙行四海

篆刻

○陈森根（一九七〇届自控）

2023年校友奖学金、励学金获奖者名单

梅贻琦纪念奖学金（研究生12名）

周宇轩 樊双赫 苏铂焯 孙文静 翟诺
杨嘉俊 张世铎 孙琬琰 岳海涛 李光宇
詹佳欣 李悦欣

“一二·九”奖学金（15名）

郝悦延 王子丁 李智毅 王熠晨 罗雨琪
张煦蓬 江浩月 谭雄升 翁汇坤 颜子越
吴可天 应文昱 王潇雨 朱颖雷 丁恺睿

“一二·九”辅导员奖（114名）

岳楷键 陈磊 祁文智 黄毅杰 侯军渝
王天浩 陈一鹤 唐海景 盛裕杰 荆峥
王薛涵 耿威 张金涛 陈奕凡 齐纪
崔天睿 党张弛 周要洪 郝以昇 白一铭
郭润涛 郭瑞程 何睿林 刘畅 谢添乐
黄泰榕 王帅 张洪汇 王尧 兰天
朱润泽 陆澳 王煊智 刘远瑞 谢杨
夏腾溪 张泽阳 葛春江 汪泉伟 徐一凯
朱昊然 亓弘毅 奎海云 韦力瑄 陈栋林
朱子阳 王浩瑜 闻陈宝 邹宇辉 秦德通
宋亚豪 闫雯荻 阎世宏 胡泓 于鹏宇
任钰成 朱志铭 胡啸 杨晨曦 郭壮
王睿 胡旺 吴海旭 张小健 李清阳
黄一洋 王金瑞 康振宇 姜竣凯 王哲
梅子麒 侯涵译 高祥 石方正 程赞
黄悦峰 施华杰 王朝阳 经求是 李雨欣
马洪彪 徐逍遥 赵博元 刘振荣 俞逆思
索靖东 吴志镛 魏小源 苗培壮 张瑞瑜
徐宝宁 赵金瀚 林浩 黄晨阳 程泽堃
韩炳铮 薛阳 李子威 孙宇航 杨一宁
赵宇鹏 张湍 游凯超 张双铭 杨韞加
张彭城 刘雪天 公瑾 尚宇飞 王炳瑞
刘宇尘 魏鑫森 俞舒扬 赵泽群

“一二·九”辅导员郭明秋奖（47名）

刘鹏 吴奕 周心怡 胡诗若 刘英洁
曹育玮 赵楚宣 田欣 朱艺航 刘胜楠
赵静 李海宁 许娅威 杜纾岷 马文星
宋恬恬 周家玥 宋晨曦 姚汶汐 付常芸
王婧懿 孙叶 翟紫含 江雪颖 安馨
陈雨晴 刘好 黄秋杰 杨慧超 黄潇萱

谭彭丞 曾哲妮 陈雨轩 张红宇 蒋辉
李德光 楼闻佳 李佳持 王宇 刘柳
马梦珂 邹海萍 钟玉晨 张天宁 王心怡
石宇希 欧阳子路

“一二·九”学生事务工作助理奖（20名）

高媛 张超娜 张立彦 赵玲 李喆
周思彤 杜娟 郭冰敏 高蕾 刘建伟
崔丽 周启明 于毅 宋壮壮 任超然
段明英 徐雅楠 张宇民 徐璠璠 郭章碧

蒋南翔奖学金（40名）

韦紫荷 陈培尧 银伯彦 金振宇 许汉译
刘钟书 卓昱杭 林禹含 戢怡泉 杨焜棋
陈伯驹 王向阳 陈辰 张喆 蒲佳奕
张恺南 王一鸣 靳增晖 李正晗 崔璨
李昊恩 赵靖涵 史睿哲 曾子青 丁浩威
李箫航 刘晗 廉玟 王越 于子予
穆俊成 钟天宇 周禹 王一竣 严雯乐
潘弈成 陆奕捷 李子曦 宋宪文 李与涵

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199名）

本科生149名

崔卓迹 阎鸣 厉海川 杨明繁 张恩熙
熊一惠 项阳 戴蕾 葛欣然 冯思源
周翔 杨一 崔继鑫 陈铭炜 赵凌杰
张毅 赵威 苏博文 王麒英 高希钢
何秉翔 李轶凡 董心知 汪润 任冠贤
金成秀 唐博宇 马昱凝 李腾飞 李海刚
张芑 罗稀晟 高众钦 谢旻骏 郭欣婷
常成 刘昱彤 乔奇临 翁颢洋 张艺茗
宋思睿 唐雨珂 孟思嘉 赵徐婧 刘云姮
朱俐 朱文杭 李祥铭 谢雨青 林宗翰
金子峻 黄锦涛 左捷瑞 栾怡 韩悦姣
郭逸凡 林诗贻 王钰 李彦全 苏美诗
李欣娜 范静怡 吴奕萱 孔垂等 王钟毓
张宇轩 葛宇琛 聂楷芸 王海成 李小舟
许萱铭 王飒 张旭冉 杨清尧 许诺
张亦宁 洪鑫磊 郎佳钰 石孟鑫 张樵风
杨佳玥 陈婷媛 李静宜 张瑞雯 王辰玥
刘一墨 何正逸 龚文哲 杨涵友 王瑞乾

阙铭溟 王舒可 曹一民 陈 诺 薛思源
罗皓文 谢佳芮 王一芮 孙 畅 张健以
张逸尘 桂雨谦 万瑞东 谢睿奇 宋翊麟
马诗瑜 左 晓 王怡昊 张馨月 许钰羚
吴玥萱 苏方怡 吴骐羽 魏颖璇 柯雅芳
刘骐源 武泽英 唐轩林 李嘉熠 汪梓玉
陈怡希 窦雨辰 顾子轩 程 然 宋昊天
宋柏廷 姜佳楮 颜倥晨 王子航 王 谛
王涵璐 冯冠杰 胡 磊 申家兴 顾佳瑜
张心语 刘子宸 郭逸凡 衡 星 牛艺琳
杨启帆 吴俊昱 彭欣然 简 铭 曹翔宇
付丰硕 陈禹泽 李静莹 张海明月

研究生50名

李西泠 唐淑臣 孟红艳 黎森予 李定坤
牛志恒 张媛媛 傅京桂 黄 味 孙雨芊
刘紫微 邵红红 李卓卓 陈曦笛 王 牧
陶禹行 刘子琨 虞 涵 汤鸿杰 张小雪
谭心莹 徐皓月 俞雅芸 刘长宇 王金鹏
李 彬 王叶伟 韩翌昉 王雨洋 郭 壮
车宗凯 郝 鑫 冯瑞玲 李俊杰 马珏丹
孟一昆 王家铭 朱 奥 魏 冰 赵泽群
孙弋韩 王晓昕 周鸣钟 艾海林 常 欣
李 享 肖 桐 杨 佳 浦一凡 高扩丰

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自强专项 (126名)

梅 凡 周煜川 于择洋 段材成 张泽淼
任万萌 李 宁 邹钱朋 魏浩楠 肖博洋
李 科 袁朝越 周舒磊 李 波 徐新元
鱼 娴 高洪滨 范佳杰 姜俊宁 陈 鹏
邓 禹 魏俊涛 吕晓勇 吴俊东 刘 渺
张 钧 刘正辉 张磊旺 李卓桓 董子严
郭胜文 曾庆权 胡豪特 余杨诚 何毓飞
盛尚运 时嗣豪 王家晨 王若为 王赫玮
王景华 谭桂江 李天亮 王兆晨 宋昊远
王星华 兰新亮 高 聪 陈俊参 曹世坤
翟廷逸 何雪晴 葛宇豪 王 超 黄 淳
岳慧敏 马赛赛 陈 实 张海舰 刘宇辉
余嘉震 蔡明伟 吴定阳 王圳溪 陈弘轩
徐 踏 陈书洋 李薇妮 余朝昊 杨斯涵
谢柯伟 郑世杰 张 硕 李秀成 任仲齐
陈 伟 黄实尧 葛舒琪 杜铭泽 岳涛旭
孙烨清 赵建国 龙 烨 吴雨凡 吴伟超
石 洋 党运哲 毕超亿 刘钧杰 曾申翔
李家磊 冉 青 王喜贺 冯思宇 石恒睿

吕 浩 张博文 段安升 陈 宇 刘 翔
方 适 任渝霖 李秉璋 周建勋 李天一
徐 正 李 鑫 石世鹏 袁 鹏 黎 卓
周恒屹 方宇杰 王 雨 张林强 范佳豪
罗 浩 王腾岳 王祎政 汤道强 宋佳凝
徐 涛 漆书圻 杨林凯 杜 浩 刘钟燕
李宜伦

马祖圣学长纪念助学金 (20名)

侯 疆 郭绍锦 肖裕杰 张培卓 李文海
李航洲 姚 乐 李岷洲 龙忠相 周 琦
程润松 刘栩颖 李金东 李贤玲 吴子祎
俞炜臻 刘 勇 闫 霖 蒙昌鸿 鲁上上

周治春青年教师奖 (6名)

许淑文 李 波 田奇乐 高 全 曹振水
周小菁

赵元任纪念奖学金 (15名)

栾镜涵 李婧帆 卢一飞 李若彤 辛 元
李佳怡 冯雨婷 彭百骏 孙艺淼 舒 梦
李举创 温 晋 刘 璇 戴 蕾 邱泽霄

黄荫普夫妇纪念奖学金 (5名)

刘迪波 张振华 王正茂 尹子岳 万 炜

清华校友—王补宣院士奖学金 (12名)

龚 雪 韦恩婧 李 督 王恩勃 高成善
何英杰 林 敏 代丽玉 辛永琳 黄云帆
刘智珂 刘贺心

清华校友—过增元奖学励学基金 (15名)

王世彪 唐 睿 周 洲 林晓风 贾志浩
张时语 覃思博 王雄师 王若冰 陈柏松
陈 亮 刘 洋 李沫潼 孙清晗 张晓宇

清华之友—五粮液科技久久奖学金 (9名)

黄书画 杨晗婧 粟稚媛 胡钧再 邱恒骏
刘丛语 许熙桐 韩一博 赵钰婷

清华校友—李衍达励学基金 (8名)

李子贤 庄荣津 高晨心 张国勋 严 涛
何子敏 陈晓阳 赵志锋

汤言英奖学金 (4名)

侯奕菲 金建求 杨云猛 刘若妍

清华校友—谢希仁励学基金 (1名)

王卓然

清华校友—王啓无、友人张胜述奖学金(2名)

张凌宇 冯岳珂

西南联大采奖学金(5名清华大学学生)

卜凡 阎颖超 吴永涛 李若菲 黄京磊

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励学基金(6名)

熊一惠 刘庆泽 樊皓冉 李伟江 杨晓庆
郝庆安

清华校友—1949级励学基金(3名)

李江涛 徐梓博 彭捷

清华校友—张思敬励学基金(8名)

邱云涛 杨竞博 张泉滔 徐勇 胡安康
龚自豪 俞登辉 熊一惠

清华校友—谷兆祺励学基金(22名)

叶哲 郭凯博 葛志璿 刘广鹤 李士猛
安洋 邱云涛 景子洋 王自清 王家浩
张泉滔 任克学 朱文静 李伟鑫 段卫湘
塔金福 贾劲楷 陈亿 赵福涛 王晨阳
林显粮 仁增曲桑

清华校友—傅任敢励学基金(1名) 冉智

清华校友—杨友龙、何肇琛伉俪励学基金(16名)

申青临 杨晨 卢胤赢 杨景雪 马函
王宏光 王庆凯 张乔森 姜航 向胡西
成会忠 黄硕宇 张鹏飞 王田杨 赵一德
徐辉

清华校友—董文华程娴励学基金(11名)

柴跃祥 聂海洋 刘远志 郭志斌 臧一鸣
王晨阳 孙林 罗子轩 张智森 王稷东
陈顺源

清华校友励学金(陈立基、陈英涛、陈拜秋)(14名)

申广辉 冯佳欣 林昊 李甜甜 韦旖珏
范功尧 郑如意 陈得瑞 吴子祎 李文海
党杰 邓佐贤 史园博 周振雨

清华校友—黄圣伦励学基金(3名)

姚乐 彭荣鑫 何林亮

清华校友—张慕萍潘敏贞励学基金(3名)

黄博 郭家豪 廖卓然

清华校友—德强骥金励学基金(3名)

胡安康 梁庆财 梅凡

清华校友—陈大白励学金(3名)

李贤玲 冯子硕 赵佳伟

清华校友—周春田关冀华夫妇励学金(4名)

何思晓 胡成旺 曾宸 沙智华才郎

清华校友—胡德贵励学金(1名) 牛文龙

● 回馈母校

车辆学院“瑞麟奖助学金” 捐赠仪式举行

近日,清华大学车辆学院“瑞麟奖助学金”捐赠仪式在李兆基科技大楼举行。车辆学院2003级校友、喜贤资产总经理蔡麟琳及夫人周瑞玉,车辆学院党委书记李升波、副院长李希浩,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孙大鹏等出席仪式。

蔡麟琳、周瑞玉在发言中表示,非常高兴能为母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蔡麟琳从个人求学及职业发展历程出发,谈到了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的成长感受,特别是在科创及辅导员经历中获得的历练,不仅收获了扎实的学识与全面的素质,更强化了善良、正直、坚定的品质。他希望车辆学院学生能够继续发扬创新报国、争先创优的精神,在未来职业发展中展现“清华车辆人”的卓越风采。

李升波感谢蔡麟琳夫妇的捐赠,表示未来将竭尽所能,让校友捐赠尽力发挥最大价值,助力车辆学院人才培养。孙大鹏表示,蔡麟琳校友回馈母校的善举正是对学校育人理念最好的肯定。基金会将继续加强校友联系工作,切实管好每一笔捐赠资金,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仪式上,孙大鹏、李升波共同为蔡麟琳、周瑞玉颁发捐赠证书。

(车辆学院)